

炎黄春秋

第 9 期
2010 年

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张

中共历史上“反党集团”的结局

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

李锐：王元化与新启蒙

“帝国民主”的结局

目 录

一家言

- 1 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张 朱厚泽(遗稿)
- 7 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 资中筠
- 15 政治体制与改革困境 姜 平

怀人篇

- 19 王元化与新启蒙 李 锐
- 23 悼念朱厚泽同志 何 方

求实篇

- 27 中共历史上“反党集团”的结局 郭德宏
- 34 瞿秋白是如何平反的 瞿独伊
- 38 “皖南事变”后的一桩审查悲剧 韩三洲
- 40 再谈公务员福利分房 杨继绳

春秋笔

- 43 胡耀邦与作协四大 郝怀明
- 47 检讨：转型期朱光潜的另类文字 商昌宝

沉思录

- 50 “帝国民主”的结局 雷 颐
- 56 “不须放屁”难倒全国人民 毕星星
- 59 “替天行道论”：权力正义性的护身符 张绪山

亲历记

- 63 我所知道的“桃园经验”
..... 肖风 口述 杜丽荣 张军锋 采访整理
- 66 “翠明庄黑会”始末 于 敏
- 69 插队读书记 张 刃

人物志

- 74 沈巧珍当“右派” 述 弢

品书斋

- 78 黎澍：八十年代的一面旗帜 李 钧
- 81 吕思勉先生的史识与史德 章立凡

争鸣录

- 84 请勿轻易下结论 薛开震

编读窗

- 86 对田纪云“从政体会”的体会 吴康民
- 87 民主党派至今仍心存余悸 张汝范

顾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荣华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 普
李一鑫 李大同 李冰封 李维民
杨天石 杨继绳(副召集人) 苏双碧
邵燕祥 周瑞金 范敬宜 金冲及
赵德润 钟沛璋 凌 云 展 江
徐 孔 秦 晖 袁 鹰 高尚全
章诒和 萧蔚彬 彭 迪 曾彦修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吴 思(副主任)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张晓鸥

社 长：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常务社长、总编辑：吴 思

副 社 长：杨继绳 李 晨

副 总 编 辑：徐庆全

社 长 助 理：胡竞成 张晓鸥 杜明明

总 经 理：李 晨

副总经理兼网络总监：张晓鸥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事：白建钢

秘 书 长：吴 思

副 秘 书 长：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印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本 刊 网 址：<http://www.yhcqw.com>

本刊电子信箱：yanhcq@sina.com

发行部 邮箱：yhcqfxb01@126.com

电话：发行部：010—68532048 68539058

编辑室：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室：010—68525374

办公室：010—68522852

传 真：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定价：6.90元

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张

● 朱厚泽（遗稿）

2009年，为纪念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张博树曾约请朱厚泽写点东西。朱厚泽已患病在身，无法动笔，只好采取谈话的方式，讲述了自己的思考。本文即是张博树根据他的谈话整理而成。本刊作了删节。

今年是耀邦同志逝世20周年，这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困难重重，问题的根本在于改革越来越走向片面，尤其是政治改革没有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健全的民主法治的制度环境，但是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进步。

关于中国的前途，很多人都在寻求一种避免冲突的转变，为中国共产党自我转型寻求有效的道路。从整个国家的平稳转型计，尽量从执政党内部谋求改革是一条比较可行的道路。这就涉及到如何挖掘党内改革资源的问题。

胡耀邦同志一直到去世，都遵循共产党的组织纪律。但在他的晚年，思想一直是走到前面去的，真心诚意的坚持全面改革，甚至是委曲求全，在体制内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推进转型，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深入挖掘耀邦的思想遗产，包括那些被扼杀掉的思想的萌芽，充分发挥这个资源的作用，推动我们国家的进一步变化，是一件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耀邦思想值得挖掘的地方很多，我主要从几个方面谈谈这个问题，算是抛砖引玉：1.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2.耀邦的富民思想。3.耀邦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开放精神。4.耀邦关于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思想。5.站在时代的高度推进全面改革的事业。

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

关于胡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有两个很重要的文献需要注意。一个是1983年1月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个是1986年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1983年1月7日到20日，建国后首次全国职工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20日，胡耀邦出席会议，作了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又称为“二十八条”，因为耀邦一共讲了28个问题。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1999年版《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一书中，关于这个会，还提到一句“胡耀邦在这个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而在2002年该书出增订本中，就连这一句话也抹掉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胡乔木等人反对耀邦同志的这个讲话。

那么耀邦的二十八条到底讲了些什么？针对当时改革刚刚起步，很多人对改革的必要性认识不够，耀邦在这个讲话中指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这个见解，提纲挈领，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但是，不少同志对这个关系我们事业全局成败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缺乏充分的精神准备和清醒的紧迫感。所以，从现在起，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特别突出起来，以便从领导到群众，从党内到党外，认清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耀邦接着说道：说清楚了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就可以确定改革的总方针了。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

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

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

为什么要提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大规模的改革,当然是一件很艰巨复杂的事情,需要深思熟虑,实事求是。正是鉴于这一点,中央决定有步骤地进行,并且经过典型试验。这就保证了我们不会来回折腾和产生混乱。耀邦在讲话中强调了机构改革的必要,指出要改变机构臃肿,互相扯皮,干部老化,效率很低的问题;提出要精简机构、缩减人员、调整班子、提高效率。关于经济改革,耀邦的观点是要把当时农村改革的有效经验借鉴到城市改革中来,提出以承包为重点的企业经营责任制。强调改革势必触动上层领导部门,特别是中央各经济部门和省市,各级领导都要进行领导方法的改革。耀邦还谈到其它各个方面改革的必要性和重点改革任务,他说:我们所面临的改革是一次全面性的系统改革,因此,除机构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外,政法、外事、劳动、人事、宣传、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以及各人民团体,总之一切部门,都有改革的任务。

耀邦特别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知识分子,一个是关于政法改革。耀邦讲:我们政法工作特别是公安工作的传统做法,是以对阶级敌人和各种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进行侦查审讯和惩办为主的,这在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完成以前是完全正确的。但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政法工作特别是公安工作必须根据国内政治情况的变化实行必要的转变。注意加强综合治理,以预防犯罪和教育挽救失足者为主,这就是说实施积极的治安而不是消极的保安。你看,耀邦一举例就点到了要害上,专政机器的转变其实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当时能这样提出问题的领导人并不多。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包括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各个方面,虽然1983年的这个讲话还只是通过机构改革和专政机器的改革来论述政治改革。

到了1986年,耀邦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集中体现在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这个文件明确指出: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虽然围绕这个决议发生了严重的斗争,但毕竟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亮出来了,用今天的话说,这些都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啊!把“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当做主要教训,点到了问题的要害。

如果我们把《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两个文献连起来看,就形成了一个总体布局,可以理解为是耀邦关于全面改革的宣言书。2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耀邦关于全面改革的思想,意义就非常清楚了。现在我们的改革是一条腿的改革,大家的共识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抓好嘛!只有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权力失控,权贵资本横行,结果就造成了如今这样的困局。我觉得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无论放在当时的背景下,还是从今天的实际需要出发,都非常有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耀邦的富民思想

耀邦有个重要思想,那就是国家要富强,首先人民要富裕。能不能使人民富裕起来,是检查我们各地各条战线工作的最重要的标准。后来1987年生活会上有人批他说,胡耀邦一条富民政策就概括了我们的一切了,还很得意,到处讲。

说到这个“到处讲”,我倒想回忆一下1984年初耀邦到贵州指导工作的一段往事。1983年批“精神污染”,此事顶过去后,耀邦到四川,后到贵州,元月份在贵阳讲话。讲完话后,我和池必卿一起把耀邦从铜仁送到湖南湘西凤凰县,

毛致用把他接走。我们回到贵阳后就召开全省干部电话会，由于耀邦交代此次视察贵州不作新闻报道，我们只能以省委布置工作的名义把耀邦讲话精神传达到县委。1984年1月15日《贵州日报》第一版用通栏标题，用全版篇幅刊登了这次电话会议的消息和精神。

这天的报纸是这样报道电话会议精神的：党内评论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省委认为：是否能使人民更快地富裕起来，这是评论是非的一条重要标准，是检查各项工作对与不对的最重要的一条标准。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我们党的全部政策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叫富民政策。国家要富裕，首先要靠人民富裕。必须以重点户、专业户带动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农村重点户、专业户是当前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广大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的先行者，我们必须敢于肯定、保护和支持。扶持方法不当的要改进，但方向不能动摇。不要老是坚持过去那种嫌富爱贫的思想，老害“红眼病”。在流通领域里，决不允许再搞独家经营，而应当全民、集体、个体一起上，独家包办的官商作风，今年必须有一个大的突破。电话会议号召“各级领导都要勇于开创新局面”，开创新局面，至少要做到：一切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我们党的最优良的好作风，必须坚持；一切同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不相适应的老观念、老办法、老框框，都要敢于破除；一切干部，首先是党员干部，都要把自己领导的部门、单位的业务方针，服从于服务于我们全党的奋斗目标；一切有利于促进人民勤劳致富的措施、经验、办法，都要敢于探索，敢于试验，成功的必须积极推广；一切违反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言行，必须坚决地抵制、制止以至斗争。

有人看到这份报纸后吃惊地说：贵州省委这是怎么了？口气这么大？他们哪里知道这其实都是耀邦讲的。

耀邦在贵州讲话里面还说，发展专业户，是我党继农村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大政策。耀邦所讲的发展专业户，不仅要发展种植、养殖专业户，而且要在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发展交通运输、储存、加工、流通等领域的专业户。实际上是在发展专业户的概念下，全面发展民营经济，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思想，当时都提了出来。

过了二十多年，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更深入地看这个问题了。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光搞经济体制不行。经济体制改革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富民的，一个是富官的。应当承认，国家这些年来，经济确有发展，但一边是政府大量提取资金，政府行政费用大幅增长，同时产生大量腐败，另外一边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实惠没有得到，而且贫富差距在拉大。事实上，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势必走到邪路上去，本来想富民，结果富了当官的。权力没有制约，就要利用市场为自己捞好处嘛！

耀邦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开放精神

在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上，耀邦是真心希望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繁荣起来，不要设置那么多框框。就在我刚到中宣部上任不久，耀邦就托胡启立、王兆国给我带话，告诉我要“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希望用新的指导思想写个报告，意识形态方面就会打开新的局面”。后来又当面跟我谈过这个问题。

耀邦还是过于理想主义了些。我考虑了，我如果采取他讲的办法，准备一个全面的宣传工作会议文件，那实际上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我都要写，都得把观点摆出来。最后的结果势必胎死腹中，或者把那些应该说的话给你抹掉，那就不如不说了。我的办法是化整为零，分步来，毛毛雨、微微风，东讲一点、西讲一点，路线纲领那些东西不要搞，我们搞点氛围总可以吧。

“三宽”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提出来的。我主张宽松、宽厚、宽容，先把意识形态上兵将对立的局面解开、松开一下，有点互相可以对话的氛围，然后就可以谈话了。眼睛瞪着，我是执政党、专政党，就是盯着你资产阶级的，有什么新动向，这怎么谈问题？这就没法谈嘛。所以我认为那种搞法根本就谈不上长治久安。高压锅下面能够长治久安？不可能的嘛。先松开，在这里面就有一点活动的余地了。但是我谈的所有东西没有一个发正式文件，因为文件是带有必须执行的性质的，不是指令性的，起码也是指导性

的。我这些谈话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而是参考性的。当然,在那时的体制里面,中宣部长发一个讲话,只要是正式讲话,按照规矩,就要形成一个文件式的东西。所以我不开正式的工作会,我只开宣传部长座谈会,你也谈,我也谈,大家谈,东讲一点,西讲一点,这个会上讲一点,那个会上讲一点,范围都是很小。

这是一种策略,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采取这个办法,或许还能有一点作用。同时也不仅仅是策略。按照我的理解,宣传部的工作与思想有关,思想问题怎么能够下命令呢?警察指挥交通用红绿灯,思想问题是不能用红绿灯的,应该在对话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交流。所以把宣传部长请来,不一定非得有什么工作报告,我们两次全国性的宣传部长座谈会,没有主题报告。大家很关心各方面的问题,那好啊,请钱其琛把国际形势、外交问题讲一讲,科技问题请吴明喻来讲讲,如此等等。可不可发些文件给大家?可以。我就把中宣部的秘书处找来,口述了一个会议的材料目录,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会议文件,包括胡耀邦的讲话,邓小平的讲话,也有邓力群的讲话,那个叫会议文件;第二部分叫参阅材料,朱厚泽同音乐家的谈话,朱厚泽同作家的谈话,等等。完全分开。本来就是个交换意见的过程,大家都等着十二届六中全会,我也等六中全会,听不听随你嘛。

耀邦一向注重保护知识分子,很想在意形态工作上打开新局面。但是,1985年到1986年,正是党内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和矛盾更趋尖锐、更趋激烈的两年。耀邦真的很难。

耀邦当年就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都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做出的结论最后没有站得住脚的。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解决。我们要坚持“双百”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做法不能再搞了!

可否这样说,胡耀邦是在传统体制内试图

突破、但又不违背“规则”的最后一人。实际上,耀邦的开明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使他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左’‘右’夹攻”。我们现在看耀邦的讲话,要体会到他那时面临的困境。在这样一种局面下,坚持开明的改革是一项多么困难的事情!

耀邦关于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思想

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主持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深深了解到党内生活不正常给思想论争蒙上了一层你死我活的色彩,动辄把不同的意见争论打成路线斗争,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事情,甚至以前的党史写作就是多少多少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所以耀邦同志很想改变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况,在这个问题上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耀邦同志当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时候,就提出过“四不”:“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档案)”,到中央党校来学习,不管高级干部还是一般干部,任何问题都可以说,对理论问题完全可以放开思想探讨,赞成不赞成,怀疑什么都可以,所有这些通通不记入档案。中国从苏联学的档案制度害死人啊!

耀邦不但身体力行,还从理论上作了探索。1986年4月9日,耀邦同志在端正党风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后来整理成《关于正确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问题》一文,收入《十二大以来》一书。我手头正好有这本书,不妨给大家念几段。在这个讲话中,耀邦同志说:从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态的角度来说,可不可以把党内经常存在的大量的矛盾划分为这样两种:一种是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另一种是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的矛盾。

关于第一种矛盾,耀邦讲:革命工作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程。总的说来,在长期的斗争中,不同主张不同意见的矛盾是经常发生的,工作中的失误也是难以避免的。建设社会主义更加艰难。因为没有成功的现成经验。这就要求我们党善于集中全党的智慧,确定正确的方针,制定正确的政策,同时善于处理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毛泽东同志晚年恰恰不善于处理

党内这种范围的矛盾。结果就造成一种风气：不但听不得不同意见，而且把不赞成和不完全赞成自己主张的好意见，当成“右倾”、“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党”。我们党认真吸取了这种失误的严重教训，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工作上认识上必然要经常出现的不同意见的矛盾。（一）每个重大决策，事先都进行反复的酝酿然后才作出决定。（二）党的会议上允许党员自由地发表意见和批评任何人，即使错了也受到保护。（三）只要尽了心、尽了力，即使工作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也应允许改正。（四）如果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赞成，只要在工作中不违反并且努力执行，允许保留意见。

我个人认为，耀邦关于党内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这个提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上的意义，应该成为促进党内生活正常化的理论引导。耀邦的讲话针对的就是当时以及党的历史上的此类做法：用“左”的办法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的纷争、处理工作上的争论，一下子就上纲上线，我是马克思主义，你是反马克思主义；我是“无产阶级路线”，你是“资产阶级路线”；老百姓说联产承包搞好了，集体经济就搞好了，有人就说这是自发的资本主义。总之，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十一次党内“路线斗争”，都是你死我活。

耀邦说的另一类党内矛盾，则是指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相矛盾的不正之风。在耀邦看来，这才是应该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耀邦对党员干部侵犯人民利益的事情看得很重，他说：有些党员对党和人民的利益不关心，有些党员对党和人民的利益淡漠，而对个人的利益则斤斤计较。还有些党员个人主义极端严重，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甚至严重违法乱纪，以权谋私。这是完全丧失共产党员根本立场的恶劣表现。对于这一方面的矛盾，当然也要作具体分析。一般的和大量的不属于对抗性质，不要把轻微的错误看成重大错误，不要把一时一事的错误看成不可挽救的错误。但是必须明确，那些严重违法乱纪，严重以权谋私，为了个人利益和本单位、本部门的小集团利益而严重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党员，他们同党的矛盾是属于对抗的性质。这是一个大界限。抓住这个大

界限，才能把这种带有对抗性质的问题同工作上认识上的不同意见和失误区别开来。我认为，现在我们党内的主要偏向，不是对第二种矛盾搞过了、搞重了。主要偏向是对这种矛盾认识不足，缺乏鲜明的立场，不敢理直气壮地下手解决其中那些已经带有对抗性质，甚至已经尖锐对抗的矛盾。这也就是小平指出的：软弱。我们应当努力克服这种软弱状态。克服的办法，就是中央机关带头，认真健全各级党组织的政治生活，健全民主集中制，严肃党的纪律。不客气地说，我们现在有些党组织，包括某些高级党委，谈不上有什么健康的政治生活，关系学盛行，政治空气淡薄。或者说，低级的庸俗的气味太多，政治的原则的空气太少。

其实，早在贵州谈话时，耀邦就指出过，我们在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左”，在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农业政策等方面，还要继续克服“左”的影响；而在纠正不正之风，或以权谋私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右”。我们这个党“左”起来往往很厉害，但对真正“右”的问题反倒处理不下去。然而，恰恰是这些“右”的问题（体制内部自身的贪腐问题）才真正具有对抗性，对共产党构成真正的威胁。这才是“大界限”，比那些工作意见上的分歧重要得多，也严重得多。

沿着耀邦当年的思路下来，就需要党内发展出真正保障畅所欲言的议事制度和言论制度，发展出真正能够遏制腐败的监督制度。到现在，腐败问题已经变得极端严重，但仍然缺乏有效的监督惩治制度和实质意义上的政治改革。

另一方面，对思想理论探讨的禁锢还是过去那一套，动辄上纲上线。近来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批判、对主张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的批判不就是这个路子吗？这怎么可能在党内形成不同思想意见的正常讨论、争论呢？

实际上，耀邦说的第二种矛盾即腐败问题得不到解决，跟这个第一种矛盾得不到真正解决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

站在时代的高度推进全面改革的事业

时间过去了20年,耀邦离开我们也整整20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好的变化,也有不好的变化。人们都希望中国继续向前走。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有责任站在时代的高度,继承当年耀邦的精神,把中国全面改革的事业推向前进。

今天是个什么时代?民主的时代。民主就是要讲法治,讲人性,讲人权。记得1985年我刚到北京时,胡绩伟与乔木的争论,就是“党性”还是“人民性”的争论,还在进行中。胡乔木当然要继续压,胡老也从不妥协。这对于我们后来走到意识形态战线上来的人是很开窍的,就是让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场争论,有这么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那里。

最近在文化战线上有一个大的讨论,就是关于普世价值观的争论。一些人站出来,要对普世价值观加以讨伐、加以批判。我们一些老同志一起议论过。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让步,就是要旗帜鲜明!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想离开这个东西另搞一套,搞出来是什么结果,我们过去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

我过去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谈到20世纪人类经历过四种思潮的反复较量、兴衰和演变,一个是以列宁十月革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潮,一个是以欧洲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一个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潮,一个是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的思潮和制度演化。这四个东西在经过一个世纪的比赛和演化以后的结果,用一个简单的坐标来表现的话,它大致是这么个样子:共产主义思潮,从世纪初期的汹涌澎湃取得胜利,发展到几大洲都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和阵营,到最后走向崩溃,大体是个抛物线;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改良,成一个相反的S曲线,或者接近一个反的抛物线,在那个非常深重的大萧条灾难里面,资本主义自己把自己挽救过来了,慢慢地走过来,保持住,在世纪末还有这么个局面;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波动中比较接近一个上升的渐近线,西欧国家基本上是社会民主党单独

执政,或者跟其他的党联合执政;法西斯主义思潮我说有点像电脉冲,陡然地升起又陡然地陨落,因为它那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跟人类文明是完全抵触的,所以它必然陷入全世界的包围之中。

除了上述四大思潮外,20世纪还有一个很大的浪潮就是民族独立运动。20世纪上半期民族独立运动的代表,一边是中国的孙中山,包括一些武装革命的代表,另外一边就是甘地的非暴力主义;20世纪的下半期,非洲很多国家崇尚暴力革命,南非是个不同的选择,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在非洲,二战后,相当多国家通过武装斗争,把殖民政权推翻了,连同白人农场主一起赶走了,后来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而南非非暴力运动用改良的方式,通过长时间的、相互之间的也叫挤,也叫压,也叫磨,也叫和的各种博弈策略,最终达到民主化和民族和解的结果。南非走出来的路,恰恰保持了更多的现代文明,我们现在看来,它的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比较来讲更加稳定。

回过头来观察20世纪人类的足迹,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这样“五个一般”:第一个是现代市场经济一般,第二个是民主法治国家一般,第三个是公民社会一般,第四个是现代科学技术一般,第五个一般是以人为本、多元开发、和谐共容这么一种当代的人文精神。共产党过去闹革命,本来也是想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但“阶级革命”和党国体制没有达到“五个一般”。我们要反思十月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反思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经验教训,反思各国民主化的转型经验。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一方面反思过去,一方面面对未来。反思过去,是为了纠正曾经犯过的错误;面对未来,则是要大步前进,回归人类文明正道。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本刊声明

为保护本刊和作者权益,凡转载本刊文章,请注明“转自《炎黄春秋》”。

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

——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

● 资中筠

本文试图将中国知识分子——略相当于古之“士”——的精神演变从一个角度理出一条脉络,探求出路。重点在思想文化,不可能涵盖一切,当然也不可能孤立于大的历史发展背景。

中国“士”的黄金时期在春秋战国,真正的“百家争鸣”发源于此时。至今国人引以自豪的“几千年的辉煌”,从思想层面说,实际上就是那个时期所创造以及后来的流风余韵。自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专制制度,到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一家之后,思想开始受到禁锢,难以出现在平等基础上的、充分自由的“百家争鸣”,但文化学术也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中国农耕文明达到的高度和精致程度为世界之最,适应这一文明的专制皇朝制度也设计周到、高度成熟。所以凭武力征服中原的游牧民族都在文化和制度上被汉化。又由于地理的特点,可以长期封闭,“六合之外,姑存不论”。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是唯一未中断的文明古国,原因在此。所以笔者常说中华民族早熟、早慧。

一般欧洲史家把欧洲近代史从15世纪中叶算起,因为那时开始出现与中古告别的文艺复兴、宗教改良,以及各种新思潮,为后来的启蒙思想家提供资源。中国的近代史始于19世纪中叶,从那时起,极端封闭的社会被打开了一个口子,从此“以夏化夷”的途径逆转,西学开始东渐。所以中国的“近代”比西欧晚了400年。以发展道路论,至少从明朝开始,就拉开了差距。这种分法不是主观随意的,或是以欧洲为中心,而是根据文明发展的客观标准。

源于古代的传统

中国古代丰富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差不多同步。不过西方的哲学重理性、逻辑,通向自然科

学,造成以后的科学和生产力的大发展。中国的哲学通向道德伦理和政治,从“修身”到“治国平天下”,传统的读书人都致力于政治文化。正因为如此,人际关系之道和政治文化十分发达,而自然科学、市场经济和工业化难以发展。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是独立自由的。孔子周游列国,游说君主采纳他的意见,一国不行,就到他国,困厄、饥饿,在所不辞,到处碰壁,“吾道不行”则宁可“乘桴浮于海”,也决不妥协。他要求见用的首先是自己的主张而不一定是本人,所以决不放弃自己的学说来迎合在位者。“乡愿”被夫子斥为“德之贼也”。孟子的言论就更加鲜明,与“王”谈话是教训的口吻,一副“帝王师”的架势,是后来的“士”所艳羡、向往而再也做不到的。孟子表达了当时儒家治国的最高理想,现在经常引用的“君轻民贵”之类的话虽然不能附会为现代民主原则和民本思想,但在等级制度正在发展巩固的时代,提醒在位者重视“民”,已属难能可贵。他以他特有的坦率而透彻的风格提出的理想社会和对君主提出的要求是专制君主不愿意也做不到的。难怪到了朱元璋那里,感到难以忍受,就大力删《孟子》,几乎把今天看来闪光之处全部删掉(邵燕祥曾为文详细摘录朱元璋所删《孟子》的章节),而且取消了孟子陪享孔庙的资格。

一般都把“春秋”与“战国”相提并论,实际上到战国后期,司马迁所推崇的那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气度已经大减,变得功利和实用,以《战国策》为代表,一批舌辩之士用舌头混饭吃。他们只能是“谋士”而不是帝王师。所以总是准备几套方案:“上、中、下三策”供君主选择,其目标是助王称霸,而不再是促王行仁义。他们讲究的是“术”,而不是“道”。从道德层面看,也不再坚持原则和人格独立。自此以后,中国的读书人日益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经典著作

也仅仅被当做治国的工具。

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如果秦皇朝得以巩固，也许可能正式以“法家”治国，但是时间太短，没有来得及树立自己的道统。到汉武帝从董仲舒独尊儒家之后，在道统上儒家学说统治了两千年。董仲舒的原意可能是想用儒学对皇帝有所约束，但是儒家所主张的以德治国、行仁义、“内圣外王”那一套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是外儒内法，并杂以黄老之术。如毛泽东从柳宗元说：“百代都行秦政法”。只是柳着重的是肯定郡县反对封建（分封宗室）制，而毛着重的是肯定专政否定仁政。不过对读书人说来，还是以儒家思想为精神支柱。无论是伦理道德还是治国的理想都是从孔孟书中汲取资源。而他们唯一的出路是从政，特别是隋唐行科举之后，更是如唐太宗所说，“天下英才尽入我彀中”。

这样的历史轨迹造成的“士”的精神传统有三大突出的特点：

1. “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其依据的现实条件是“学而优则仕”。能有资格“忧国”的，大小都做过官。即使暂时不“居庙堂之高”，而“处江湖之远”，还是有官职，而不是“庶人”。“位卑未敢忘忧国”，还是有一定的“位”，不是草根百姓。尽管皇朝是一家的天下，在朝的大臣还是视同己有，因为舍此无以安身立命。

2. 重名节，讲骨气。“士林”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和判断标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古训是赖以立身的道德准则，从而铸就了读书人的骨气，历经朝代更迭而不变。他们自认为是儒家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顾炎武在明朝败亡之际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意把“天下”和“国家”分开，他明确说“国家（指朝廷）兴亡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没有责任的。那是因为朝代更迭他无能为力，只能努力维护作为精神支柱的道德体系。当然这里“匹夫”实际上只能是“士”，不可能包括引车卖浆者流。

在政治思想上尽管定于儒家一尊，对孔孟之道的传承和解释权在硕学大儒而不在皇帝。不论皇帝如何“雄才大略”，从没有过“君师合一”，更没有“汉武帝思想”、“唐太宗理论”之说。“士”一旦入朝成为“大夫”，潜意识的还是继承了为帝

王师的想法，以“致君尧舜”为己任，还是努力企图用道统来影响和规范皇帝。他们心目中有“明君”和“昏君”的评判标准，历代官史也尊崇“直臣”，蔑视“佞臣”，不少当红的宠臣位高权重，却为同僚士林所不齿。文天祥在殉难前想到的是“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而不是宋太祖或其他什么皇帝的训诫。鲠直之士“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因为自以为真理在握，有这份自信。所以，尽管有杀头、灭族的危险，面折廷争，冒死直谏之士代代不绝。另外，君臣都重视身后名，对“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很在乎。这一点也是坚持原则的动力之一。

在学术层面，由于有一定的独立性，较少受皇权的干扰，即使在“注六经”中也还能形成不同的学派，特别在唐中叶以后，书院兴起，至北宋蔚为大观。无论在朝在野，学者和书院对道统的传承和丰富起了很大作用，甚至还能发展出疑孔、非孔之学。另外还有一条隐逸之路，在“邦无道”或自己想远离“帝力”时，还可以归隐田园，保持一定的精神独立，并创作出无比丰富的、灿烂瑰丽的文学艺术珍宝。“不为五斗米折腰”成为千古名言，深入人心，不论是否能做到，却无形中形成一种精神上的向往。

3. 与以上二者并行的还有另一种传统，我称之为“颂圣文化”。就是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而且忠君是绝对的，“虽九死其犹未悔”。见用则“皇恩浩荡”，“感知遇之恩”；万死不辞；获罪则不论如何冤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此语出自韩愈《幽拘操》。韩愈是最正统的儒家道统维护者，也应算是直言敢谏之士，明知皇帝好佛，偏要上《论佛骨表》，遭贬黜在所不辞，“肯将衰朽惜残年”！他以同样的忠诚作《幽拘操》，想象当年周文王被殷纣王拘禁时的心情，写出了这句也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周文王代表了儒家所向往的最理想的天子，他坐牢时也有《歌》传下来，注家有不同解释，此处不论。可韩愈觉得他应该抱这样的态度。这种发自内心的绝对服从，其伦理的依据就是儒家的“三纲”，现实的基础则是人身依附。因为在那种制度下，读书人除了“报效朝廷”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用其学。冒死直谏、犯颜上书，都是出于忠心，就事论事，绝不是反对皇帝本人。无论哪朝哪代多么开明的皇帝都不会

容忍对本人公开的否定,连“腹诽”也是罪。为人臣者基本上自觉遵守这一条,因而天王永远“圣明”的“颂圣文化”流毒久远。

西学东渐以后的变化

中国近代史开始的标志是,以鸦片战争为契机,古老的农耕文明遭遇了上升的工业文明,无法再照老路对入侵者在文化上加以融化。这“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促发了民族的猛醒和震荡,“士”的心灵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少数先知先觉者开始新的探索,中国人的现代“启蒙”于此开始,到清末民初渐成气候,新潮不可阻挡。

这一探索持续百年。由于面临的问题与以前完全不同,“亡国”不再是朝代更迭,而是与“灭种”联系起来,那时所谓“灭种”,不是真的如希特勒对犹太人那种“种族灭绝”,而是指整个华夏文明的存续问题。所以读书人的危机感特别强烈,探索也空前活跃。在精神上,传统因素还是起一定的作用。上述1.忧国忧民的担当与2.骨气和勇气,在新的条件下赋予了新的内容,驱使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复兴抛头颅、洒热血。在谭嗣同、秋瑾等烈士乃至早年共产党人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传统精神。不过他们不是为维护原来的“道统”,而是力图打破它,朝廷和国家已不是一回事,而是为救国必须推翻朝廷,至少要彻底改造之。这种威武不能屈的骨气与从西方引进的“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以及“社会良知”可以相通,并相互加强。

他们告别的是上述第3点——“颂圣文化”。这是“新文化”的精髓,从严复的“开启民智”(严复晚年的转向遭人诟病,但他前期对启蒙的贡献和精辟言论不可抹杀)到梁启超的“新民说”到五四一代人为“德先生、赛先生”的呐喊,都是企图唤起民众摆脱在“颂圣文化”下培养出来的奴性与愚昧。那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是传统的,而所承载的观念和思想是新的,从外面引进的。这是一场持续的启蒙。如果说,中国曾经有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精华相结合的时期,那就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经历了百年的“新文化运动”(广义的),现代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等事业初具规模,同时出现至少两代在思想上和学识上堪称贯

通中西的知识分子。即使在抗日战争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文化教育没有停顿,还在继续发展,新旧结合的“士”的精神没有出现断层。甚而可以说,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中优秀的部分与新的思潮相结合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

现在常为人们所称道的西南联大那些人和事可以为代表,当然不止西南联大,还有“中研院”以及其他高等院校和学人都有可歌可泣的表现。那时政府也是专制,也有高压,甚至还有暗杀,但是总体上,知识精英还是保持了气节和一种价值共识。张奚若在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发言被蒋介石打断,就拂袖而去,下次开会可以退回差旅费,拒绝参加;马寅初公开揭露孔祥熙,把他骂下台;直到1947年已是内战方酣之时,傅斯年公开发表文章《这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半个月后宋子文就被撤职。1940年冯友兰受西南联大教授委员会的委托给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写的那封信最集中体现了这种传统与现代精神的结合。那件事起因是教育部下达指令,要审核大学的课程和实行统一考试,受到全体教授的抵制,委托冯先生起草回绝函。信是典雅的古文,套用诸葛亮《后出师表》的语气,内容是据理批驳教育部的指令文件,通篇贯穿现代教育独立于权势的理念,掷地有声。特别指出如果按此规定办理,大学将等同于教育部高教司的一个科,大学教授在学生心目中将不如科员,受到轻视。结果教育部的指令就此被顶回,学校保持了独立。这里讲的是一种精神。至于个人在多事之秋各自信奉不同的学说,在国家分裂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是另一回事。

讲“新文化”还应包括另一个群体,就是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的一批实业家和他们成就的事业。从张謇到卢作孚到陈光甫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来。后来他们被归入“民族资产阶级”。他们不同于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的一般的企业家,因为他们身上也承载了中国传统加外来先进文化,办实业和金融带有浓厚的“救国”的目的。近年来从国外引进并自21世纪开始时兴的“企业社会责任(CSR)”之说,其实在那个时候的企业界是普遍默认的一种价值观。“为富不仁”、“见利忘义”、“背信弃义”都是为业界所不齿,一旦犯此恶行,难以在本行业立足。特别是在日寇压境时,

不少人毁家纾难，不当汉奸是区别良莠的底线。现在“儒商”成为一种时尚，成为某些新富所追求的装饰。而在那个时期，不少企业家、金融家本身就是读书人，他们的传承与修养以及本身的优点与弱点同“士林”是相通的，而且以他们的经济实力支持了许多文化教育事业。这里不谈他们对民族经济所作的贡献，只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应该也是“启蒙”的一部分。

这一百年“启蒙”并非持续不断，而是常为内忧外患所打乱。当时的环境是列强环伺，内政混乱，启蒙和反帝的诉求结合在一起。启蒙需要向西方学习，反帝的对象则是西方列强，从这里引发出难以化解的矛盾。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之说似还不够准确。最初启蒙就是为了救亡，毋宁说是日本侵略打断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最后是革命压倒了启蒙。

1949年以后的“政教合一”与“颂圣文化”的新发展

60年来，军事成就最大：新政权刚建立15年，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造出了原子弹。在军事领域对国际先进水平跟得最紧；经济建设走了大弯路，以至于到1976年濒于崩溃，改革开放30年来，赖走向市场经济和向外开放之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只是现在已经到了拐点，可持续性发生问题；政治改革步履维艰，始终迈不出关键的一步；而文化，包括精神文明，则破坏大于建设。这种破坏是渐进的、逐步加剧、逐步扩大范围，到“文革”达于全面摧毁。

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60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为什么这么快就达成舆论一律，多少硕学大儒否定自己积几十年学而思、思而学之所得，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在什么程度上是被迫，什么程度上是自愿？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试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因素探讨：

客观形势：

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

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导师”也说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盘“马克思主义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盘西化。这当然不可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结合？一种外来思想需要嫁接到本土的思想资源上，结果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已经初步建立的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这里面多的是历代帝王的统治术加现代集权，少的是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这是在执政之后，在取得政权之前是嫁接到陈胜吴广——李自成，“文革”期间则是二者的奇异结合。

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自信。“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缩”的基础上的，就是坚信自己是正确、有理的，如果这点自信没有了，无所坚守，自然再难谈什么骨气和“浩然之气”。于是“士林共识”没有了，一人一旦获罪，在亲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彻底孤立，这是最可怕的境地，犹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门。过去中国的皇权体系，“政、教”相对说来是分离的，现在反而把对信仰的操控与政权合一起来，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论是大倒退。

做到这一点端赖持续不断的、对全体知识界贯穿始终的“思想改造运动”。最初首当其冲的是最高级的知识精英，即大学教授和科学院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之中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在之前的“镇反”运动中已经遭难，知名的如雷海宗、叶企荪等。1950年，燕京大学一位美籍教授回国，学生为之送行，送了一块“春风化雨”的匾，受到上面严厉批评，燕大的党支部做深刻检讨。借此，清华、燕京等与外国关系较多的大学展开

了“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运动。抗美援朝开始后,发展为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运动。大规模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从1952年开始。各大学学识渊博、平时备受尊崇的教授们在大会小会交代历史、检查思想,批判和否定自己半生的著述。越是学术成就大、地位高的,越难“过关”。下面坐的多为自己的学生,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老师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反动性”。紧接着“三反、五反”、文艺界批判电影《武训传》、“反胡风”、批判“红楼梦研究”等等,再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阳谋”,精神领域无一幸免。许多教授的自我批判被选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今天看来,其自贬、自虐的程度惨不忍睹。刊登出来的是知名人士,实际上大小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写过无数此类今天令自己汗颜的“思想检查”(笔者当然不例外)。从此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具有自主权。

主要批判的内容恰好就是支撑读书人精神的上述第二点传统——重气节。具体批判的重点为:“清高”(自以为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骨气”(有阶级性,反对剥削阶级宣扬的反动“骨气”,对“人民”必须“折腰”),以及“旧”道德(家庭伦理、朋友信义等等都以阶级划线,反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乃至鼓励投(革命之)机(转变越快越好,不必怕落“投机”之嫌)。

另一条主线是追随苏联。第一次令高等院校元气大伤的改组就是依照苏联模式;那一次的“调整”特点是高度实用主义,重工科、抑文科、甚至理科(纯自然科学)也服从于工科需要。许多社会科学的学科干脆取消。从此大学失去自主权,中、西的通识教育传统都被扬弃,只生产“听话、出活”的工匠,再无独立思想可言。在自然科学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联大肆宣扬李森科、米丘林时,中国生物学界亦步亦趋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压制一切不同意见,不少知名科学家放弃科学真理加入批判队伍,而以谈家桢、胡先骕为代表的坚持科学良心的科学家遭同行的公开批判。但是苏共二十大前后,李森科在苏联失宠,于是中国科学界也奉命开始转向。当时的科学院院长竺可桢“代表有关方面”向他们道歉(详见《科学文化评论》2010年第2期113页)。仅此一例已可见即使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界,政治已经压

倒科学真理,多数知名科学家也屈服于高压之下了。以后顺应政治斗争需要,科学泰斗公开发表文章肯定“亩产万斤”,原子物理学家发表文章论证大气中核试验的放射微尘于生物无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时恩威并施,或者领导层间或有较为开明的,最后都被压倒。1956年周总理的“关于知识分子报告”,在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前提下,表示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随后一批高知被发展入党。紧接着一场“阳谋”,知识分子又遭大规模洗劫。不少刚入党的又变成右派开除出党,有的还来不及转正,就划归“敌人”了。在大饥荒尾声的1962年,陈毅副总理作著名的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帽”讲话,使知识界又升起沐浴皇恩的希望,奔走相告,额手称庆。但是紧接着就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等于否定了这次讲话,此后“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卒至打入“臭老九”,相当于元朝的“九儒、十丐”。

早在1958年,领袖已经为“一穷二白”踌躇满志。“穷”者,全民皆被剥夺,私营工商企业完全消灭,农民失去土地,再无人有恒产;“白”者,中华民族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斓的瑰丽画面变成一张白纸,供一人在上面狂书乱画。到“文革”开始,连十七年的教育都被否定,中小学教员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以至于掀起学生羞辱、殴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一切基于人性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线。古今中外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最后,文化教育领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一个白卷英雄。斯文扫地、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者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浩劫于斯为最。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导致“思想国有化”有透彻的论述,他指出:极权主义宣传摧毁一切道德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真理的尊重。在这种社会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地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详见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第十一章“真理的终结”)这一论断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这是新的道德沦丧的起

源。

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观因素

当然达到文化专制的前提是“武化”统治。胜利者挟雷霆万钧、横扫玉宇之势君临天下，手无寸铁的“秀才”们不由得不为之慑服。但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高压下的恐惧，完全是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导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层次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1. “家国情怀”的延续。

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百年来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诉求是国家统一、民族兴旺。这一诉求高于个人荣辱。所以，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下决心委身于新政权、追随新领袖，其他的都可以放弃和牺牲。这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1949年化学家傅鹰在美国正在犹豫是否回国，读到解放军炮击英国“紫云英号”军舰的消息，他根据以往经验，以为仍将以中国政府道歉了结，没想到新政府对英国态度如此强硬，大受感动，于是决心回国。这种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新政权，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未摆脱寄希望于“明君”的传统。革命领导的个人魅力、传说中的长征英雄事迹，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没有参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权开始正处于“其兴也勃”的时期，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

2. 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和潮流。

当时两大阵营的对立，非此即彼。选择留在大陆等于选择留在一个“阵营”。二战之后，国际知识界“左倾”也是一种潮流，因此不少知识分子相信“这边”代表未来，急于跟上世界潮流，怕为时代所抛弃，作“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多数国家是敌对的关系。政治上的选择与意识形态的“站队”无法分开。思想上有任何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就有“里通外国”之嫌。国家的敌人与思想的敌人相重合。尽管公开宣布的“政策”有“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的说法，在实践中却难得分开，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

兢兢业业接受“改造”。外部“敌人”的存在被统治者充分利用。所以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眼看自己在中上层干部中一贯正确的威信有所动摇，领袖曾布置高级干部学习柳宗元的《敌诫》。用外敌的威胁转移对内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巩固其权威，是统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效。

3. 知识成为原罪。

1949年以前受过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农子弟，伴随着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同而来的是无法摆脱的“原罪感”，“阶级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书香门第”不是荣耀而是耻辱，这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逆反。即使贫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认为“变质”。除了少数已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外，多数对“马列”理论不熟悉，所以许多饱学之士都有一种自卑感，真心诚意愿意重新学习，用新的理论来审视自己过去的学问。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开始学俄文，却很少人学德文，可见实际目标还是学苏联而不是马恩经典。

4. “颂圣文化”的延续和大发扬。

如前所述，“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论受到怎样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后来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则感激涕零，“天王”更加圣明。“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一切罪责一笔勾销，就此对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心安理得地拒绝反思。

以上几点是最初阶段接受“改造”的“自愿”因素。以后，一轮紧似一轮的“阶级斗争”使强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无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无，以至婚姻、亲情、友谊的自由一切操之于“组织”，想要“归隐”也无可能。同时又被示以“出路”，只要努力改造，达到“脱胎换骨”，就有希望被接纳。这是一种漫长的修炼过程，或可比作经过炼狱达到天堂之路。有人将之比作“温水煮青蛙”，每次政治运动是一次加温，但又对不同人群有所选择，所谓打击5%，团结大多数，于是人人争相加入那95%，直到“文革”95%都被“横扫”。

当然每个人的阅历与处境不同,思想轨迹各有差异。每一轮的整人运动裹挟一大批人进一步丧失自我,同时另一些开始怀疑、有所觉醒的人数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飙使全民陷入疯狂与愚昧,而混乱失控的局面又无意中提供了某种自由思考的空间,那种达于极致的荒谬反过来唤醒了许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经动摇,人性就从混沌中开始寻找回归之路。这种情况在部分知青中尤为突出,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乱读”了许多“禁书”,无意中大开眼界,吸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后来进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间,成为今之颇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

改革开放以后的曲折道路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30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幸而长寿的老一代学人劫后余生又焕发新的活力,恢复自信,在学术上仍能有所贡献。恢复高考初期入学的青年学子有幸得到这一代老先生的亲炙,在某种程度上,薪火得以延续。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为1949年以来所仅有,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如果有机会发展下去,有望继承五四的传统,对新时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为。

但是这场思想解放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不可相提并论。其致命的弱点在于收放仍在“如来佛手心”。掌权者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给予一定的鼓励,但不打算作彻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体系不容突破,旧势力的阻力十分顽强,所以在前进中道路迂回曲折——镇压“民主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动辄得咎,心有余悸,没有

安全感。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1992年的“南巡”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对政治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钳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点传统来看今之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的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体以外的报刊、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但是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为维

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至于主流文化,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此举招来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为主流媒体所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多数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会、小会上一本正经地说,大小笔杆子成本大套地写的内容,在茶余饭后私人之间却是讽刺讥笑的话题。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来帝王还相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所以史官还有一定的写真事的空间。今之官吏不但不发扬“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却着力于屏蔽真相,伪造历史,拒绝反思。这一点对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们对当代史、近代史完全无知,对古代史严重误读,重新陷入蒙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几年经济增长之力自大狂,真以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传统”(例如所谓三个传统——儒家、【1949年以

后】前30年、后30年——一并继承,就是不提1840年以后那一百年),有的公然倡导“政教合一”,还有赤裸裸的恢复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极端民族主义否定了百年来洒满无数先烈鲜血的谋求民族振兴的道路,甚至否定近30年的改革。所有这些论调,殊途同归,落脚在质疑或反对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如何歪曲历史,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领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在位者以“××亡我之心不死”(过去是“帝国主义”、“帝修反”,现在是“境外敌对势力”)来掩盖施政的缺失,压制国内的不平之鸣;摇旗呐喊者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上述“含泪劝家长”一文,用的借口也是家长维权讨个说法,就要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罪名吓人。这种论调动不了国际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抵制改革,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此种思潮再次进入主流文化,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鉴于此,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

政治体制与改革困境

● 姜 平

对两类不同政治制度优劣的比较

人类历史证明,中外古今的政治制度,虽然形式上千差万别,名称五花八门,但从本质上区分,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专制制度,一类是民主制度。

专制制度在古代有族权政治、神权政治、王权政治、皇权政治等;在近现代,有希特勒打着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旗号的法西斯专制制度。在中国,古代有以皇帝(如秦始皇)和朝廷垄断全国一切大权的专制制度,这种专制制度统治中国人民两千多年,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近现代,有清王朝末年大权独揽、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专制制度;有北洋军阀实行假“民主”假“宪政”的专制制度;有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打着孙中山先生旗号实行“训政”的专制制度;等等。有些专制制度,虽然能在某一时期某一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并能在短时期内蒙骗大批群众跟着它走,但是这种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归根到底只代表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它不可能满足广大人民希望“在政治上有民主权利、经济上生活富裕、思想上真正自由”的要求,不可能建设起一个民主、文明、富裕、和谐、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给全国人民带来幸福生活的社会,更不可能实现长治久安,而且常常会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痛苦和灾难,因而这种制度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最后都要被人民群众抛弃。

另一类是民主制度。民主政治古代就有,但范围小、层次低、不完善(如希腊城邦民主制)。高

水平的民主政治,称为“宪政”,是欧美各国人民经过数百年对专制制度的抗争,在17—18世纪首先由英美法诸国创建的。宪政制度以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为“三大支柱”,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原则。宪政制度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政治制度建设的伟大文明成果,也是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强大动力。它极大地促进了欧美各国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并使社会面貌在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基础上发生了深刻变化。宪政制度的优越性之一是,它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因而能促进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各国能从手工业生产的落后国家一跃变成现代化的工业国,并能不断创新走在世界前列。宪政制度具有普世价值,既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东方。日本原来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国,通过明治维新,认真全面的学习西方,废除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度后,其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社会得到迅猛发展,一跃而成为亚洲强国。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在抗战胜利前都是受日本统治的经济文化落后的殖民地。上世纪中叶以后它们认真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对官员实行选举制度,逐步开放了党禁、报禁,调动了人民参政议政、监督政府和发展经济文化的积极性创造性,现在都已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大陆人民是有目共睹的。

对改革开放 30 年成绩与问题的看法

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

“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人们看到,我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科学技术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全国多数群众生活水平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社会保障和救济制度在全国初步建立,人民在非政治领域也有了较大的自由,这些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有目共睹并感到高兴的。这些成绩的取得,是粉碎“四人帮”后,在邓小平等一批又一批改革者的领导下,带领广大干部和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其中两亿农民工在工资很低、劳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为全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超负荷的重大贡献。全国人民在承受环境污染和过度消耗资源方面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更应该清醒地看到,在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同时,因为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则造成了很多严重问题。如官员的滥用职权、官商勾结、拉帮结派、互相包庇、腐败泛滥、官民对立、道德沦丧、不讲诚信、环境破坏、污染成灾、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一方面少数特权阶层成为亿万富翁并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一方面上亿的农民工经济上贫穷、政治上无权)警黑勾结、执法不公、人民告状无门等等,这些问题普遍存在,甚至愈演愈烈,而既得利益集团则竭力阻挠改革。同样,由于改革不到位,国家体制上未能形成有效的制衡和监督机制,造成党和政府机构的惊人膨胀,使人民辛辛苦苦创造的大量财富被挥霍浪费。

早在二十多年前,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这种制度不改革是不行的。西方国家十分警惕权力的过分集中,怕因此会破坏民主制度而形成专制独裁。为此,它们采取各种措施和制度建设,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本是人类从野蛮迈向文明的历史进步,是普遍适用的先进文化。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官商勾结造成经济领域中大量贪污受贿案件的发生,以致造成了国家巨大的损失,必然严重破坏经济的发展。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

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应该承认,我们在粉碎“四人帮”后延续过来的集权政治体制,至今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重大改革,如选举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协制度、政党制度等等,基本上还是“文革”前的老一套,问题很多,远远落后于形势。

比如就选举制度而言,新中国成立已 60 年,改革开放也有 30 年,至今仍实行人民不能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间接选举制,连最基层的乡镇除个别试点外都尚未由人民进行直选。由于官员无需对人民负责,也不受人民监督,官员的腐败也就无法消除。

再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说,人大是监督政府的权力机关,建国时《共同纲领》就规定,我国人大代表应通过普选产生。但数十年过去了,至今还是实行由党召开会议协商提名候选人,然后逐级选举,而不是由普选产生。同时长期以来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安排了大批英模人物、文艺界明星和政府官员,英模人物和文艺界明星没有参政议政的经验和特长,很难履行人大代表监督政府的职责。至于由政府官员担任人大代表,更等于自己监督自己。

再就民主党派与中共“互相监督”而言,党的主要领导人十分重视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监督,但在执行中却变成有名无实,我最近与某党派一位省级负责人进行了交谈,我问他:你们是参政党,对执政的共产党担负着监督的责任,在这方面你们做得怎么样,取得哪些成绩?他坦诚地对我说,多年来中共官员中的腐败问题比较严重,我们很想在监督方面做点事情,却无能为力。首先我们不知情,我们名为参政党,但没有成员在政府中任职,政府官员中产生的腐败我们无从知道,纪检部门掌握的情况也不愿让我们知道;其次,我们缺乏监督的手段,监督干部和打击腐败都要运用舆论工具,中共各级组织办的党报很多、几乎成灾,而我们 8 个民主党派却没有公开出版的报纸,无法行使监督权;另外,我们民主党派是在共产党同级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有时我们虽然从本组织成员中听说中共某领导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我们没有第一手的证据,又没有能替我们绝对保密的渠道让我们将这个

情况报告上级有关职能部门,因此我们不敢随便揭发,被领导者揭发领导者的问题风险太大,若被领导者本人知道了就要遭受打击报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都不敢揭发。他还告诉我,正是由于这些方面的原因,全国各地民主党派都未能充分发挥监督作用。最近几年全国处理了大批贪污受贿的官员,但没有听说过有一个是由我们民主党派揭发出来的。

我长期研究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历史,我知道建国初期的合作并不像现在这样,那时各民主党派也是参政党,但他们都有人参加政府,担任实际的领导职务。比如以民盟为例,民盟主席张澜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民盟领导成员沈钧儒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章伯钧、史良分别被任命为国务院交通部长和司法部长,还有不少民盟成员分别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其他各部门的领导职务。因此他们除了能够领导好他们负责的本部门工作外,在与中共共商大政方针和对执政党监督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仅举一例:1956年春,广西部分地区因党政部门官僚主义严重,使当地有些受灾农民没有及时得到救济而被饿死,并导致大批灾民离家逃荒;事件发生后,当地官员以高压手段严格封锁消息,不准向上级反映。民主党派当时在组织上是独立的,不受当地中共同级党委的领导,为了对人民负责,便向民主党派中央反映。民主党派中央又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反映,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立即调派干部前往调查,结果查明:在平乐、荔浦、横县等地,确实因缺粮饿死了550多人,并立即采取措施调运粮食开展救灾活动,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同时,又对省地县三级有关领导人进行了党纪国法的严肃处理,并在各大报上予以公布,使其它地方引以为戒,没有再发生同类事件。而众所周知,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因实行错误政策,将民主党派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作为“改造对象”。故民主党派不敢再向中共反映真实情况,以致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化后全国大刮“共产风”和“浮夸风”,并对粮食实行“高征购”,造成了三年严重的大饥荒,各地都出现大批饿死人的情况,党内无人敢向上级反映,民主党派明明知道也不敢反映,致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结果造成全国有3000多万农民饿死

病死的空前惨剧。

以上事实,说明了多党合作制度如果执行得好,民主党派确实能在参政议政和对执政党监督方面发挥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而如果执行得不好,处处以防范的心态对待民主党派,民主党派就不可能发挥重大作用,成为与中共“荣辱与共”的盟友,更不可能实现“肝胆相照”,这对我党执政是绝对不利的。东欧部分国家也曾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它们的做法与我们大不相同,效果比我们好得多。

孙中山先生在流亡国外期间,曾认真研究过欧美各国实行宪政和政党制度运作的经验,他指出:“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有进步。我国皇帝亦有圣明之君,而吾国政治无进步者,独裁之弊也。故欲免此弊,政党之必有两党或数党相互监督,互相扶持”,“而后政治才有进步”。他又说,各政党在竞争中虽有“在位党”与“在野党”的区分,但都对推动政治进步不可缺少。政党“为代议机关或政府之脑海”,“凡一党秉政,不能事事皆臻完善,必有在野党从旁观察,以监督其举动,可以随时指明”,错误才能得到纠正。所以,孙中山指出,各政党既是“对党”,又是“良朋益友,彼此相待应如兄弟”。(《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在东京留日三团体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我认为,我党应该以孙中山先生对友党的态度来对待民主党派,改变目前有些人对民主党派的错误心态和不适当做法,切实执行我党中央曾一再强调提出过的:要尊重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赋予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这样才能发挥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和监督党和政府的重要功能。

改革向何处去? 现在正在十字路口

我国存在的腐败泛滥、官民对立、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和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改革等严重问题,只有依靠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如果不深化改革就会走回头路,走上歧路错路,弄不好就可能重蹈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覆辙。

我感到,现在有些领导人似乎只看到我们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绩,而对政治体制中存在的

各种严重问题和改革的重要性与迫切性认识不足。因而对深化改革缺乏足够的决心和魄力。有的人甚至认为深化政治改革已经没有必要,因而成为推进改革的阻力。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在文件中明确宣布:“我党对宪政运动的立场,分为根本主张与临时办法两方面。我们的根本主张,是要真正实现新式代议制的民主共和国”,并“主张立刻实现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自由之民主权利”,主张国民党政府在民国二十六年制定的“宪法草案必须彻底修改,使新宪法真正成为实现民主政治保障民权的根本法,而不是国民党训政的装饰品。”而且强调指出:“这种根本主张共产党是决不放弃的,即使一时不能实现,将来也还是要实现的。”文件要求全党要“广泛宣传我们的根本主张,并指出袁世凯、曹锟、吴佩孚均曾因反对宪政而招致灭亡的历史事实,指出没有宪政就会亡国的危险。”(《中央关于推进宪政的第二次指示》1939年12月1日,《六大以来》(上)1981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党中央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是这样做的。抗战时期,党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全面地推行民主政治,建立了“三三制”政权和各级参议会制度,实行了普选制度,建立了保障人权制度,制定了民主施政纲领,得到解放区各界人民的热烈拥护,并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取

得了极大的成功。

有人说:民主宪政只适用于西方,不适用于东方,特别不适用于中国。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农民,文化水平很低,但对当时解放区实行的民主选举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游击区的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去投票选举自己信得过的干部,就是证明。当时能这样做,新中国建立数十年后的今天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人民的政治要求难道比那时反而退步了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数十年来对追求民主政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成为推动台湾政治进步的一个强大动力。台湾人民有这种要求,怎能说大陆人民就没有这种要求呢?

以上情况表明,中国今后的改革向何处去?目前正在十字路口,一方面有政治远见的领导人和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深化改革,热盼我国能早日实行宪政;另一方面有些人特别是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和特权,正在阻挠改革的深化。我们认为如果不能深化改革,中国就会走上歧路,再次失去振兴中华的良机。现在许多有识之士都为此感到担忧。今后的改革能否深化,它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成败,也关系到我们每个炎黄子孙未来的命运。

(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 徐庆全)

SIEMENS

SW 声望听力
好听力 · 好生活

西门子助听器

解决听得见听不清 耳聩耳鸣的烦恼

声望全国连锁助听器专业验配机构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46号天恒大厦5层

电话:010-84608877 400-610-0896

邮编:100027

网址:<http://www.sw-tl.com>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苏医械广审(文)第2009080150号

王元化与新启蒙

● 李 锐

1982年3月,我被陈云派到中央组织部组建青年干部局,实现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首先通过十二大,清洗“文革”中坏分子,选出新的年轻领导人,当时称为选拔第三梯队。十二大结束后,立即全国换新的省部级班子,我参与其事。1983年初,上海成立新市委时,元化担任宣传部长。

元化是黎澍介绍我们相识的,了解他的“胡风分子”经历,在长年逆境中,坚持独立思考,未脱离本行,特别是研究《文心雕龙》。当年我也是不赞成批判胡风的,庐山会议后开除党籍的罪状中,就有这一条。我敬重元化还有一个原因,知道他的父亲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他是在清华园长大的。1934年我没有考上清华,乃生平遗憾。

记得江泽民到上海就任前,来我家辞行,我谈到上海不仅是中国经济的半边天,也是文化的半边天。这时元化已下岗,我建议他还可以起顾问的作用。后来知道,元化确受到尊重。听说有这样一件事:元化的夫人张可是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他们夫妇合译的《莎剧解读》出版后,江泽民曾打电话要了一本。

关于我同元化的交往,现在记得的有三件比较重要的事,第一件就是创办《新启蒙论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后,全国思想界面貌焕然一新。胡乔木和邓力群极为不安,胡乔木首先发难,反对周扬、王若水等谈“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异化现象,个人崇拜、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变公仆为主人等等,只是“消极现象”,都不算异化。给人道主义戴上“唯心主义”的帽子,实际上是要保护人道主义所反对的神道主义和兽道主义,两者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特征,想以此来掩盖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对当事人进行了严

厉的组织和行政处理。后来他们还搞“反对精神污染运动”,被胡耀邦、赵紫阳很快制止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一直影响到八九年那场“风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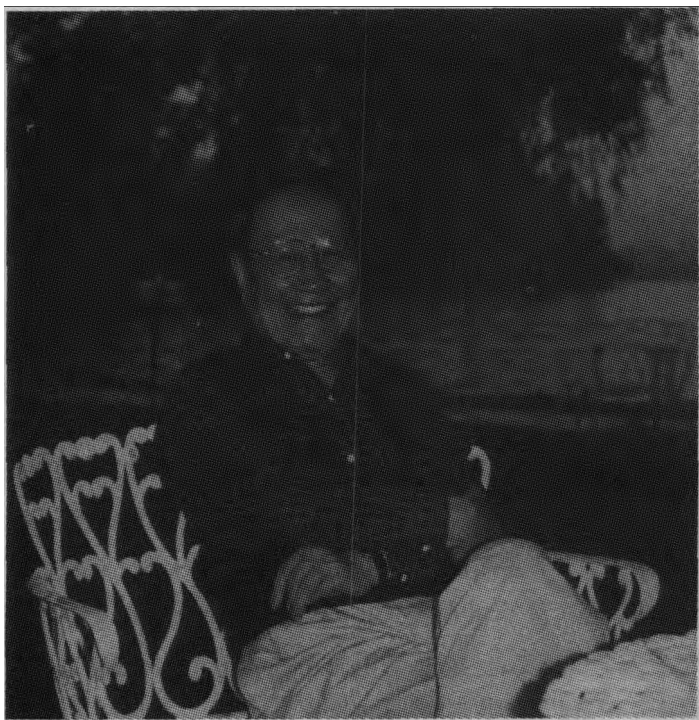
当时我们这些不同意胡乔木和邓力群的左倾观点的人,都认为应当在思想理论领域中彻底澄清他们的错误,必须重新大举五四运动中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从而走上实施宪政的国家现代化的大道。《新启蒙论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

大约在1987年下半年,元化来北京见到黎澍和我时,我们就谈到创办这个丛刊的设想。我们的共同想法是以此进一步解放思想,造成全民族的新启蒙运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由元化担起主编的职责,由黎澍、于光远、王惠德、李慎之、胡绩伟、秦川、王若水、李洪林、李普和我等人组成编委会;时任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的李冰封,在征得省委副书记焦林义的支持后,将出版任务交给湖南教育出版社(冰封原任该社社长)。冰封跟我是老同事,元化直接同他交谈的。

1988年10月,《新启蒙》第一期创刊,到1989年4月,共出了四期。第五、六期已经编好,由于来了那场风波,从第五期就被勒令停刊了。现在冰封将已出四期中和五、六期中重要文章的一些内容和目录,以及有关情况写信告我,特摘录如下:

第一期有两篇重要论文:童大林的《中国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王元化的“为五四精神一辩”。

“新启蒙笔谈”中,刊登了夏衍、邵燕祥、金观涛、高尔泰等八人的有关文章,阐述何谓“新启蒙”。夏衍在文章中强调“新启蒙”要重提科学和民主,迎接时代的挑战,不能错过了目前这个



王元化 20 世纪 90 年代于杭州

千载难逢的机会。邵燕祥则明确提出：“思想文化的启蒙，意味着对原有结论的审视扬弃，过时的传统观念的更新，旧的思维模式的超越；重新认识历史和观念，中国和世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第四期）

讨论异化和人道主义，作者们发表的意见，都不同意胡乔木的论点。先刊出王若水的《论人的本质和社会关系》，认为马克思的论点是：人的本质是自由，自由只能在社会中获得，但社会关系也会异化，人的“存在”也会同人的“本质”相矛盾，从而使人不成其为人。随后又刊出王若水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异化吗？——答复和商榷》，正面反驳了胡乔木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异化的奇谈怪论。此外，还刊出了高尔泰的《论异化概念》（第三、四期），从哲学史的角度，阐述了异化概念。

发表了李锐的《庐山会议的由来及教训》（第四期），此文即《庐山会议实录》的引论与结束语部分。《实录》一书此时已决定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和春秋出版社（中央党史出版社的副牌）联合出版，先内部发行。此文刊出后，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各地发行机构纷纷来电、来函要书，一时供不应求。

最先发表顾准的《希腊思想与史官文化》一

文，并最先向读者介绍顾准其人。王元化在第二期“编后”中写道：“顾准很早参加革命，但命运多蹇，在流离颠沛的黯淡生活中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悲惨生涯，于“文革”中身故。编者曾读了他的大量遗稿，对他十多年前处于封闭环境中所写的这些有见解的文章，不得不感到惊讶和敬佩，尤其在一系列论述民主问题的文章中的某些观点，今天看来仍堪称为先进的卓识。”

在被勒令停刊的第五、六期中，有如下一些文章未能同读者见面（底稿也找不到了）：于光远的《关于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若干基本概念》，苏绍智的《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于浩成的《权力与法律》，黎澍的《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王元化的《启蒙与人的觉醒》，邵燕祥的《文字狱传统在当代》等十余篇。

1989 年 1 月，元化到北京，开了一次关于《新启蒙》发行问题的座谈会。会后，就有各种谣言散布，公安部门就到湖南出版局调查这个丛刊的发行情况。一时风雨满楼，传言湖南省委要查封这个刊物，事实上也调去五、六期原稿审查，就这样不许出版了。“风波”以后，首先抓了李冰封开刀，安上了一系列罪名：“背离党的出版方针，批准出版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推荐和批准出版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人物撰文和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新启蒙》”。“宣扬了一系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人物制造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作舆论准备提供了阵地。”对于光远、黎澍、曾彦修和我一些老同志创办的，由李冰封安排出版的《社会主义初级理论探索丛书》，认为这些书都是“自由化”的，都是为“制造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作舆论准备”。于是，李冰封受到“留党察看并行政降级”的处分。后来，中纪委曾批示要对李冰封错案加以复查，湖南只是草草应付一下，迄今未予纠正。

冰封在信中说，王元化当时对这件事如此评说：要说“左”，那时，全国都“左”，但像湖南省一级这样左得稀里糊涂，左得愚昧无知，左得莫明其妙的，恐怕还很少见。

第二件事。1994 年，《顾准文集》出版（这本

书是顾准的弟弟陈敏之编的),有元化的序言,他立即送给我一册。在这之前我只读过《新启蒙》上那篇文章,不太了解顾准其人其事其文。元化早年曾经在顾准领导下工作过,他说顾准的思想超前了十年。我读了《顾准文集》以后感到,不止同一般学者相比,顾准的思想大大超前;同善于思考的学者相比,顾准的思想也是超前的。我同孙冶方是对门邻居,很谈得来。他50年代就倡导尊重价值规律,是很重要的贡献。现在才知道,他是受顾准的启发,顾准比他更厉害。赵紫阳读了顾准的书,也向我称赞顾准是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为此,我在《东方》杂志1996年第二期发表了一篇谈顾准的长文《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文中有三个小标题: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对这100年的历史应有个反思;敢于思考最根本的理论问题。不料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有人向我发难:“请求党中央审查李锐,问他还信不信共,不信就送客。”中直机关党委还将此信转交与我。我只得又写了一篇四千字的答辩文章:《小风波与大悲哀》,其中刊登了发难者对我“质疑”的五个观点(即刊《东方》原文中):“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也有空想”;“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容纳的产物”;“可以说,从马克思到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作用”;“迷信精神变物质,上层建筑改变经济基础,苏联失败了,斯大林失败了,毛泽东也失败了”;“列宁所痛斥和批判的第二国际,在北欧、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倒是注入新的血液,也影响到北美,使资本主义并没有到‘垂死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力尤其是科学技术的

作用,还在进步发展中。”在文中我最后写道:“这次小风波引起我的大悲哀在于:时至今日,‘左’的东西仍有市场,类似‘文革’的‘左’的阴影仍未消散;市场与阴影,上面有,下面也有,社会上有,机关内也有。可是,同这种市场与阴影一直作斗争的人与文,包括我这个人及其文,却仍不免遭受明箭与暗箭的攻击,使人感到似乎有人还想搞以言治罪。”

第三件事是,元化好学深思,对重大问题常有独到见解。上世纪90年代,中共十四大前夕,我曾写过一篇八万字长文:《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刊在月刊《桥》1993年第1期,改题名:《悲剧,晚年毛泽东》,一次刊完。不幸的是,由于刊登了这篇文章,这个办了五年多的畅销刊物,就被停刊整顿了。元化读后,写给我一封六页纸的长信,下面都是他信中的话:

你选择的题目是极“左”思潮的关键。毛的失误不是因他教条地理解了马克思著作。我党左的错误往往出于教条主义,而他不是。他的理论有极强的个性色彩(你说的浪漫主义是对的)。他使用的语言也都打下他个性的烙印。就气质说,他决不甘为人后,在思想上即表现为不模仿别人,纵征引经典,也必夹己意,出自他自



1984年王元化与吴强等会见日本学者相浦泉、相浦绫子夫妇

己心裁的创见。他是怎样失足的,其中原因错综复杂,一时说不清,要掌握大量资料长时间的研究,方才探知其底蕴。

我要补充的一点是,他的“两论”是他的理论根底,除你文章所涉及的“精神变物质”外,我对你说的斗争哲学再作如下补充:

毛比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评主义》更进一步,把实践作唯一标准,而他所谓的“实践”,又是一极为狭窄的范围,他用知性分析法把复杂的、丰富的东西经过抽象,舍弃其具体的血肉及细节,最终归结到一个概念中去。这种方法也来自传统的理学。如陆象山在鹅湖之会上与朱熹辩论所提的支离事业竟浮沉(嘲朱熹的繁琐),称其为“简易工夫终长久”。这二字大概也由他而波及其他老同志,无形中成了党内思想的一种模式。此话说来话长,容见面时详陈。总的来说,毛的思想方法是知性的分析方法,则往往将生动的、具体的、复杂的、丰富的东西化约为一种平板的苍白的概念。照毛化约的结果,实践最后抽象为“斗争哲学”。这与其说他性格好斗,毋宁说他的好斗是贯彻了他的实践哲学观。可是,斗争毕竟只具有普泛意义。如何斗?也就是说斗争必须选择一种最佳形式来进行,才能落实。毛所选择的最佳形式即他的一大发明:一切通过搞政治运动来实行,这就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由来。以运动贯彻斗争哲学的理论与实践是属于毛自己的,马恩列斯均无此说。如果一定要探其渊源,我认为是汲取总结了农民运动的经验,那篇列于卷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仅已露端倪,而且成了四十年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蓝图。农民运动的经验加之他在党内积累和经历,明乎此,就可以理解曾经使我大惑不解的为什么建国以来运动一个一个不断,明乎此,也可以理解何以与人斗通过运动,与天斗与地斗为什么一定也要通过运动。回顾一下四十多年的历史,还没有一种政治行为不是不通过运动来进行的。毛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任何事都是斗争,认为世界上没有对立的情况是不存在的。他撰写《矛盾论》时苏联正在批判德波林的理论,后来他也发动过一场批判合二为一观点的运动。《矛盾论》直言不讳:差异即是矛盾,

这是他斗争哲学的核心。在此种思想的专横统治下,解放以来,我们的教科书看不到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的“多样的统一”了,既然矛盾无处不在,对任何一个问题就要通过斗争去克服其中的矛盾。毛曾说:“综合就是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这样阐释科学方法和哲学概念的综合,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毛从农民运动和革命经验,摸到这样一类规律:政治运动是进行斗争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用政治运动去进行斗争,是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最便利的手段,力量大,速度快。他认为运动是使人净化达到轻个人重集体的惟一途径。群众只有在政治运动中才能提高认识,受到教育(即毛的实践出真知)。

为了写这篇纪念文章,我翻箱倒柜,好不容易找到这封信。本世纪初,曾接到上海来信,要给元化编书信集,我曾找到十多封元化给我的信寄出,大都是交流思想认识的。这些信我是否留了底子,也记不清了,这次只找到这一封多么重要的长信。

元化一生笔耕不辍,思想独立,精神自由,贡献甚多,尤其人文科学方面。他的许多著作,我没有都细读过,更谈不上研究。他70岁的时候,我曾写了一首诗向他祝贺,以表我的敬仰心意:曾经刺额寻寻觅,因得文心瓣瓣香。思辨精神随老壮,一枝犀笔更锋芒。

(责任编辑 杜导正)

本刊扩版调价启事

为了刊发更多读者喜爱的文章,应读者和作者要求,从2011年1月起,本刊正文从88页增加到96页。每期定价8.00元,全年96.00元。

炎黄春秋杂志社

2010年8月

悼念朱厚泽同志

● 何方

朱厚泽同志的辞世,对我来说并不完全感到意外。但当真的变成了现实,精神上还是受到沉重打击,以至有好些天神魂不定,脑子一片空白。一想起他就心里难受,就悲痛莫名。想写点悼念文字,也不知从何说起。只是暗自长叹:一颗伟大的心从此停止了跳动。应该说,这确实不是一颗平常的心,而是一颗特别强烈的忧国忧民的心,一颗中国人的良心。

—

对厚泽逝世不完全感到意外,是因为我和他的一些生前友好从他发病之日,也就是2008年12月10日他的口腔活检说明细胞已有变异的时候起,就一直关切他的病情发展,所以情况都是基本了解的。虽然北京医院经过会诊和手术切片,肯定他得的不是癌。而只是非典型中度增生,但是大家总还是不太放心,总要经常打听他的病情变化。当然,开始时人们并没有看得那么严重,他自己也显得并不十分在意,仍旧东跑西奔,参加各种活动。单是这年年底最后半个多月,我就和他一起参加了两次聚会。一次是12月12日他找李锐、胡绩伟、冯兰瑞等一些人研究和布置编写纪念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文集;一次是12月30日十多位老同志年终聚会。这还不算他参加而我没有参加的其他活动。

进入2009年,一方面是厚泽的病情发展和几次住院动手术,牵动着朋友们的心;另一方面是他仍像往常一样关注和研究各种问题,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粗略计算,一年间光是我和他一起参加的聚会就有十多次。但他的病情却更让人担心。6月已查出口腔增生为鳞癌,需要动手术切除。7月10日他给我来信说,“我周二作切除。今早去医院,病理切片结论要下周才能看到,只能耐心等待。大夫们表示无大问题,果真,那就更

好。”很显然,查出癌症对他的情绪还是影响很大的。我注意到,他虽然还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也依旧参与发言和议论,但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不再总要背上照相机了。以前他参加聚会总是带着照相机,在会场走来走去,找好角度对与会者特别是发言者进行摄影。现在这些都没有了。这说明他虽然心胸开阔,仍旧忧国忧民、考虑着天下大事和一些学术问题,但终究对生病有了精神负担。在我看来,不但患癌症多起因于长期的精神压抑,而且得了癌症后,情绪的高低对于病情发展变化也有很大关系。根据个人的这种一知半解,我竟不揣冒昧,于8月14日专门去厚泽家进行劝勉。其实他比我更明白,所以没听我多讲,就把话题岔开,谈起了他的学历和文化程度,表现了他一贯的谦虚精神和把我当做知心朋友相待的态度。

由于北京医院开始一段时间的误诊和两次手术不成功,使厚泽的治疗耽误了半年多。到2009年下半年,虽然已诊断出口腔癌,但没能进行有效的手术切除。我也是干着急没办法,曾向他介绍过几种疗法,他也欣然同意,赴约时相谈甚欢,但没有接受治疗。我估计他赴约反倒是为了照顾我的面子。

但是这半年我们还是经常见面,参加各种聚会,直到今年1月他再次并长期住进北京医院接受放疗。2月4日下午,我和老伴去病房探视时,他的情绪还不错,谈了许多话,特别是谈到一些学术问题,兴致很高。没过几天,杜导正和吴思去看他,他特意叮嘱吴思转告我不要再去看他,说是快九十岁的人了,要自己多保重。很明显,他还在关心着我。不知是否由于放疗对免疫功能的杀伤力太大,不几天就听说他的病情急剧恶化,显得疲惫不堪,精神萎靡不振。我想,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少去打扰为好,只是请他的小女儿朱玫过一阵用伊妹儿给我介绍一下他的病情。没想到

他的病发展得那么快，到4月份，朱玫已一再谈到他病情的恶化，到了报病危的程度。因此4月30日我们就设法“混”进高干病房，去探视了垂危的厚泽。差不多同时去的还有胡德平和高占祥。只听他艰难地对德平说，“要把胡耀邦思想研究好。”当高占祥提到自己在文化部是如何坚决贯彻执行“三宽”方针时，我曾补充说，“三宽”是中国当代史上一座里程碑。高占祥还大声对厚泽说，“你是个高尚的人。”他随即艰难但坚定地说，“大家都是高尚的人。”看到他呼吸困难，疲于应对的样子，我们难过地向他招手告别。这也成了我和厚泽的永诀。



朱厚泽 (徐庆全摄)

5月9日凌晨，厚泽离开了他热爱的这个国家和世界。天亮后我听到噩耗，真是悲痛欲绝。我多年不曾哭泣流泪过，但在向他遗体告别时竟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一直随着灵车，把他送进八宝山火化。我的悲痛，不只是由于个人失去了一位偏爱自己的良师益友，还深感中国失去了一位大思想家和大政治家。

二

我和厚泽认识，始于上世纪90年代。那时，原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创办了一个世界观察研究所，吸收了一批老同志如吴象、王殊、李慎之等参加，也有厚泽和我，十多二十来人。大约个把月聚会一次，讨论一些国内外专题。如果认为有建议向中央提出，也可推举专人起草，大家同意后上报。但多数情况是海阔天空，议论半天无结果而终。在这种会上，厚泽发言不多，但每次发言都堪称言简意赅。所以无论谈什么问题，大家都要提请他讲话。通过这种聚会，厚泽和我就很快做到了相互有所了解，也敢于互相谈论各种问题

了。

2000年，我出版了一本《论和平与发展时代》，分送世界观察研究所人手一册，随后也就此做过些议论。记得厚泽对我提出的时代观点评价颇高。他说，看来毛泽东把二战后的和平与发展时代判断为仍然是战争与革命时代，是他建国后犯一连串错误的总根子。而且回溯到过去，在时代问题上犯判断错误也是他的新民主主义论站不住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按照《新民主主义论》的说法，“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发展不是证明正好相反吗？

随着接触和交谈的增多，我和厚泽的了解和友情也更加深了，特别是在政治和学术问题上已经到了什么都可以谈的程度。他的视野开阔，不但极其操心国内问题，而且也非常重视世界历史和国际形势。所以我们不但有共同语言，而且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也相同。这也是我们能谈得来的一个原因。不过在接触中使我感到不安的是，他对我过分看重和偏爱。

例如他去世后，他的一位生前友好戴宜生在悼念他的文章《何须念，清白自会留人间——忆厚泽》中就曾过高地提到了我。文中写道，“他（厚泽）鼓励我看更多的书，介绍我去看顾准、李慎之、何方、杨继绳等的著作，使我能从更高的观点去观察事物。”又如，2009年8月4日，许医农写信给我说，“8月2日去301探望厚泽同志，遵他之嘱找到《新华文摘》所发乐黛云（《时空巨变与文化转型》）、李喜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发展主线研究》）、刘家（《关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统一性问题——对黑格尔曲解中国历史特点的驳论》）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一篇文章。厚泽认为：从毛、胡绳、范文澜全错了，从来不许

触碰的所谓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正是问题根源所在。应该由此入手破解理论错误。他开了个名单(李锐、何方、郑仲兵、雷颐、刘志琴、韩钢)。让我找到三篇文章后负责送达诸位,并希望诸位就这个问题组织一次讨论。”第二天我即复信:“同意厚泽同志意见。有何安排,请同我联系。”由于没人张罗,这事也就再无下文了。我们都辜负了厚泽同志的嘱托。最近还听到他的夫人熊大姐说,他在家会见来访客人时,曾多次推荐我的《党史笔记》。

厚泽对我的厚爱使我万分感激,也永世难忘。

三

厚泽去世后,他的生前友好写了不少悼念文章。我看到《往事》上刊载的题为《漫忆厚泽作新斯人》(以下简称《漫》文)的一篇,文字确实很好,也得到认可和表扬。只是我觉得在谈到所谓“党内民主派”,也就是一些老人,以及厚泽和他们的关系一类问题上,有些提法不很准确,愿根据个人体会进行商榷。

《漫》文把“厚泽的年龄不上不下”说成是他的“悲剧”,显然上纲太高,而且不知所云。至于通篇对老人们的议论就更不妥当了。这倒不是我自己因年届望九,所以要站出来说葡萄不酸,而是实在觉得文中描述和实际情况相差太远。为了不曲解作者原意和节省篇幅,这里全段照抄原文,只把自己的质疑和答辩放在括号内,供读者参考。

《漫》文谈到所谓开明派、民主派时写道:“一般而言,人们不在位时比在位时要开明一些,这些开明派多被称为党内的民主派、自由派。【这条规律恐怕是‘一般’不能成立的。因为‘党内民主派’并不很多,更不是由于不在位了就自然演变而成。】事实上,他们退位后的生活是在余热和过日子之间摇摆。过日子无多少理想可言,也无什么作为可言,而多跟身体检查的各种指标相关,跟血脂血压、心跳速率、脑部供血、骨质疏松、肝胆阴影……有关。【我常和这些老人聚会,就从来没有一次听说过这些‘相关’的内容,从来没有一个人在聚会时谈到自己的身体检查。如果说也有

例外,那就是厚泽得癌症后大家关心和打探他的检查和治疗情况。】余热则是见马克思之前的作为,是他们风云一生的惯性。【能说民主派老人不畏艰险为自由、民主、宪政奔走呼号,只是出于什么“惯性”?】因此,他们是孤独的,又是坚持原则的,他们失去了跟社会更多接触的条件,但他们愿意听闻信息,喜欢定期热闹,哪怕是相互取暖。【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些老人并不感到孤独,同社会接触的条件绝不比在位的人差。有的老人几乎是门庭若市,忙于应付来访的老中青各界人士。定期聚会更不是‘喜欢热闹’和‘相互取暖’。每次所谈,都是国家大事或某些历史和学术问题。】这就给了一些年轻好事之徒或有心人以机会,他们给这些老人提供聚会的机会、信息,请他们表态。因此开一句善意的玩笑,这些老人即使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也会因名因信称义,这名或信就是他们眼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开明、民生、党内民主,等等。他们在群众中赢得了名声,被称为德高望重。好事者以结识他们为荣,以把他们的片言只语捅到媒体上网络上为正事。【这已不止是讥讽和诅咒‘民主派’老人了,而是连和他们来往的和支持他们的人也要统统骂倒。】”

《漫》文对一批所谓民主派老人的态度是这样,那么对厚泽同他们的关系以至厚泽本人的评论是否就客观公正了些呢?也不见得。请继续看原文。“厚泽先生的年龄较他们小,被这些资历高辈份高的老人理所当然地看做同类;厚泽先生有着传统的做人美德,故任劳任怨做一些跑腿的事,而把自己的思考、主张放到心底。”后面又进一步描述厚泽的精神世界说,“作为一个怀抱理想的共产党人,厚泽先生的晚年是忧郁的、孤独的,尽管他的生活热闹,日程安排得紧张充实,但他的思考少为外人所知。”

厚泽真的是这样吗?先看厚泽和“民主派”老人们的关系。

第一,厚泽把自己算作这些老人中的一个。这是《漫》文作者也承认的,并在文中引证了厚泽的话:“你们眼中的希望,是因为看到我们这些老头子还活着,所以你们有幻想,但连我们自己都不抱幻想。”不管这种没头没脑的话何所指,但厚泽承认自己是老人中的一个却是明确的。2007年10月10日,所谓八老(李锐、朱厚泽、胡绩伟、

李普、杜导正、吴象、宗凤鸣、何方)聚会,商谈大家如何对推动宪政民主能发挥一点作用的问题。会上宗凤鸣就公然提出,“李锐同志挂帅,朱厚泽同志副帅。”不管这些话是否合适,但总说明老人们绝没有把厚泽当跑腿的看待。

第二,厚泽参加老人们的活动是自觉自愿和积极主动的,任何人也找不出他受人驱使、只做“一些跑腿的事”的证据。例如编写纪念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文集一事,就是他挑头和推动的。我参加写作就是响应他的号召。其他人如李锐、胡绩伟等都是如此。只是由于他过分慎思严谨,最后将自己的文章撤了下来。在他去世后,作为纪念文集主编的张博树已将题为《全面改革的宣言书》的原文发表。类似事例还可举出很多。前面提到他要我们研究讨论近现代史就是一例。

第三,厚泽和老人们的关系是互相尊重的,甚至大家对他更尊重些。每次聚会,有两个人不发言是躲不掉的,这就是他和李锐。他的发言大家也非常重视。这也是我十多年亲自看到和亲身体会到的。

第四,厚泽是个光明磊落的人,在同老人们的来往和聚会中,并不是“把自己的思考、主张放在心底”,而是言简意赅,能揭示出问题的本质,而且往往讲得很尖锐。例如他在《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我要讲两句话。一句叫保持记忆;一句叫留存信史。一个失去记忆的人,是无法理喻的人;一个忘记了历史的民族,是无法预期它的未来的。”“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记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忘却记忆的国家,不能不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这可不不能不说是心底话吧?而且是要公开见诸报端的话,厚泽也是义无反顾。看了这些以后,能说“他的思考少有外人所知”?

《漫》文提到的“老头会”和所谓“签名上奏”之举,倒确有其事,但斥之为“乡愿”却未免太过分。其实,代人签名的老人都是著名的硬骨头,为坚持真理不怕开除党籍和公职。称这些铁肩担道义的老人为“乡愿”,合乎中国人的良心吗?至于这次签名上书,我也是被签名者之一,当时

也颇有意见并向厚泽表示过。厚泽对这类事情想得很开。他认为,即使在大方向上(例如追求自由民主)思想一致的人,也会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和做法上有不同意见。这样才是正常的。因此在朋友和同志之间也有个求大同存小异的问题,要做到相互理解和相互谅解,不能凡事都要观点一致、舆论一律。那是实际上行不通的。他还说了一句给我印象很深的话,就是“主张民主的人也不一定处理问题都会事事遵守民主程序。”这就是作为政治家的朱厚泽和《漫》文作者之间的差距。

四

将朱厚泽尊之为当代的大政治家,一点也不过分。他和那些常人政治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单是竖立一座中国现代史的“三宽”里程碑,就足以使他永垂不朽。其实,更应强调的,他还是位大思想家。他的思想睿智,观察入微,又涉猎很广,在许多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和足以启示后人的观点与提法。但由于他过分谨慎,生前并未留下什么成套著作,即使一些整理成文的东西,他也因为仍不满意而压下来不让发表。例如在他去世后《炎黄春秋》刊出的《当今文化焦虑问题》和网上发布的《全面改革的宣言书》,就都是如此。我估计,他自己保存的或其他可靠友人保存的这类稿件还会不少。特别是一些半成品,例如他参加会议的发言提纲、谈话纪要,同友人谈时政或学术问题的来往信件,可以肯定还要多得多。这些合计一起,也许可以出若干本书。当然,这里有个搜集整理问题。希望他的一些生前友好和学生、同道,能够适当组织起来,同家属合作,把这件事情做好。既要广肆搜罗他的遗文,也要对公布的所有遗文进行梳理和把关。经过大家共同努力,编辑出几部《朱厚泽文集》来。

另一位中共当代的大思想家顾准,他的主要思想遗产就多是身后整理发表出来的。但愿在厚泽身后,人们也能克服困难,把他的光辉思想挖掘和整理出来,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财富,让大思想家朱厚泽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2010年7月20日)

(责任编辑 萧 徐)

中共历史上“反党集团”的结局

● 郭德宏

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有无数人被打成大大小小的“反党集团”。这些人既有非共产党人,但更多的是共产党人;既有一般的干部、党员甚至群众,也有中共中央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既有入党不久的新党员,也有20世纪20年代就入党的老党员;既有文化、教育界的人士,也有党、政、军、公安、政法等领域的人员;既有已经被平反的,也有结论至今未变的。这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因为很敏感,至今没有人系统研究过。下面,就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对这个问题做一点探讨。

“反党集团”概况

按历史时期划分,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集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延安整风时期:“反党集团”开始出现

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共党内的斗争虽然很激烈,很多人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被打成形形色色的所谓“集团”,例如“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托派”等等,但一直没有使用“反党集团”的名称。从现有的材料看,最早打成“反党集团”的,应该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打成的王实味、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五人反党集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即陈传钢)与中央妇委的王里(即王汝琪)、中央研究院的潘方(即潘蕙田)与宗铮(即郭箴一)两对夫妇,与王实味之间本来只是同志或同学的关系,但在毛泽东发出整风的号召以后,成全向毛泽东写过一封信,提出要“整顿人风”,即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王里和潘方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前后发表过一些与王类似的想法,在王实味被定为“托派”后,他们便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

(二)1955—1956年:“反党集团”扩展到高层和其他领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开始在中央高层和其他领域打“反党集团”。由于这方面的材料开放很少,下面主要根据《人民日报》公布的材料,加以介绍。

从《人民日报》公布的材料看,建国后最早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是高岗、饶漱石集团。不过当时的名字不叫“反党集团”,而叫“反党联盟”。在1954年2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高岗、饶漱石的问题被揭露出来。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社论,第一次公开宣布他们是“高饶反党集团”。这个集团后来也称为“高岗反党集团”^{注1},并扩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注2}。这是第一个在中共中央高层打成的“反党集团”。

高岗、饶漱石被打成“反党联盟”不久,接着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是胡风等人。胡风,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因为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就文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不同意见,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要求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批判。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5月13日,《人民日报》开始刊登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还为此写了编者按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注3}。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并在全国各地逮捕路翎、牛汉等92人。从6月份开始,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这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打成的第一个全国范围的、牵连广泛的“反党集团”^{注4}。

在这个时期,基层也开始打“反党集团”。例如河北省武清县,1955年县委派工作组整顿县社供销社时,将刘旭中、徐洪儒、陈巨元、阎永会等人视为“反党集团”,并让他们停职检查。^{注5}

(三)1957—1958年:打“反党集团”进入高潮,“反党集团”遍及全国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一大批在“整风”运动中曾发言甚至根本没有发言的人,不仅被打成“右派分子”,还被打成“反党集团”。

当时打“反党集团”最多的似乎是文艺界。早在1955年9月30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就将著名作家丁玲、陈企霞定为“反党集团”。这个集团,包括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罗烽、白朗、陈明。^{注6}1958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作了《关于李之珪、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处理意见的报告》,将对丁玲等人的处理有不同意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珪、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黎辛等打成“反党集团”。7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了这个报告。定案结论中说:“这个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主要是以阴谋手段推翻中央1955年12月对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报告的批示,策动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向党进攻,以及否定肃反运动,执行保护坏人、打击积极分子的恶毒政策。”^{注7}

在反右派斗争中,很多地方都在文艺界中打了一批“反党集团”。例如在河北省文联,有以省文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刘艺亭为首的“反党集团”^{注8}。在辽宁,有沈阳市文化局副局长、市文联主任王化南、《芒种》主编郭墟、《芒种》副主编吴山组成的“反党集团”^{注9}。在吉林,有以导演沙蒙、郭维、吕班等为中心的长影“小白楼反党集团”^{注10},以及长影乐团“反党集团”^{注11}。在安徽,有文联党组成员王影、《江淮文学》副主编、文联党组成员石青和《江淮文学》编辑部副主任、共产党员钱锋为核心的“右派反党集团”^{注12},以安徽省文联主席、中共安徽省文联党组书记、省委文教部副部长戴岳为首的“文联右派反党集团”^{注13},省文化局有以陈仲、张熙才、余建民为主要成员的“反党集团”^{注14}。在浙江,有以黄源为首的文

艺界“反党集团”^{注15}。在广东,有以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中国音乐协会广州分会主席、中共音协分会临时党组书记李鹰航为首的“潜伏在音乐、美术界的反党集团”^{注16}。在广西,有民进广西省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省文联副主席胡明树,民盟广西省委委员、省文联副主席、广西师范学院语文系主任林焕平,民革广西省委委员、桂林市文联副主席李文钊结成的“反党集团”^{注17}。在四川,有以《星星》编辑石天河为首,包括流沙河、白航、丘原、储一天、陈谦、遥攀、白堤、晓枫、徐航等一大群右派分子的“反党集团”^{注18}。

在新闻出版界,当时也打了一些“反党集团”。例如《人民铁道报》社打了以副总编辑范四夫为首的“反党集团”^{注19};通俗读物出版社打了以蓝珏、于干等为首组成的“右派反党集团”^{注20};在《鞍山日报》社,打了以副总编辑李惠众为首的“反党集团”^{注21}。

在高校,当时也打了很多“反党集团”。例如中央美术学院的“江丰反党集团”^{注22};东北工学院以右派分子、民盟支部委员陈尚炯、岳从风和王裕生为核心的“右派反党集团”,以九三学社成员、工艺系教授许冶同为首的“反党集团”^{注23};浙江大学由吴隆延、包德炜、李德进、史孝成、朱文伟等五人组成的“‘春雷’反党集团”^{注24};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的“董时光、罗容梓反党集团”^{注25}。

在民主党派中,除了最著名的“章(伯钧)罗(隆基)联盟”外,还有“陈铭枢反党集团”^{注26}。在各省的民主党派中,也有不少人被打成“反党集团”。例如在江西,不仅有中国民主同盟江西省主委许德瑗、副主委刘九峰等组成的“许、刘反党集团”,还有民盟省委副主任委员漆裕元组织的“反党集团”。^{注27}在广东省农工民主党内,有包括云应霖、丘哲、李洁之、陈卓凡、廖嗣兰、杨飘棠、黄大镛等七人的“右派反党集团”。^{注28}

在中央机关中,这时也打了不少“反党集团”。例如司法部有以副处长王左平(共产党员)为首的“反党集团”^{注29},监察部有以王翰为首的“反党集团”^{注30}。

各个地方打的“反党集团”就更多了。例如在安徽,有以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注31};在广东,有“云应霖反党集团”^{注32}、“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以冯白驹为

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注 33}；在广西，有以民主促进会的成员胡明树（省文联副主席）、刘牧、秦黛、陈宪章为核心的“反党集团”^{注 34}，以前广西省委常委、广西省副省长陈再励为首的，包括前省委常委王梦周，前省委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集团”^{注 35}；在四川省水利厅，有以农工党员叶嘉禾为首的九名“反党集团”^{注 36}；在云南，有以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为首的“反党集团”^{注 37}；在贵州金沙县，有以副书记李乃蔚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注 38}；在甘肃，有以原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原政法党组书记、副省长陈成义，原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梁大均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注 39}，以及“陈时伟、杨子恒、蒋云台等反党集团”^{注 40}。

（四）1959—1965年：在“反右倾”等运动中继续打了很多“反党集团”

在1958年8月于庐山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注 41}后，很多机关和地方也都打了很多“反党集团”。例如水利电力部党组打了“以李锐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注 42}；外交部打了“张闻天反党集团”^{注 43}；福建在“反右倾”中把省长江一真、副省长魏金水打成了“反党集团”；1959年10—11月，中共正定县委打了以杨才魁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注 44}。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反党集团”的罪名更多了。例如总政治部主任谭政被诬蔑为“反毛泽东思想”，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撤销了他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注 45}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因小说《刘志丹》，被打成“习仲勋反党集团”^{注 46}；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孙冶方、张闻天等因为提出预告尊重价值规律等问题，被打成“孙冶方、张闻天反党集团”^{注 47}；提出重庆市萧泽宽、李止舟、廖世俊（廖伯康），因向中央反映四川大量饿死人的真实情况，被打成“萧李廖反党集团”^{注 48}。

（五）“文革”时期：打“反党集团”进入第二个高潮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就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注 49}。

接着，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因写《三家村札记》，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注 50}。不久，整个中共北京市委被打成“旧北京市委反党集团”^{注 51}。在这之后，各地打成“反党集团”的就更多了。

到“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来把无数人打成“反党集团”的人，也被打成“反党集团”，其中最典型的的就是“林彪反党集团”^{注 52}和“江青反党集团”^{注 53}。

“反党集团”的结局

历史上被打成的那些“反党集团”，最后的结局大体上分为三类：

（一）彻底平反

这一类最多，绝大部分的“反党集团”都已经得到彻底平反。例如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为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平反。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国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注 54}

又如因小说《刘志丹》被打成的“习仲勋反党集团”，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习仲勋等同志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所以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应予以彻底昭雪平反。^{注 55}1980年1月5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认为所谓“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提法，纯系诬蔑不实之词，应一概推倒。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认为所谓的“习仲勋反党集团”纯属不实之词，强加给他们的反党罪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注 56}

再如关于1959年反右倾整风运动中水利电力部打的“以李锐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水利电力部党组在1979年作出《关于对“李锐反党集团”平反的决定》，明确指出：“当时部党组对上述同志是以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反党集团’来进行批判斗争和组织处理的。这些同志被错误定为‘反党集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把他们对水利建设、水电建设和三峡规划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技术课题的不同意见，视为反党、反中央、反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把他们之间的正常的工作关系和同志关系，视为非组织活动的‘集团’，以致作出了错误的决定。其结果，不仅使这些同志长期蒙受不白之冤，身心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也使水利电力事业（主要是水电建设）受到不应有的损失……”。^{注57}

又如广东打的“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1979年8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请示》，还附去省委《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明确指出：“1957年至1958年在反地方主义斗争中，省委当时认定古大存、冯白驹两同志‘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存在一个‘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是不当的，应予以撤销。”^{注58}中共中央1979年10月19日对广东省委的请示作了批复，认为“广东省委通知中对过去反地方主义的分析意见是正确的”^{注59}。1982年4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又向中央纪委并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复查结论的请示报告》，“建议中央撤销对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原处分决定，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注60}，从而为他们彻底平反。

对于由毛泽东亲自定性、牵连甚广的“胡风反党集团”，中共中央和有关部门后来也逐步平反。1978年底，有关部门撤销对胡风关于无期徒刑的原判，宣布释放。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认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

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人一律改正，恢复名誉。凡因“胡风问题”受到牵连的，要彻底纠正。^{注61}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说有关部门近年来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等方面的几个问题作了复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同意复查结论，对其文艺思想、宗派等问题作了澄清和说明。^{注62}这样，“胡风反党集团”不仅获得了政治上的平反，文艺思想等方面也得到了彻底的平反。

（二）作为“反革命集团”已经平反，但对其中的主要分子没有彻底平反

属于这种情况的，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打成的王实味、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五人反党集团”。1982年2月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全文如下：

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等四同志，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因与王实味来往较多，他们对党内某些现象、某些同志有过一些议论，被认为是“五人反党集团”，受到批判和审查。1945年、1946年中央社会部、中央政治研究室分别对潘方、宗铮和陈传钢、王汝琪四同志做了甄别结论，否定了一些政治问题。但仍有不实之词。

毛主席1950年7月在陈传钢同志的信上曾明确批示：“五人反党集团问题并无具体证据，似应予以平反”。但未能具体落实。“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几人受到冲击和迫害。现决定对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四位同志参加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问题，予以正式平反，推倒强加给他们的一切不实之词，撤销对潘方、宗铮两同志的处分，恢复名誉。对因他们的问题受株连的亲属子女，一律发出通知，以消除影响。

这个决定回避了王实味本人的问题，但明确说明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是不存在的，从而为“五人反党集团”平了反。^{注63}

关于王实味的问题，李维汉虽然在1980年就提出要把他的问题搞清楚，“如果是错案，即使人死了，该平反仍然要平反”^{注64}，但迟迟没有平反。1986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对毛泽东1962

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的王实味作注释时说：“关于他是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注 65}这实际上非正式地为王实味的“国民党探子、特务”问题平反。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发出《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其中指出：

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注 66}

这个复查决定，虽然对王实味的托派问题平了反，但可以看出仍然认为王实味是有政治错误的，定王实味为托派分子似乎也有根据，说明对他的平反并不彻底。

（三）仍维持原结论的

属于这种情况的主要有三个，即“高饶反党集团”、“林彪反党集团”、“江青反党集团”。

对于“高饶反党集团”，除了高岗、饶漱石两人以外的其他主要成员虽然很快就安排了工作，实际上为他们平了反，但对于“高饶反党集团”及高岗、饶漱石两人始终没有平反。对于“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也一直维持原来的结论，并于1981年对其主要成员进行公开审判，除摔死的以外，都判了刑。

关于“反党集团”的几点思考

从上述情况来看，中共历史上打的“反党集团”是很多的，而且绝大部分都是错误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对于什么是“反党集团”，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党纪规定或法律的界定。

按理来说，要打“反党集团”，首先应该对“反党集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或法律的界定，达到了这样的标准才能叫做“反党集团”。但是，查遍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律，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关于“反党集团”的

规定或界定。既然没有明确的规定或界定，那就没有限制了，只要领导人认为什么人与自己看法或行动不一致，就可以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从而把无数根本不是什么“反党集团”的人打成了“反党集团”。

从实际情况来看，那些已经平反的“反党集团”，毫无疑问都不是真正的“反党集团”。即使有的仍维持原结论的“反党集团”，严格来说也不能叫做“反党集团”。例如“高饶反党集团”，作为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岗，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真的会反对中国共产党吗？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他们还能谋取更高的职务、更大的权力吗？实际上，他们的活动不过是为了谋取更高的职务、更大的权力，并不是在反对中国共产党。高岗、饶漱石也没有多少组织上的联系，很难说他们是一个“集团”。因此，还不如说他们是进行非组织活动或阴谋活动更好。

至于“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则是另外一种情形。这两个集团完全是由一批野心家、阴谋家等组成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罪恶累累，犯下了滔天罪行，给国家、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都造成深重的灾难，称他们为“反党集团”或“反革命集团”，并不能准确反映出他们不可饶恕的罪行。

第二，对于什么人、什么机关才可以打“反党集团”，也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和法律的界定。

按理来说，对于什么人、什么机关才可以打“反党集团”，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即只有掌握这种权限的人或机关才有这样的权力。但是，查遍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律，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规定。

从实际情况来看，历史上的“反党集团”是由各种各样的人或机关打的。其中有中共中央委员会打的，有中共中央的部门打的，有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打的，有中国共产党的省委、县委打的，有国家机关或党组打的，有群众团体的党组打的，还有很多说不清是什么人、什么机关打的。既然什么人、什么机关都可以打“反党集团”，那打成的“反党集团”当然无法控制了。

第三,对于要不要经过法律机关的审判才可以打“反党集团”,也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和法律的界定。

按理来说,要打“反党集团”,只有经过法律机关的审判,根据其确切的罪行才能确定,不能什么人、什么机关不经过法律程序,就可以随随便便地将别人打成“反党集团”。但是,查遍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律,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规定。

从实际情况来看,历史上的“反党集团”绝大多数都是没有经过法律机关审判的。经过法律机关审判的,只有“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但对他们的审判,都是在他们被定为“反党集团”很多年之后才进行的,那只不过是对他们罪名的法律认定而已。既然不要经过法律机关的审判,领导人和领导机关就可以随便把别人打成“反党集团”,那打成的“反党集团”当然就无法控制了。

第四,中国共产党打“反党集团”,受到苏联共产党的深刻影响。

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大搞肃反扩大化,打了很多“反党集团”。其中比较早的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党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中,又打了以皮达科夫、拉狄克为首的“反苏托洛茨基中心”,以苏联元帅、前国防副人民委员图哈切夫为首的“反苏军事中心”,以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前人民委员主席李可夫为首的“右派—托派反苏联盟”,由叶戈罗夫等苏军元帅组成的“平行的军事中心”,由科西奥尔等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平行的布哈林中心”等。这次运动混淆了敌我关系,错杀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注67}到1938年底,联共十七大中央委员中有三分之二(83人)被捕和处决,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遭到逮捕或关或杀或流放。^{注68}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又把苏共中央领导人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打成“反党集团”。苏联共产党的这种做法,不可能不影响到中国。中国共产党内开展的反“托派”的斗争,就是直接受苏联“肃托”斗争的影响开展起来的。除了“反党集团”外,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问题,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内打“反党集团”是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出现的历史现象。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多少人被打成“反党集团”。这是社会的进步。愿这样的历史现象以后不再重演。

2010年1月8日

注释:

注1 《烧毁高岗反党集团的招魂幡——评反动影片《红河激浪》》,《人民日报》1968年4月14日。

注2 《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普照祖国西南边疆西藏自治区和拉萨市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人民日报》1968年9月7日。

注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175页。

注4 《人民日报》刊登的舒芜《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中,已称为“胡风反党集团”,见《人民日报》1955年5月13日。

注5 中共武清县党史大事记编辑委员会编:《中共武清县党史大事记1949—1998》,中共武清县党史大事记编辑委员会1999年印,第221~222页。

注6 何载《冤假错案是这样平反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注7 李向东、王增如《文人之痛: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注8 《河北省反右派斗争扩展到各行各业中间人士同右派划清思想界限积极投入斗争》,《人民日报》1957年9月8日。

注9 《毒草丛生的“芒种”被摧毁 王化南郭墟反党集团崩溃》,《人民日报》1957年9月3日。

注10 《长影“小白楼”反党集团穷凶极恶沙蒙郭维吕班率队向党冲锋》,《人民日报》1957年9月3日。

注11 《钟惦斐在党内里应外合放起右派向党进攻的第一把火》,《人民日报》1957年8月5日。

注12 《妄图取消党的领导 要党对修正主义投降安徽文联反党集团阴谋败露》,《人民日报》1957年7月26日。

注13 《指挥一些叛徒、流氓、胡风分子等到处点火戴岳是安徽文联反党集团的主帅》,《人民日报》1957年12月5日。

注14 《近万人投入反右派斗争群众觉悟不断提高安徽省机关展开大论战》,《人民日报》1957年8月23日。

注15 《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隶党籍的决议》,《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7日。

注16 林里《“音乐城”的魔影》,《人民日报》1957年9月24日。

注17 《在反右派斗争战线上广西文艺界揭露一批右派分子》,《人民日报》1957年8月8日。

注18 姚丹《在“草木篇”的背后》,《人民日报》1957年8月16日。

注19 《铁道部反右派向纵深发展原来隐蔽很深的右派分子不断被揭发出来》,《人民日报》1957年9月5日。

注20 《不容右派分子篡夺人民出版事业领导权文化部负责人谈首都出版界反右派斗争经过》,《人民日报》1957年8月

14日。

注21 《批判右倾思想 克服温情主义鞍山反右派斗争扩展到基层》，《人民日报》1957年8月26日。

注22 《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捷报频传江丰反党集团败露》，《人民日报》1957年8月15日。

注23 《沈阳各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深入一批反党小集团被揭发出来》，《人民日报》1957年8月13日。

注24 《浙江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搞得右派骨干显露原形，积极分子受到表扬》，《人民日报》1957年8月13日。

注25 《“特殊盟员”》，《人民日报》1957年8月20日。

注26 《在青岛市人民代表大会上陈仰之陆侃如等受到尖锐驳斥》，《人民日报》1957年10月10日。

注27 《挖掉章罗联盟在江西的巢穴许德珩刘九峰右派集团崩溃》，《人民日报》1957年8月21日。

注28 黄向青《云应霖的丑恶活动是掩饰不住的》，《人民日报》1957年8月25日。

注29 《司法部反右派斗争大有进展揭露出四个右派小集团 右派分子被驳得哑口无言》，《人民日报》1957年9月20日。

注30 《人民日报》1957年12月5日。

注31 《安徽反右倾思想大辩论大胜利肃清无产阶级专政取消论从李世农反党集团手中夺回了专政职能的刀子》，《人民日报》1958年3月10日。

注32 《在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右派分子被驳得抬不起头来》，《人民日报》1957年8月2日。

注33 区梦觉《广东反地方主义斗争的胜利》，《人民日报》1958年6月6日。

注34 《制定行动纲领 阴谋篡夺领导广西文艺界揭露一个反党集团》，《人民日报》1957年8月4日。

注35 《纯洁党的组织 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彻底扫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垃圾广西党代表大会开除陈再励右派集团的分子出党》，《人民日报》1958年7月15日。

注36 《叶嘉禾组织反动集团拒不交代 四川水利厅职工同他坚决斗争》，《人民日报》1957年8月15日。

注37 《云南省委揭露一个反党集团组织部长郑教副部长王镜如被开除出党》，《人民日报》1958年5月26日。

注38 赵广玉《放得透鸣得深 辩得清改得狠》，《人民日报》1958年6月17日。

注39 张仲良《要革自然的命，必先革思想的命》，《人民日报》1958年5月17日。

注40 《反右派斗争形成一条广阔的战线甘肃千余右派分子陷入群众重围》，《人民日报》1957年8月5日。

注41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1959年8月16日，《人民日报》1967年8月16日。

注42 宋晓梦著《李锐其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注43 程中原著《张闻天传》（修订版），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428页。

注44 中共正定县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正定县历史大事记1949.10-1966.5》，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

注45 董宝训、丁龙嘉《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页。

注46 张宏儒《二十世纪中国大事全书》，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710页。

注47 《刘国光文集》第10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56页。

注48 林雪《我向中央讲实情——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访谈录》，向继东编选《2007中国文史精华年选》，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页。

注49 张宏儒、长弓、筱平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典1949-1988》，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页。

注50 鲁天明《“三家村”反动面目的大暴露》，《人民日报》1966年5月22日。

注51 安徽省批判反动小说《风雷》战斗组《反动小说〈风雷〉出笼前后》，《人民日报》1968年7月10日。

注52 思化、军红《林彪反党集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革命大批判文章选辑《林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耻叛徒》，江苏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7页。

注53 刘吉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1921-1991》，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1页。

注5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

注55 陈文斌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496页。

注56 陈文斌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05页。

注57 宋晓梦著《李锐其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注58 《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委会编《习仲勋主政广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页。

注59 《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委会编《习仲勋主政广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1页。

注60 中共海南区党委党史办公室编《冯白驹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0页。

注61 陈文斌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16页。

注62 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440页。

注63 黄昌勇《王实味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254页。

注64 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炎黄春秋》1992年第4期。

注65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90页。

注66 黄昌勇《王实味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

注67 赵德水主编《社会主义知识辞典》，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9页。

注68 季鑫泉编著《世界与中国150年》，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213页。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 徐庆全）

瞿秋白是如何平反的

● 瞿独伊



“八七”会议时的瞿秋白

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为了给父亲能早日昭雪，我开始走访父亲的老战友和许多老前辈，这一部分我是凭记忆按走访的前后记叙下来，可能会感到乱，但这是历史事实。

我走访的第一位老前辈是陆定一同志。当时陆老刚被解放住医院，我去探视他，我问他：为什么我父亲被诬陷为叛徒？他对我讲了下述情况：大约1964年，他当宣传部长时，毛主席问他要我父亲写的《多余的话》。陆老给了主席香港出版的司马路著的《瞿秋白传》和《多余的话》。主席看过之后对陆老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有没有秋白亲笔写的《多余的话》？陆老说，还在解放区时，李

克农同志曾说，外面有人要卖给我们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原稿，问我要不要买。我说，这是伪造的，不要买……周总理曾对我说过，他看见过，确是瞿秋白的笔迹。毛主席对陆老说，今后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宣传方志敏烈士。

之后我走访了杨尚昆同志，他原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他说：大约1962年主席看了《多余的话》对我说，“瞿秋白对革命有贡献，但临终前写了《多余的话》，这是消沉，最多是动摇，作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临终前还是可以谅解的”。我没有听到过主席说瞿秋白是叛徒，主席只说过：瞿秋白怀才不遇这样一句话。

我还走访了好多老前辈。走访过原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他说1963年初十来个人在刘少奇会客室，由刘少奇传达主席的意见说：瞿秋白是叛变了，中央传达最高意见，说适当的时候将宣布。后来下面同志议论，认为这个决定不怎么公道。

我去探望过薄一波同志，他问起我母亲的情况。我说妈妈被林彪、“四人帮”关押了近6年，被他们迫害死了。薄老听后流下了眼泪，他和妈妈共事过，很关心她。当我问起关于我父亲的事。薄老说，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说过，盲动主义的责任加在瞿秋白身上是不公正的。这个责任应有共产国际罗米那兹负责。《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瞿秋白已有评价。主席还说，立三路线问题，经过瞿秋白、周恩来已经解决（96号通报）。瞿秋白当时是比较有威信的领导，如果交他来搞，后来不至于产生像王明路线这样大的错误，就是由周恩来搞也不会发生王明路线。

我看望萧三同志时，他回忆1939年他回延安后见到毛主席，谈话中他谈起老战友秋白不幸牺牲，可痛可惜！毛主席沉默了许久，说“是啊，如他还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呀！”

访问丁玲同志时,她说,我了解瞿秋白,早在解放区时就看过《多余的话》,我认为在《多余的话》里没有叛变的意思。

冯雪峰同志的儿子冯夏熊对我说过:当红军要长征时,他父亲找毛主席问:为什么像秋白这样的领导同志不和大家参加长征?毛主席说:我也提过意见,但没有用,要问一下组织部长李维汉。

有一天我去北京医院探视廖承志同志。他说:“独伊,你应该写信给党中央要求给你父亲平反。”廖公是我父母的好朋友,“文革”后期很关心我和父母的平反问题,为此帮助过我。后来到医院去看望陆定一同志,把廖公对我说的意思告诉了他。他说你应该听廖公的话,给党中央写信。

过了几天陆老要我到医院看他,我到了他的病房,他说,我已写了一封信给陈云、黄克诚同志,请求为你爸爸平反,并把此信底稿给我看,其内容如下:

陈云、黄克诚同志并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说秋白是叛徒,我很怀疑,现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请求复查此事,理由如下:(一)瞿在被捕之后,写了《多余的话》情绪消沉,这篇东西,因周总理曾见过,确是秋白所写。但以此为根据,判定秋白是叛徒,则证据不足。因为它究竟不是自首书或反共宣言。(二)定秋白为叛徒的;是以谢富治为部长的中央公安部,时间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谢富治人品很坏,当林彪、“四人帮”走狗,诬陷了很多好人,对瞿秋白的叛变也拿不出可靠的证据,值得重新检查,不能轻率相信。(三)秋白被枪决,国民党曾发过消息,登过报。如果秋白叛变了,国民党必须大肆宣传。但这种宣传并未发生。

专致

革命敬礼

陆定一

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

于北京医院

我看完此信后,陆老说,你赶快给党中央写信。回家后我就给党中央写了一封请求给我父亲平反的长信。

在这封信里,我提到1946年我母亲和我从新疆监狱释放回到延安,毛主席单独请朱旦华和

我母亲吃饭,我也在场。毛主席关心地同母亲说到瞿秋白时说:“你放心好了,中央已经对他的问题做了结论了。”(指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不久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了复查我父亲问题复查组。中纪委成立复查组之前,在报刊上已有人发表一些文章,如黎澍呼吁应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给秋白同志平反,尤其是陈铁健的《重读多余的话》起到了为秋白同志平反的先导作用。后来复查组邀请陈铁健同志参加复查组的工作。

复查组组长孙克悠同志找我谈话,她说:你给党中央的信我们看到了。你放心,我们会实事求是的复查。你的姑妈也写了信要求给瞿秋白平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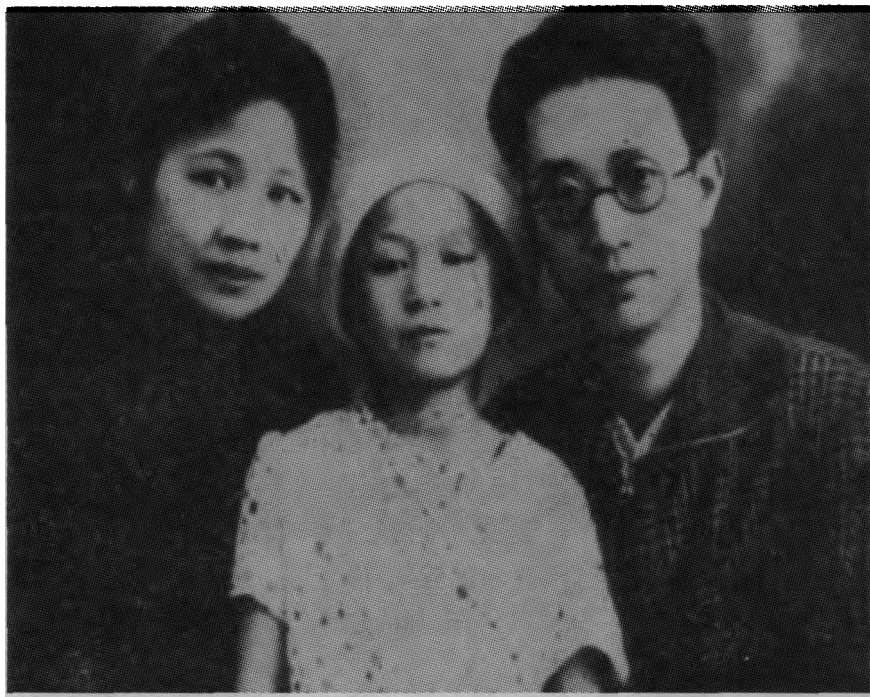
我和女儿想把问题搞得更清楚,决定去找杀害我父亲的宋希濂

宋希濂谈了他所知道的情况,他说秋白先生在狱中确实写了《多余的话》,委托参谋长向贤矩寄给他在武汉的朋友,向贤矩问我可否寄,我说可以寄。蒋介石派两个中统特务到长汀和秋白先生谈话,劝降,但他们从瞿先生那里没有得到任何东西。秋白先生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坚定的。宋希濂说当时我直接审问过他,手下人多次审问过他,南京国民党组织部专门派人来审讯过他。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没有出卖任何共产党的组织和任何一个秘密共产党员。他写的《多余的话》,我印象很深,当时我看过的,这篇文章是瞿先生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从文字上看情调伤感消沉,但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

宋希濂说他还在长沙中学读书时读过瞿先生访问苏联的文章,后来到广州在黄埔军校又读过瞿先生的文章,并听过他的报告,那时我对瞿先生曾经崇敬过,仰慕过。但是我当时肩上的国民党中将军衔亦就是反动的政治立场,促使我对瞿先生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

宋希濂劝过我父亲放弃共产主义信仰,说共产主义在中国行不通,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适合中国国际。瞿先生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屠杀人民,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当宋希濂对我父亲说,时到今日,你还没有对我们讲一点有关共产党和匪区有价值的情况!



瞿秋白、杨之华和女儿独伊 1929 年摄于莫斯科

瞿先生说,我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清楚,蒋介石绝对不会放过我,自从你们知道我的身份之后,我就没有打算活下去……

瞿先生是唱着红军歌、国际歌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胜利万岁走向刑场的……

我们谈了约 40 分钟,回家后,把谈话记录整理后交给了纪律检查组,协助他们的工作。

复查组大约经过半年多的调查和复查了解了实际情况。他们走访了许多知情的老前辈和研究人员,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当时有些老前辈在报刊上发表了回忆我父亲的文章,这些文章为父亲的平反起了舆论作用。

孙克悠同志告诉我,本来在即将召开的党的五中全会上拟为刘少奇和瞿秋白平反问题进行讨论和作出结论,但在五中全会上没有讨论有关瞿秋白的平反。她要我到京西宾馆找陆老,请他在会议上提一提有关秋白同志平反的事,我真的去了并找了陆老转告了复查组的话。他说我和刘澜涛同志一起都提了书面意见,但没有被大会采纳。这样一来五中全会没有讨论也没有通过有关瞿秋白的平反文件。

在这期间,我打电话给当时的宣传部长王任重,问为什么父亲的平反问题在五中全会上没有

讨论,是不是因为毛主席定的十二号文件(文件中说瞿秋白自首叛变了)不好改,他回答是这样。当时“两个凡是”还起一定作用。

复查组走访了好多同志,在上海还召开了二十多知情人参加的座谈会,材料收集得充分。当时我想,如果在北京能召开这样的座谈会该是多么好!北京有好多了解秋白的老前辈。也刚好是父亲就义 45 周年快到了。我分别找了周扬、贺敬之、林默涵三位同志,给他们谈了我的这一想法,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并由中国文联向中宣

部并报中央书记处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提到由中国文联、作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于 6 月 17 日下午三时在人民大会堂西厅举行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 45 周年座谈会,邀请一些老同志,文学艺术界和社会科学界的知名人士。座谈拟请周扬同志主持,请胡乔木、薄一波、陆定一、李维汉同志讲话。会后由新华社发布消息,由座谈会倡议,由毛著编辑办公室研究瞿秋白的著作,蒐集瞿秋白同志的手稿编辑出版瞿秋白文集。有关文艺思想的著作,由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负责。组织几篇纪念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这报告很快被批准了,这样于 1980 年 6 月 17 日召开了纪念会,有 300 人参加了座谈会,由周扬同志主持会,他还做了题为《为大家开启一条光明路》的报告,这报告于 6 月 18 日见报。特别使人感动的是茅盾伯伯眼睛刚刚手术也赶来参加会议,他是坐轮椅被推进到会场来的。他说回忆秋白的文章我已写了,并在报上发表了,这里我不多讲了,我只想提一个意见,秋白同志给我们留下很多遗著,我建议把他的政论由文献编委会编书,而文学著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来编。这是对秋白同志最好的纪念。他说完后,我们就推他回去休息。

这里我要提一下,茅盾伯伯非常关心我母亲的问题。“文革”期间我关在牛棚,为了设法给被

关押的母亲平反,我请病假出来到茅盾伯伯家里避难三次。他和他的儿子韦韬及儿媳小曼热情的帮助和保护了我。我没有想到在白区工作的年代我父母在茅盾伯伯家里避难多次,而在“文革”期间我又不得不在茅公家里避难,当时母亲有病,她在监狱中需要吃药,需要向中央反映她的情况,能得早日解放。茅盾伯伯、胡愈之夫妇热情帮我找药,并创造各种条件以便给周总理写信。我从心里就非常感谢和感动,至今难以忘怀这深情!

座谈会上发言很踊跃,谭震林、李维汉、袁任远、曹瑛、温济泽都发言了,谭震林同志发言中提到,说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党内领导同志中只有秋白同志不搞家长制,他是最讲民主的。

李维汉同志发言说,我们党内从陈独秀到毛主席都搞家长制,唯独秋白不搞,他很讲民主。他还谈到八七会议后,因为国民党对共产党实行白色恐怖,我们就用“红色”恐怖来对付他们,因此犯了盲动主义错误。秋白犯错误是思想认识问题和王明的错误完全不一样。秋白在八七会后代替了陈独秀的领导,但他还是尊重陈独秀作为一个学者,尊重他的人格,会后还去看望他,与他谈话。

曹瑛同志的发言也值得一提,本来上级领导不同意他代表复查组讲话,但曹瑛同志说,他不代表复查组,是代表个人来发言,会上他讲了复查的结果。当时这样做是要有一点勇气的。

虽然正式平反文件还未下来,但这一次的纪念会和老前辈们在报刊上发表的纪念文章实际上已给父亲平反昭雪了。

后来平反文件传达时,只传达到党员,没有向群众传达,使我惊奇的是1998年一位在江西的老战友问我,你的爸爸平反了没有,我答早已平反了,难道你们的党组织没有传达过?她说,没有,我还不好意思问你这件事呢。

我们收集了近期发表的和以前许多老同志写的回忆我父亲的文章,并请人民文学出版社编了一本书,书名为《忆秋白》,是茅盾伯伯题写的书名。在这一本书中有陆定一、周扬、杨之华、羊牧之、瞿铁群、沈颖、郑振铎、王统照、叶圣陶、胡愈之、丁玲、茅盾、曹靖华、萧三、周建人、李维汉、郭沫若、吴玉章、马辉之、冯雪峰、许广平、史平

(陈云)、夏衍、郑伯奇、徐特立、李伯钊、赵品三、庄东晓、石联星、刘英、温仰春、李雾野、瞿独伊的文章。以上同志绝大部分已不在世了,给后人留下宝贵的回忆。此书出版后,很快销完再版。

不久,中央文献编委会、文学研究所和人民出版社组织了两个瞿秋白文集编辑组,均由温济泽同志负责,文学编由王士菁和牛汀二位同志负责,政论组由丁守和同志负责。参加编辑组的同志们都是不脱产地、基本上是义务工作的。《瞿秋白文集》文学编,是在原来冯雪峰同志编的基础上,再增加了部分未发表的作品,共出版六卷。政论编,过去未出版过,完全是重新选编的,共八卷。父亲平反后陈铁健同志出版了《瞿秋白传》,王观泉同志出版了《一个人和一个时代》(也是瞿秋白传)。

在父亲就义50周年前夕,夏衍同志见到乔木同志向他建议能否在秋白就义50周年之际,开一个纪念会?这样1985年6月18日在中南海召开了纪念秋白同志就义50周年大会,由胡绳主持会议。杨尚昆同志做报告。报告中他特别的说明,因为秋白同志在生前身后都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因此不是在诞辰而是在他牺牲的日子开一个纪念会。杨尚昆同志对父亲的革命业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瞿秋白同志平反后学术界在他的家乡南京、常州、徐州多次召开过学术研讨会。瞿秋白纪念馆每年编辑出版《瞿秋白研究》一书,一共出版了13集。家乡常州成立了瞿秋白研究会。江苏瞿秋白研究会编辑出版了几期《瞿秋白研究文丛》和其他有关瞿秋白的书。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是人民写的。

我这篇文章以纪念先父,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一点真实的历史材料。

父亲的才思、他的理想,在错误路线的迫害下,过早夭折。每回忆于此,总让人痛彻心扉、怀念父亲,也是真正希望我们的国家今后尽量没有这样的遗憾!

2010年5月
(责任编辑 萧 徐)

“皖南事变”后的一桩审查悲剧

● 韩三洲

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爆发，在突遭八万余国民党部队的包围袭击下，新四军浴血奋战7天后，终因寡不敌众、损失惨重。经党史专家考证，“皖南事变”中，新四军有3000多人壮烈牺牲，4900多人被俘，3000多名战士被强迫编入国民党军队，1300余人突围。而这些突围成功的干部战士，大部分在很短的时间里又重新归队，成为新组建的新四军的重要有生力量和党的宝贵财富。然而，这些经过枪林弹雨、九死不悔的忠诚战士，竟也有被革命队伍怀疑、被审查而酿成严重失误事件的。其中，原军部作战科科长李志高自杀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悲剧。

李志高，湖南平江人，1929年，他15岁时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经历过长征，是一个能文能武，写得一手好字、很有才干的好干部。1937年12月新四军军部成立后，李志高是第一批从延安派到新四军工作的干部，并跟随项英与赖传珠、李子芳、胡立教等同志一起抵汉口，筹建新四军军部。以后担任军部侦察科长和作战科长。1939年春节期间，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协同叶挺军长一起到新四军军部视察。新四军军部派出作战科长李志高、侦察科长谢忠良专程前往浙江金华，迎接周副主席和叶军长来到云岭，其间并与周恩来等领导人一起合影。“皖南事变”中，作为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是有战功的。突围成功后，他与第二支队参谋长谢忠良等新四军干部七八十人分别在皖南坚持数月，于4月中旬北渡过江到无为县，与曾希圣的第七师会合，并担任七师参谋长，谢忠良则担任七师55团团长。

1941年3月，重新组建的新四军军部在江苏盐城成立时，曾成立了一个审查委员会，专门审查突围后先后零星归队人员，看看内中是否有个别叛变投敌者的混入。尽管这些归队人员基本上都是党的忠诚战士，审查委员会在任务完成后随即被撤销，但在此期间还是发生了李志高被无

端审查愤而自杀身亡的严重事件。

据《回顾新四军军部》一书记载，李志高、谢忠良二人自皖北突围后，曾给刘少奇写过一份关于副军长项英与参谋长周子昆遇害的真实报告，详细汇报了项、周二人被叛徒刘厚总杀害的经过。但是盐城军部根据突围干部中个别人提供的材料，却怀疑叶挺将军的被俘与项英、周子昆的被害，都与李志高等人有密切关联，因为他们是最后一批坚守在皖南的。材料未经核实，上边就认定李志高与谢忠良有内奸嫌疑，其中还牵涉到一些突围出来的很多同志。于是，军部派出锄奸部门的负责干部前往新四军第七师驻地，对李志高和谢忠良进行关押审查。在关押期间，李志高情绪极为抵触，竟于1942年1月3日自杀身亡，年仅28岁。

李志高是如何自杀身亡的？据相关的材料介绍说，当时李志高被关在无为县县政府的一间房子里，外面有一小战士看守。因为李志高以前也是部队领导，他骗小战士开门，抢夺了步枪后又进入房内，用步枪顶在下颚处开枪自杀。随后，军部随即查明这些事情与他们无关，立即电告七师，李志高、谢忠良不是内奸，应立即释放谢忠良等同志，恢复他们的名誉与工作。可惜的是，李志高没有等到为他洗刷冤屈的这一刻。

事后，军部参谋长赖传珠将这次审查失误事件对李志高的妻子实情相告，七师也为李志高开了追悼会。七师政委曾希圣说，李志高同志是个出色的参谋人才，死得太可惜了。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也为此事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他说：“我派保卫部长去了解情况，却没有及时了解进展情况，让好同志蒙受冤屈，导致李志高同志自杀。他们都是皖南突围出来的干部，是革命的火种。他们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回到自己的部队却倒下了，痛心啊！同志们，这是我们新四军的悲剧啊！是我失职的悲剧啊！”

我没有及时保护他们,这是我的失误,在这里我诚恳地检讨,向受委屈的同志们道歉!向死难的同志默哀!以后绝对不能再发生这样严重的事情!请大家监督,再有此事,首先撤我的职。”

作为一个献身革命、连死都不怕的志士,是把理想与荣誉看得比自身生命还要宝贵的,他人生最大的失望就是不被党和人民信任,甚至还被当做敌人对待,这内心的痛苦与煎熬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所以李志高也只能以死来明志了。

正如刘少奇所说的,像李志高这样对党和人民无比忠勇的战士,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回到自己的部队后却倒下了。而且还是以自戕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清白与无辜,这该是多么大的失误。其实,翻看党史,把自己同志当做敌人来进行审查、动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历史事件,无论是在此之前的“肃 AB 团”,还是在此之后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都是有过不少惨痛教训的。即便是在新四军内部,李志高事件也不仅仅是个例。

据史料记载,1938年,曾发生过一次错杀叶道志事件,这也是李志高本人所经历过的一个事件。当时军部特务营营长叶道志、徐长胜等三人,也是延安抗大调到新四军军部的长征干部,他们在红四方面军时曾任过师、团级职务,来到新四军后却被降级使用。叶道志先是担任四团副团长(政委),后又改任军部特务营营长,徐长胜任特务营参谋,另一个则任东南区游击干部训练班教员。为此,这三人思想不通,认为在此处不受重用,准备仍回八路军原部队去,于是便携带新配给的驳壳枪以查看地形为名开了小差。军部知道后,极为震怒,立即派出侦察科长李志高带人追赶,并在景德镇将叶道志抓获,徐长胜被击毙,另一人逃脱后,回到八路军原部任职,建国后还被授予中将军衔。一个多月后,叶道志以“投敌叛变



1942年6月,新四军第四师开展整风运动。

罪”被处决。因为他是四方面军的干部,公审会上,说他是企图叛变革命投降张国焘,但叶道志临刑前坚决否认是背叛革命,更不是去投降张国焘,只是承认对工作安排有意见,不经组织允许擅自带枪离开军部是错误的。这时,从延安同来的陶勇(建国后曾任海军司令员、中将,“文革”中自杀),曾上书力保叶道志,说叶是他们南来的临时支部书记,在他们途经武汉时,得知张国焘叛变,大家均表示气愤,临时支部还专门开了批判会,因此叶道志不可能去投降张国焘。但陶勇的力劝无效,叶道志还是给杀掉了。同一个事件中的三个人,一人被击毙,一人死刑,一人脱逃成功居然后来还当上中将,明摆着就是一桩错案。1983年10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布文件,宣布枪决叶道志、徐长胜是“历史错案,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文革”期间,对革命队伍的审查则进一步升级和扩大化了,一大批像李志高那样以死来证清白的无辜者,竟还背负了一个“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罪名,而对李志高一案作过沉痛检讨的刘少奇也在对他个人设立的专案审查中被打倒。对革命同志进行审查的历史,就是这样在一次次人为地制造冤假错案、又予以平反昭雪的怪圈里循环往复着,甚至连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也未能幸免,同样在这个政治怪圈里面轮回了一次。

(责任编辑 萧 徐)

再谈公务员福利分房

● 杨继绳

本刊于2009年第5期发表了我写的《住房改革的由来和现状》一文,揭露了在国发1998【27】号文件规定的1998年7月停止福利分房的十多年后,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机关的公务员还享受福利分房的情况。此文发表后,收到了大量读者来信,有的十分愤慨,有的不相信有此种事情发生。事情已过一年,公务员福利分房的情况不仅没有遏止,反而愈演愈烈。对此,国内各种媒体十分关注。如果在网上搜索“公务员福利分房”,在0.028秒内,就显示出528000个相关网页。

我所揭露的情况仅是冰山一角

从媒体报道得知,我所揭露的情况仅是冰山一角。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1998年房改以后,福利分房虽被明令禁止,但公务员系统内的变相福利分房一直没有停止过。

网上可以查到北京中直机关和国务院机关福利分房的种种方式和具体案例,现选择几个案例如下:

变相福利分房方式之一:低价团体购买商品房分给公务员。

案例:禧福汇国际社区(外交部团购)。地点,双井桥东南。团购价:6000元/平方米,新房市场价:33000元/平方米。周边二手房价:30000元/平方米。

案例:京投快线·阳光花园(市政府团购)。地点,丰台区大红门西路。团购价:6000元/平方米。新房市场价:25800元/平方米。周边二手房价:23000元/平方米。

案例:北京朝阳新城两限房项目——金隅景和园三栋楼座被农业部定向团购,数百套房源将以6000元卖给内部人员。该房市场价:40000

元/平方米,周边二手房价15000元/平方米左右。

变相福利分房方式二:公务员瓜分困难户的经济适用房。前些年北京市盖了一大批经济适用房,应当是以低于市场价(4000多元/平方米)卖给低收入困难家庭的。普通的困难群众申请保障房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批,而这些经济适用房中相当一部分被不具备低收入条件的公务员们以低价购买。

变相福利分房方式三:国家单位集资建房分给公务员。

案例:市发改委建委集资房。地点,六里桥西局,均价4000元/平方米,市场价30000元/平方米。周边楼盘:永翌公馆:29800元/平方米;第三区:28000元/平方米;周边二手房参考价:25000元/平方米。

案例:人民银行集资房。地点,宣武门康乐里,均价2000元/平方米,市场价50000元/平方米。周边楼盘:四合上院:33000元/平方米;中信城:28000元/平方米;周边二手房参考价:30000元/平方米。

案例:市铁路局集资房。位置广安门手帕口南,均价5000元/平方米,市场价32000元/平方米。周边楼盘:红山世家:40000元/平方米;周边二手房参考价:30000元/平方米。

《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4月24日发表报道称:经记者调查,网上揭露上述情况基本属实。北京东三环的和谐雅园,西三环益丰苑小区,西直门某铁路住宅小区,职工内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珏林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这些楼盘能建起来,要么是获得了划拨或者转让土地,要么是在自己土地上盖房,因为如果是走商品房路子,这个土地要招拍挂,显然是不可能那么低价。

继国发 1998【27】号文件以后,2003 年 8 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要求任何单位不得以集资、合作建房名义,变相搞实物分房或房地产开发经营。2006 年 8 月建设部、监察部、国土资源部三部委联合发出通知,严禁党政机关利用职权或其影响,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搞集资合作建房。2007 年国务院 24 号文件明确规定,经济适用住房供应对象为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其标准控制为 60 平方米/套,且要有严格的准入条件,配置过程要对社会公开透明。

然而,一方面禁令不断,一方面大批公务员住进了豪华的“经济适用住房”。北京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在北京的政策性住房里,不公开、不透明、不面向社会的,大概要占到四分之三,面向社会大概只有四分之一。任志强说的这些“不公开、不透明的政策性住房”,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以“经济适用房”的低价卖给了公务员。

全国各地都给公务员福利分房

为公务员福利分房的情况不仅发生在北京,全国各地更为普遍。

《经济参考报》2010 年 4 月 20 日报道:山西忻州首例限价房项目“世纪花苑”成为当地干部福利房,“市直机关正处级及以下干部一人一套”。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福利房被公务员大肆高价倒卖,总体牟利至少五千多万元。市民说,多少家庭“望房兴叹”,限价房成了机关干部们的“提款机”。

新华网 2010 年 5 月 18 日报道,陕西眉县首个经济适用住房小区即将开工,准备建 1548 套住房,几乎八成以上房源内定到全县 87 个单位,其中县委、政府各组成部门有 233 户,副科以上占到 103 户。普通百姓没有资格参与购买该房产。

《经济参考报》2010 年 5 月 19 日报道:山东日照在市中心新建 3500 多套住房,专供市直机关公务员,价格比同地段商品房低 30%以上,按官员级别,分配套型面积从 120 平方米~200 平方米不等。

《广州日报》2010 年 6 月 10 日报道:“侨香村”和“深云村”是深圳市政府出资建设的大型福利房小区,这两个小区一共有 7000 多套住宅。小区里有两项配套设施创下世界之最——全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热水系统和最大的中水处理系统。这两处建于深圳市豪宅片区的“经济适用房”小区,将以每平方米 4800 元的成本价分配给深圳机关事业单位的员工,这引起了社会广泛质疑。

新华网 2010 年 6 月 21 日报道:海南一个 6000 多套限价房项目仅仅针对公务员销售,房价约为每平方米 3000 多元,远远低于周边的每平方米 25000 元普通商品房价格。户均面积 120 多平方米。

《中国证券报》4 月 27 日报道,河南省某地级市政府部门集资建房面积严重超标、集资建房对象超范围;违反建设工程规划施工,建设联排别墅。其中,包括已经竣工的为地方官员而建“府邸花园别墅群”、“酃水花园”等。据《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目前,重庆、浙江、江苏等地正在推行“城乡统筹”和“农地置换”。大批农民通过宅基地置换变身市民,其原有土地上交后,经过统一规划建设新社区。其中,不少地方公务员分得了位于城郊农民社区内的小产权房。

《西安晚报》2010 年 6 月 10 日报道:延安市宝塔区的很多经济适用房单套面积大大超出国家有关规定,一些经适房单套面积多为 130 平方米~160 平方米,甚至达到 270 多平方米,当地中低收入家庭只有“望楼兴叹”,很多卖给了有权势的关系户。他们低价买入后加价倒卖。

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市房协和市房地产学会于 2010 年 4 月 15 日联合发布了《广州 2009 年房地产市场蓝皮书》,对去年广州楼市的购房者情况进行了分析。公务员人群购房比例占总套数的 9.7%,占总面积的 9.8%。公务员群体购房均价为全部群体最低,只有 6257 元/平方米。广州市中心区 2009 年全年房价平均为 13319 元/平方米。

公务员福利分房危害极大

本刊发表《住房改革的由来和现状》后,城

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很快就在《经济参考报》发表了题为《公务员住房不应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文章。该文指出,“这些都是给公务员超国民待遇的腐败做法”。“在世界各国,公务员群体因政策保障而在当地工薪阶层中享受最好居住条件的,不论富国还是穷国,不论大城市还是小城镇,不论历史还是现实,除了前苏联,一个例证都找不到”,“一些国家历史上在公务员住房问题上的不慎做法曾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以至政治危机,其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有读者给本刊来信认为,中直机关和国务院机关违反国务院发的文件,直接挑战了国家权威,这将造成十分危险的后果。连中直机关和国务院直属单位都不执行国务院的文件,谁还会执行中央法令?令不行、禁不止的无政府状况有可能成为常态。

有媒体指出,在住房市场化十多年后,还给公务员福利分房,这是有组织的大规模的群体腐败。在房价高攀以后,近来房租又连连高升,大批无房者被挤进“蜗居”、“胶囊”,大学生成了“蚁族”,买房者成了“房奴”。在这种情况下,公务员还享受福利分房,造成了强烈的社会反差,将会激化社会矛盾,破坏社会和谐。

有学者在媒体上著文表示,公务员福利分房,挤占了按市场行为经营的企业的市场空间,侵占了公共资源、侵吞国有资产,用公权为部分社会成员谋取私利。离权力中心越近,得到的资源就越大,资源分配机制就越有保障。这是权力腐败的表现。

一些媒体发表的文章称,公务员福利分房是房价飙升的原因之一。中国政法大学王建勋副教授发表文章认为,公务员享用的福利房会直接影响房地产市场供给,干扰正常市场秩序。“大量房子没有推向市场,交易的房子被预先获得,真正用于交易的房子就有限了,而且当公务员以很便宜价格拿到房子时,开发商不会把成本转移到其他卖给普通民众的房子上?公务员所享有的这种特殊福利是不是也是高房价的一个助推力?”任志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北京 2005 至 2009 年政府公布的商品房住宅建设用地计划供给指标为 7130 公顷,但实际上真正可以对外公开销售的商品房住宅只占全

部土地供应量的 28.3%,其余的则是享受经济适用住房政策的用地,由特定单位使用,不对外销售。任志强认为,“如果全部的商品房住房的消费者只能在全部住宅建设用地的 28.3%之中竞争,本来就会高涨的房价就必然会畸形暴涨。”财经评论员马光远说,只要取消公务员的超国民待遇,房价肯定会暴跌 200%。

怎样解决公务员的住房问题?

在抨击了公务员福利分房以后,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怎样解决公务员的住房问题?有人说这是个“伪问题”。如果把公务员和普通公民看成是平等的,这个问题就不应当单独提出来。2008 年地方“两会”期间,广东省政协委员唐永汉提出了这个问题,遭到众多人的抨击,认为他“不问民间疾苦,只替自己人说话。”批评者指出,在大多数国家,公务员住房保障都是纳入社会一般住房保障体系中的。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社会住房保障体系覆盖包括公务员在内的所有社会群体;与其他社会人员相比,公务员在住房上能够享受的特殊待遇非常有限。

但是,作为执政者,有一个稳定执政队伍的问题。因此公务员住房问题还是有人重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陈淮在上述文章中说:纵观各国住房保障体系,几乎找不到为公务员提供实物型产权房的保障方式。除了维护国家形象所必需的“官邸制”住房外(官邸待遇也只是和任期相联系的一种职务消费,并不和私人产权挂钩),国外实物型公务员住房保障通常有三个明显特点。一是以只租不售的租赁型住房为主,例如履行职务所必需的特殊岗位宿舍、政府持有产权的公务员公寓等;二是重点保障的对象是年轻或低端岗位的公务员,例如提供给单身或低端公务员租赁型住房通常含有政府“暗补”补贴,因而租金低于市场价格。三是只保障基本住房需求,适当兼顾一定职务的改善性需求,不包括享受性需求,例如实物型保障住房通常都是“小户型”,家庭人口多的一般也只有 60 平方米~80 平方米/套。

胡耀邦与作协四大

● 郝怀明

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于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在北京举行。这是当时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件大事。

按照胡耀邦的意见,要把这次会开成一个大鼓劲的会,大团结的会,促进文学创作大繁荣的会。“左”的思想在文艺战线根深蒂固,为害甚烈,一有机会就会故态复萌。十年“文革”,以及不久前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人们记忆犹新。多年来,总是一讲点人们暂时还难以接受的新鲜的意见,或者在创作中出了点失误和问题,就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处分一通。人们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状况,创造一种良好的环境和气氛,以进一步促进文艺的发展和繁荣。胡耀邦对这次大会提出“两个不提”,即不提“清除精神污染”,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强调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深受文艺界广大同志的欢迎。

我没有参加这次作协代表大会,对会上的具体情况不是十分了解。但我参与了胡启立代表党中央在大会上祝词的起草,我愿意谈点我所了解的有关情况,供研究这段历史的同志参考。

1984年12月20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报告送审稿和作协人事安排问题。出席会议的有:中央领导同志习仲勋、万里、胡启立、乔石、郝建秀、王兆国;作协张光年、唐达成、冯牧;文艺界老同志夏衍、林默涵、艾青、陈荒煤;中宣部贺敬之;中组部沙洪。

会上,胡耀邦肯定作协的报告是个好报告。张光年说,报告中没有写精神污染,怎么样,行不行。报告中写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征求意见时,有两位同志不赞成这个提法,认为界限不易说清楚。胡耀邦听后说,小平同志提出理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自己的工作失误主要表现为:第一,把这一口号扩大

到全社会;第二,把“不能搞精神污染”改为“清除精神污染”;第三,一哄而起,大造声势,因而出现了一些毛病,但是很快就发觉了,纠正了。这次会议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创作自由问题,社会主义社会应保证作家有更充分的民主和自由,不能把创作自由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同起来,因此这次会议也不要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了。还是提“肃清封建主义的余毒,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为好。(按:这个观点起先是由万里提出的)他提醒大家,反对精神污染不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提了,可是也不要反过来批判,如果反过来批判就很不好了。

在讨论作协文件时,他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这个名词我们以后不用。是经济犯罪就是经济犯罪,是刑事犯罪就是刑事犯罪。两种思想、两种观点、两种作风的问题,是长期的、几百年的问题,只能谈心、批评,而且不能登报批评。以后“三反分子”、“四反分子”一概不提了。创作应有充分的自由,有广阔的天地,可以有独特的风格,有独特的题材,这些词句在作协报告中都可以用。

在讨论作协四大选举问题时,胡耀邦说,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党和政府直接领导的单位,另一种是人民团体,比如作协、文联、科协等,还有民主党派,这些团体愿意选谁就选谁。文联、科协、作协、妇联他们要选谁,宣传部门组织部门根本不要干涉,即便选的不理想,他们负责任。文联党组我们可以指定一下,主席、副主席愿选谁就选谁,我们不干涉,来个根本改革。作协谁当主席,他们选,副主席要多少就多少。如果这个名单是中宣部、中组部圈定的,不算数,撤掉!当夏衍问到不知这个名单是指令性的还是指导性的时,胡耀邦说既不指令又不指导,是无效性的。你们开个会,说中央没有定,自己选,秘密投票。我们

对作家连这一点民主都不给,说明我们太不相信自己的本领了。群众路线这么多年来丢了多少了?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

会上确定胡启立代表党中央在四次作代会上致祝词。

起草讲话的任务落到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林涧青的头上。他起草文稿习惯三人组合,这次书记处会议后第二天,他就找陈进玉和我帮他一起工作。他是没有理论家头衔的理论家,有名的文章高手。他具体主持写作过《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等一系列重要文章,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十二大以后参与领导起草过中央许多重要文件,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他是起草组组长。这次起草作代会祝词,主要由他口述,我们敲边鼓,用了半天时间,就弄出了一个稿子。内容大致是当前经济、政治、文艺战线的形势,文艺要为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服务,遇到不好的作品要用评论的办法解决,不要禁止和围攻,党过去领导文艺工作的“三个不正常”,几个应帮助作家解决的问题。林涧青的考虑是将胡耀邦在书记处会议上讲的那些重要内容留待在即将召开的第五次全国文代会上中央的祝词中去讲,所以就没有展开去多说。稿子很短,约1800字左右。

胡启立看后,对稿子不满意,觉得稿子分量不够,要重写。

12月27日上午刚上班,胡启立就来到林涧青的办公室,我也在场。胡启立一落座就开门见山地说:这个稿子我看了,太单薄了,太短了。接着,他就稿子写什么提出明确要求。他直截了当地说:这次就发个创作自由的信息。张光年着重讲作家自己的创作自由,创作自由的外部条件他不好讲,我们多讲讲。发两个信息,一个是创作自由,一个是工作重点的转移。

先讲讲尽快发展生产力,使人民尽快富裕起来。中央发表了经济改革的决定,对外开放,搞活经济,意识形态、观念都要发生深刻变化。新情况层出不穷,要跟上,要反映,就要深入生活。从这里引出对作家的希望。

要表现时代,除了深入生活外,创作要自由。

列宁讲三个“自由的文学”。创作自由,“双百”方针,我们一直在讲,但贯彻得不好,与多年的“左”分不开。耀邦讲“三个不正常”。

他说,创作自由受到考验的时候,往往是在出了出格的作品、有问题的作品的时候。过去是一见就批,就处分。上纲上线批,组织处分,谈虎色变。他强调,“评论自由是创作自由的一部分,要保证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作家不怕评论,怕由此而来的组织处分。要一手保证创作自由、评论自由,一手保证受批评后的政治权利、组织权利,保证不受政治影响,保证不因为写了不好的作品而被打成反革命。”“保证安全与创作自由、评论自由不可分,不然都有顾虑。要明确讲清这个政策,保证创作自由。”胡启立好像预料到有人会攻击提倡创作自由是提倡什么“绝对自由”,“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似的,特意给自己设了一道防线,明确指出,我们所说创作自由“是在不违法的前提下,耀邦讲过这个话”。

胡启立的谈话观点明确,十分正确,非常重要。核心是保证创作自由,不要因为作家写了有点问题的作品就上纲上线横加批判,就给予组织处分。这是对党领导文艺工作多年来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清除精神污染”经验教训的总结。

遵照胡启立的意见,林涧青立即重新开始起草。鉴于陈进玉已出差外地,林提请胡启立从中央办公厅办公室再派一位同志前来参加起草。不一会儿,高运甲就来了。

由于指导思想明确,进展十分顺利。当天上午就完成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包括:形势和队伍;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成绩和缺点;创作必须是自由的,党、政府、文艺团体和全社会都应坚定地保证作家的创作自由,党和国家要提供必要的条件,创设必要的环境和气氛,同时,作家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整个创作活动,也要同党和国家提倡的这种自由环境相合拍;要加强法制观念,坚持“双百”方针,对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失误和问题,除构成刑事犯罪外,都只能通过文学评论即批评、讨论和争论来解决,必须保证被批评的作家在政治上不受歧视,不因此而受到处分或其他组织处理。这些重要内容,上午基本上完成了。午饭后,我和高运甲起草了后面几段。林涧青下午上班审阅后,又一起从头至尾边读边改过了一道,就付

印了。

12月28日上午,胡耀邦主持会议讨论祝词稿。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提了,这个好,不准确。不用这个概念,但也不要说过去不对。提“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封建主义遗毒”。他要求把束缚人们手脚的语言再推敲一下。他强调要把创作上的问题与法律上的问题严格区别开来,创作上出现的错误,通过评论来解决。他还说,文艺要焕发民族的意志力量,使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有大的提高。党对文艺问题少讲为好,有时会不自觉地成为棍子。要多讲些鼓舞性的话。其他同志也发表了一些修改意见,如文艺要反映时代,帮助人们推动时代前进,鞭挞落后的、阴暗的东西等。

当天下午,根据上午会议的意见,我们又改了一道。主要修改之处是:将原来的“除了按照宪法和法律确实构成刑事犯罪,应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者外,都只能……”改为“只要不违反法律,都只能……”;将原来的“我们的创作自由,就是作家能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自由地为社会主义服务,自由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那种抽象的自由,更不是那种损害社会利益和妨碍别人自由的所谓自由”,改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作家会珍惜和正确运用这种自由,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都是从正面讲,更积极一些,亲和一些,给人以宽松、宽容之感,但法律的界限还是非常清楚地立在那里的,是不能违反的。此外,还补充了一些重要论点,如:“事实证明,我们的作家队伍是一支好队伍,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文学是时代精神的表现,并且是推动时代前进的力量”;“鞭挞消极的、腐朽的思想和社会现象,用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教育人民”等。其他就是一些技术性的修改和文字上的打磨。经过修改,论述更加集中、精当,文字更加凝练、准确,文气更感宽容、大度、亲和,但又非常严谨、周密,无懈可击。

29日上午,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首都隆重开幕,胡耀邦、万里、习仲勋、谷牧、胡启立、乔石、薄一波、王首道、刘澜涛、段君毅、周谷城、严济慈、胡愈之、张爱萍、康克清、肖华、叶圣陶等出席了开幕式。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大会致祝词。《人民日报》的报道说:

“祝词赢得了全场极其热烈的掌声”。听与会同志说,走出会场时,人们笑逐颜开,欢欣鼓舞,心情振奋。

在会上曾发生过一个有趣的现象。当胡乔木、邓力群分别用电报和电话向大会表示祝贺时,会场上响起了一点礼貌性的掌声。而当周扬从医院打来电话祝贺大会成功时,虽然只有一句话,一句极为普通的话,却在全场激起了长达两分钟的热烈的掌声。掌声反映了人心和民意。

对祝词,对四次作代会,当时就有两种不同反应。文艺界一位权威的老人说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但也有一位党政大领导说这“是一个反党的会议”。

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横遭批判的时候,对四次作代会和祝词的批判达到了顶峰。批判按照胡耀邦以及胡启立的意见起草的这个祝词“没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提倡“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主调搞错了”。事实上在开始起草祝词时,胡耀邦和胡启立就明确指出我们提倡的创作自由“是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的创作自由,他们中不论谁都没有讲过“没有前提的,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谁都没有这样的思想,其他有关同志也没有。至于说“两个不提”,一个是“清除精神污染”,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就不用再提它了,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一个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这个概念有不同看法,认为这个概念不够科学,这次不用这个概念了,不用这个概念,并不是不坚持党的领导,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祝词的发表“赢得了全场极其热烈的掌声”,受到文艺界、思想界的热烈欢迎,就是明证。毛泽东说过:我们应当说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祝词受到大家的“极其热烈”的拥护和欢迎,难道能说大家都是“极其热烈”地拥护和欢迎不要党的领导、不要社会主义,“极其热烈”地要“离开”党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吗?真是太不可思议、太不合情理、太不符合事实了!

不错,在祝词中的确没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词组。但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

神却一点也不少,粗粗一查,“社会主义”至少达15处之多;“党”和“党的领导”更是多得不计其数,还提到了列宁、毛泽东、邓小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现了两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各有一处,“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不违反法律”也突出地讲到了。说祝词“没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单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子虚乌有。

更重要的是,从祝词的思想内容和精神实质来看,祝词从头至尾贯穿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贯穿了改革开放创新的精神,贯穿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指责祝词没有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完全是空穴来风,凭空捏造。

祝词不论是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所起的重大作用的论述,关于我国作家根本任务和社会使命的论述,关于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成绩和缺点的论述,关于创作自由的论述,还是希望作家深入生活的论述等等,都充分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根本不存在什么“离开”党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倡所谓“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的问题。白纸黑字俱在,无须多言,这里仅举两段为例。一段是,祝词在从理论上阐述了社会主义文学是自由的文学后说:“我们党、政府、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都应该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对于创作自由来说,党和国家要提供必要的条件,创设必要的环境和气氛。同时,作家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整个创作活动,要同党和国家所提供的这种自由环境相合拍。为此就必须尽最大努力,去认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认识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反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的遗毒。这样才能使自己真正进入自由创作的境地。我们相信,我们的作家会珍惜和正确运用这种自由,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一段是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坚持“双百”方针,指出:“在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失误和问题,只要不违反法律,都只能经过文艺评论即批评、讨论和争论来解决,必须保证被批评的作家在政治上不受歧视,不因此受到处分或其他组织处理。进行文艺评论必须采取

平等的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简单粗暴,不要‘无限上纲’,不要戴政治帽子。允许反批评。”这是祝词在谈到创作自由的外部环境时的两个重要段落。这里有一丝一毫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地方吗?是在提倡什么“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吗?一点也看不出来。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不能违反法律,这是个大限。我国现行法律,包含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自然也就包含了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在内。把创作自由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认为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反对创作自由,要提倡创作自由、评论自由,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正是我们过去多年唱惯了的老调。

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前提”、不受“限制”的事物,这是普通的常识。地球的存在以太阳为前提,人类存在以地球为前提,人的生命的延续以饮食男女为前提,等等,哪有什么没有“前提”、不受“限制”的东西呢?创作自由的“前提”和“限制”就是法律。法律既赋予作家以创作自由的权利,同时,作家也只有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才能自由地行使这种权利。祝词讲明了这个大道理。硬要说祝词是在提倡“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第一,不符合实际;第二,真没有道理。不管出自何人之口,出于何种目的,都不能成立。

“创作自由”的口号,由中央领导代表党中央在文献中正式提出,加以提倡,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两个不提”:“清除精神污染”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提,颇具慧眼和胆略。人民团体的选举亦富有创意。既然是选举,当然要尊重民意,大家愿意选谁就选谁,这并没有什么不对,总比我让你选谁就选谁好一点吧?恐怕走遍天下都是这个理。选举当然不一定都能保证选上最理想的人,下次再选就是了。四次作代会的指导思想没有错,“主调”和主流完全正确。在我们党内,多年来有个很坏的毛病,就是只能听一种意见、一种声音,不允许有别的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一听到点逆耳之言,就以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次作代会之所以犯了大忌,其实也就是讲了点我们党过去没有讲过的新话,一般人不敢讲的真话和实话。现在人们可以看得清

检讨：转型期朱光潜的另类文字

● 商昌宝

随着 1949 年的到来，对于现代中国作家来说，无疑将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尽管有胡适、傅斯年、梁实秋、苏雪林、苏汶、胡秋原、力匡、南宫博、秋贞理（司马长风）、刘以鬯、张爱玲、曹聚仁等前后选择离开大陆或滞留国外，但绝大多数的作家却选择了留下。在留守的作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北大教授朱光潜。朱光潜的引人注目是因为他不单是一个名噪一时的文艺研究权威、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士，而且还是一贯标榜自由主义并与左翼和革命文学一直龃龉的作家，同时他还身兼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位列国民党“抢救学人”计划中的第三号人物。正是这诸多复杂的身份和背景，使得他在 1949 年后接连不断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具有代表意义。当然，朱光潜也与他一贯的不温不火的态度应对着、配合着、适应着。

《自我检讨》开新中国检讨之先河

1949 年 11 月 27 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朱光潜的《自我检讨》，开了新中国之检讨先河。文中，朱光潜以一个思想改造初步完成者的姿态，不无愧悔地写道：“中国人民革命这个大运动转变了整个世界，也转变了我个人。我个人的

转变不过是大海波浪中一点小浪纹，渺小到值不得注意，可是它也是受大潮流的推动，并非出于偶然。”“我的父祖都是清寒的教书人。我从小所受的就是半封建式的教育，形成了一些陈旧的思想，也养成了一种温和而拘谨的心理习惯。”他接着写道：“自从北京解放以后，我才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的作风到共产党的作风简直是由黑暗到光明，真正是换了一个世界。这里不再有因循敷衍，贪污腐败，骄奢淫逸，以及种种假公济私卖国便己的罪行。任何人都会感觉到这是一种新兴的气象。从辛亥革命以来，我们绕了许多弯子，总是希望之后继以失望，现在我们才算是走上大路，得到生机”。朱光潜在文中还谈及自己已经学习了《共产党宣言》、《联共党史》、《毛泽东选集》以及关于唯物论辩证法的著作，并深有体会地说：“在这方面我还是一个初级小学生，不敢说有完全正确的了解，但在大纲要旨上我已经抓住了共产主义所根据的哲学，苏联革命奋斗的经过，以及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他还说：“从对于共产党的新了解来检讨我自己，我的基本的毛病倒不在我过去是一个国民党员，而在的过去教育把我养成一个个人自由主义者，一个脱离现实的见解偏狭而意志不坚定的知识分子。”最后，他表示，自己愿意继续努力学

楚，四次作代会从当时的实际出发，总结我们党在领导文艺工作方面的历史经验，克服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偏颇，提出了保证作家创作自由的大政策，是一次“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会议，一次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的会议，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之所以在文艺界受到广泛的热烈的欢迎，不是偶然的。

从胡耀邦在 1987 年初落难以来，祝词和这次会议一直在受着不公正的待遇。没事说成有事，好事说成坏事。历史早已昭然若揭，现在旧事重提，

无意挑起争论，只是作为曾经参与此事的人，偶然发现胡启立当年那次谈话的简单记录，勾起一段往事的回忆。愿在此披露真相，供世人共享。林涧青已经过世，那次胡启立同他的谈话，只有我们两人在场，我若不讲，将无人知晓。我想，对四次作代会祝词和四次作代会，人们只要秉公而断，尊重客观事实，从实际出发，是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的。这也是一桩冤假错案，应当平反昭雪。

（责任编辑 徐庆全）

习,努力纠正毛病,努力赶上时代与群众。翻看当年的材料可以发现,朱光潜的《自我检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第一份检讨。如果将其置于此后的检讨浪潮中,可以说,朱光潜无形中开了检讨之先河。

《自我检讨》发表之后,朱光潜还多次撰文谈及自己思想转变的心得体会。截至1957年底,他先后撰写了《关于美感问题》、《致留美某同学》、《从参观西北土地改革认识新中国的伟大》、《从土改中我明白了阶级立场》(注:此文未收入《朱光潜全集》)、《最近学习中的几点检讨》、《我是怎样克服封建意识和买办思想的——最近的学习与自我批评》、《澄清对于胡适的看法》、《我也在总路线的总计划里——学习总路线的几点体会》、《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百家争鸣,定于一是》、《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些体会》、《我们有了标准》、《不能先打毒针而后医治》等多篇文章。可以说,在这些剖析和检讨自己的文章中,朱光潜思想转变的历程基本呈现出来。

仔细研读朱光潜的检讨文本,再对照1949年后的表现,可以判定他的思想变化是很大的。不过,这种变化是复杂的,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点可以从他不断升级的检讨中看出。可以说,在第一个“自我检讨”中,朱光潜虽“主动”检讨了自己,但在行文中却很难读出政治运动的紧张感和压迫感,相反却有一种闲庭信步之感。例如在揭批自己的错误事实时,他说:“我向来胡乱写些文章,报章杂志的朋友们常来拉稿,逼得我写了一些于今看来是见解错误的文章,甚至签名附和旁人写的反动的文章。”谈到思想根源时,他说:“我的父祖都是清寒的教书人。我从小所受的就是半封建式的教育,形成了一些陈腐的思想,也养成了一种温和而拘谨的心理习惯。”“假如说我有些微政治意识的话,那只是一种模糊的欧美式的民主自由主义。”这样的感觉在稍后发表于《文艺报》的《关于美感》中仍延续着。文中,针对蔡仪、丁进的批评,他答复说:“我的见解大半是融合当时流行的多数美学家公认的见解而成的,现在从马列主义的观点看,有许多地方是错误的或过偏的(二十年前的书有几部能免这些毛病呢),这一点我愿意坦白地承认。”但他随

即“狡辩”说:“任何书籍都难免有错误,我承认我的两本幼稚的书不能例外或是我所介绍的学者们就已经错误,或是我把他们介绍错误了。”可见,此时他还能坚持“一边……一边”的“迂回战术”。

在疾风劲雨式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这种“战术”便自动消失了,或者说他开始真正“触及灵魂”了。如同样是揭示“错误”历史,他在《最近学习中的几点检讨》中说:“在抗战中武汉大学教务长任内,终于加入了国民党,又以高级职员的身份调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过训,接着替《中央周刊》、《周论》、《独立时论社》之类的反动刊物写了些反动的文章,任过伪中央委员的名义,在北京还赴过蒋介石的宴会。”在谈到思想根源问题时,他说:“影响我最大的是受剥削阶级的封建教育。……后来自私自利,妥协动摇,都与这封建的家教有关。”他还就自己的自由主义主张检讨说:“事实上主张超政治便是维护——至少是容忍——反动的统治,如果加以鼓吹,也便是反革命。……在革命和反革命的猛烈斗争中标榜‘中间路线’,鼓吹‘超政治’,迟早总要卷进反动政权的圈套里去,和他‘同流合污’。”可以看出,朱光潜此时对自己思想的挖掘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多年后,常风先生在《回忆朱光潜先生》中说:“我没有见过哪一位批判对象写过他那样认真的检查,厚厚一本总有几十页,说不来他写过几本。他的检查是很全面的,他的反动立场、他的反动思想、学术观点等等,都一一检查到了。在写检查的同时,他还学习马列著作提高他的认识水平和批判能力。思想改造后大家谈论起来,都说朱先生写的检查是很深刻认真的”。

在检讨中被自觉异化

在接连不断的思想检讨中,朱光潜对很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如1954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我也在总路线的总计划里面——学习总路线的几点体会》一文中,他在谈到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时辨析说:“国家把我摆在高等学府里担任培养干部的工作,这是一个极光荣的任务;肯把这任务交给我,是对我有极大的信任,是把我当做一个人。”“为了总路线的胜利,我就必须忠心地

遵守这个总计划,尽我的一分力量,起我的一分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朱光潜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将个体的“我”置于集体的“我们”中。关于这一点,在1956年他发表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中得到进一步的确认。文中他写道:解放以来,自己“一直存着罪孽的感觉,渴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学好一点,先求立而后求破,总是要有一天把自己的思想上的陈年病菌彻底清除掉”。然后他对自己过去的文艺思想从根源上、总体上作了相当全面而深刻的否定。他说:“我的文艺思想是从根本上错起的,因为它完全建筑在主观唯心论的基础上”,“必然是反现实主义的,也必然是反社会、反人民的”,所谓的“移情说”、“距离说”都是“艺术即直觉”的“补苴罅漏”,无非是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来批判唯心主义的逻辑方法。他还说:自己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感觉是“‘相知恨晚’!是欣喜也是悔恨”。后来,在谈论“百家争鸣”的问题时,他在《从切身的经验谈百家争鸣》中断言:“我敢说,将来在我的思想中战胜的不是唯心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看得出,朱光潜在“立”与“破”的问题上确实是做过深入思考的,这在《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评蔡仪同志的美学观点》、《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等文中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而这个探求“立”的过程在1957年发表的《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些体会》中得到理论上的进一步升华。文中他刻意指出,对于像自己这样“毛病更深沉更显著”的人来说,“毛主席的讲话简直是个当头棒,打得准,而且打得狠”,不但“对于过去文艺界的病根作了切中要害的诊断”,而且“对于要摧毁什么和要建立什么也给了切中要害的处方”。他指出:文艺界的未来是属于新生的工农兵作家的,所以“我们绝不应把眼光放在已经有些成就的专业的作家身上,还应更多地注意培养这批新生力量”。可见,朱光潜此时已经开始具备了主人翁的责任感。

历经多次政治运动的洗礼,朱光潜已经开始学会顺应时事,见风使舵。如在“反右”刚开始,他便急忙撰写了《我们有了标准》一文。文中,他开篇便写道:“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正式公布,是从二月底以来,我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久已渴望的一件大事。在对反

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思想言论进行批判中,这篇文件的公布是很及时的。”随后他又在《不能先打毒针而后医治》中详细地阐述了“红”与“专”的问题,他说:“所谓‘红’与‘专’的问题也就是这两条路线的生死斗争问题中的一部分。……离开‘红’而讲‘专’,那是什么样的‘专’呢?很难想象,我们既然要跟着党走向社会主义,同时还要培养出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专家’,来腐蚀我们自己,消灭我们自己。”他还剖析说:“我们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移交下来的,这批人在踏上新社会以前,在不同程度上已经在资产阶级制度和教育下不同程度地各有所‘专’。这是脱离‘红’的‘专’。到了新社会里,脱离红的‘专’,就是资产阶级路线的‘专’,所以,他们如果想用他们的一技之长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就不得不补课,接受社会主义教育,进行思想改造。”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是朱光潜面对压力而不得不为之的结果,但我们也要承认,如果思想认识上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恐怕难以写出这些颇富学理的文字。

朱光潜的思想转变不仅体现在自我剖析,还体现在寓检讨与批判的融会贯通,并通过二者有机结合来表明自己的思想进步。如思想改造运动中,他以《澄清对于胡适的看法》一文与胡适彻底划清立场。他说:“胡适在五卅时代便已站在反动的立场。反共,维持封建,拥护帝国主义,反对爱国运动,这是他始终一贯的基本态度。”然后他以大的篇幅对胡适进行了全面清算,并深刻分析了错误根源。他说,自己也曾同胡适一样犯过很多错误,但“有一点我和胡适较不同,他逃到美国,我还留在北京,向新社会学习。”他还进一步确证说:“有人或许还存幻想,以为胡适或许还可以改造。这是不明白胡适的本质。他曾盲目到底,反动到底的。他常自比‘过河小卒’,谁曾见过过河小卒能走一步回头路?”应该说,朱光潜批判胡适尽管有不得已的成分在其中,但是就所述的问题本身来说,他是比较切实地抓住了胡适的思想本质和现实表现。在“胡风反革命”事件中,他煞费苦心写了《剥去胡风的伪装看他的主观唯心论的真相》。文中,他对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进行了深入的学理分析和阐述,并将其整个文艺思想归结为一个等式:“创造过程 = 艺术实践 = 生活实

“帝国民主”的结局

● 雷 颐

1978年,中东石油大国伊朗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领导下进行的“白色革命”已整整15个年头了。在这15年中,由于石油价格的飞涨和国王的锐意革新进取,古老落后的伊朗正迅速脱离“传统”,在通往“现代化”道路上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取得了炫目于世的成就。经济繁荣昌盛,武备精良强大,似乎就要再现两千五百年前古波斯帝国的灿烂辉煌。但就在这年年底,权柄赫赫的巴列维国王却极出世人意料地被身披黑色长袍、头裹黑色缠头的毛拉们掀起的“黑色风暴”——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的“伊斯兰”革命所推翻。力量如此悬殊的“两种革命”彼此较量,结果竟是弱胜强败,而且“在这十五年

里,全国人民的愿望竟然完全翻了个个儿。这种颠倒是怎样发生的呢?”(《伊朗》费·胡韦达:《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第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其中必有深刻且引人深思的多种原因。

—

伊朗人为古波斯人的后裔,居鲁士大帝和大流士王在两千五百年前所建立的庞大帝国,为古波斯的全盛时期,我国汉史称安息。但随着帝国的倾覆,波斯先后被许多民族、国家征服。公元7世纪时,伊朗为高举伊斯兰教大旗的阿拉伯人所占领,伊斯兰教遂成伊朗“国教”。若细分起来,伊

践=自我扩张=思想斗争=思想改造=现实主义的最基本的精神”。最后他总结说:胡风与自己过去所站的唯心主义是一个文艺立场,所不同者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是赤裸裸的”,而胡风的“主观唯心主义是有层层伪装的。”平心而论,在众多批判胡风的文章中,朱光潜的这篇是最具学理意义的一个。“反右”运动刚拉开大幕,他便在《我们有了标准》一文中批评说:“我感觉到,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如果听任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之流横行无忌,天下固然就会大乱;如果广大群众之中有很多的人都像我这样思想模糊,‘见怪不怪’,天下也未必就能安宁。”接着,他又撰写了《不能先打毒针而后医治》。他在文中说:“在科学领域里,离开‘红’而讲‘专’,那就成为钱伟长、费孝通之流的‘专’……;在文艺领域里,离开‘红’而讲‘专’,那就成为冯雪峰、丁玲之流的‘专’……”“反右”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他有针对性地撰写了《罗隆基要把知识分子勾引到什么道路上去?》一文。文中说:“罗隆基一再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有代表大知识分子的资格。这是

对于知识分子的侮辱。要说罗隆基代表知识分子,他也只能代表知识分子的最落后的一面。”他还杜撰了罗隆基“向党进攻”的“三大步骤”:即“招兵买马”;“秀才造反”;“引狼入室”。最后他说:“罗隆基这一批右派分子是要利用知识分子来造反,搞资本主义复辟,其结果只是把中国带到殖民地的道路。”当然,朱光潜这种划清界限、落井下石也是大形势下的必然,其中迎合主流意识的倾向也是比较明显的。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在“极左”的政治环境下,想要独善其身是很难的。但也要知道,通过这些另类文字可以看出,朱光潜的思想已经发生了扭曲。

今天再重新挖掘出朱光潜特定历史时期的另类文字,不是为了展览猎奇,也不是为了揭人伤疤赚个人的快意,而是要借这些尘封的历史文献以回到历史现场,并认真反思当年的“穷折腾”,以及在这样的“折腾”下知识人的精神和灵魂是如何的被扭曲,顺便也提醒当下喧嚣一时的新、老“左”派勿忘历史。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朗人皈依的是伊斯兰教中的什叶教派。伊斯兰教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教合一,《古兰经》不仅是宗教信仰和礼仪的规范,也是俗世社会必须遵从的行为准则。而诸如教育、司法等领域,更是必须由神职人员掌握。

在漫长的历史中,伊朗逐渐衰败。18世纪末,伊朗东北部的土库曼人恺加部落统一了伊朗,建立了恺加王朝。由于地处东西交通要冲,所以近代以来便成一些欧洲大国的争夺对象,屡遭侵略。1801年俄国兼并格鲁吉亚;英国同伊朗三次战争导致伊朗割地赔款及承认阿富汗独立。此后法国、奥地利、美国等相继强迫伊朗订立了不平等条约。19世纪下半叶,英、俄攫取了在伊采矿、筑路、设立银行、训练军队等特权。1907年,英、俄两国签约划分了在伊的势力范围:北部属俄国,南部属英国,中部为缓冲区。伊朗虽然名义上仍是“独立”国家,但实际分别置于英、俄的影响甚至直接控制之下。若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往昔的辉煌与今日的耻辱形成鲜明对照,伊朗在追求复兴强国的路上必然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而强烈的民族主义又很容易导致笼统、盲目的排外思潮。

与中国类似,伊朗的一些志士仁人也是为了“救亡”而提出“宪政主义”的。他们认为学习西方限制国王权力的改革是国家强大、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根本之策。所以,伊朗的“宪政主义”与“民族主义”一开始就缠结在一起。进一步说,如果没有“救亡”就很难有“启蒙”,更没有“启蒙”的进展。但正因如此,“启蒙”确又很容易被“救亡”压倒。1905-1911年,伊朗发生了“宪法革命”,穆罕默德·阿里·沙国王被迫召开议会,制定了伊朗第一部宪法。虽然有宪法,但无人遵守,因此伊朗政治陷入混乱之中,与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亦有类似之处。长期的政治混乱为军人或曰军阀夺权创造了条件。1921年,一位目不识丁但因军功显赫升至高位的哥萨克武夫礼萨·汗发动政变推翻了软弱的恺加王朝,自任陆军大臣,接管了政府权力,又于1923年取得首相职位。最后,他干脆在1925年以议会的名义废黜国王,自封为王,正式建立巴列维王朝。

礼萨王急欲使国家富强起来,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大规模土地改革,废除一些不平等条约

等,因此获得广泛支持。伊朗邻国土耳其在基马尔领导下进行的政教分离的现代化运动使礼萨王印象极为深刻,决心效仿基马尔,在伊朗也推行政教分离的现代化运动。他组建了现代的国家军队,创办一些用大机器生产的工厂,修筑铁路和公路,并从神职人员手中夺回教育和司法权,创建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现代学校体系,用俗世的科学知识取代神学教育,建立了以法国法制为蓝本的现代司法体系,以俗世的民法取代伊斯兰法,尤其不准教会干政。为了移风易俗,他提倡穿西装,并要妇女摘去遮盖了千百年的黑色面纱。这些自然遭到宗教势力的强烈反对,王室同教会发生激烈冲突。为镇压教会,国王曾率兵前往什叶派领袖居住地库姆,公然无视伊斯兰最基本的戒律,穿着马靴踏入神圣的清真寺,用手杖抽打一名德高望重的阿亚图拉。他终于用残酷的手段使教权屈服于王权,但为此实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种下了群众基础极广的教会与整个巴列维王朝彼此间数十年的仇恨之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云中,具有亲德倾向的礼萨王(他在20世纪30年代为强调波斯属雅立安人种而把波斯改名伊朗)在英国和苏联的压力下被迫于1941年退位,将王位交与自己年仅二十二岁的儿子巴列维。

二

从小留学欧洲的巴列维国王登基时以花花公子著称,毫无政治经验,自然形同傀儡。经过十几年的政坛磨炼和几次重大政治危机后,巴列维国王终于大权在握,于1963年开始了雄心勃勃的“白色革命”,想借此使伊朗在2000年成为“世界第五工业强国”。这个一揽子的现代化/世俗化方案,一开始就遇到以威望极高的霍梅尼为领袖的什叶教派的激烈反对,以至双方于1963年初夏在德黑兰街头发生流血冲突。结果当然是以国家军队对教会力量的血腥镇压而告结束,阿亚图拉霍梅尼被迫流亡国外。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此举已摧毁了什叶教派抵抗运动,神职人员已经就范,曾任美国驻伊朗大使的W·H·沙利文写道:“国王自己也认为,从此可以放手推行他的现代化、西方化以及世俗化

计划,不再会遇到什叶教派的严重抵抗了。”((美)沙利文:《出使伊朗》,第6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此后,便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给伊朗带来巨大变化的“白色革命”。

巴列维国王在《白色革命》一书中对这一“革命”作了详细的说明。他声称:“导致这场革命的根本思想是:权利应归全民,而不得为少数人所垄断。”“我们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革命,一举结束一切社会对立和导致不公正、压迫和剥削的因素,消除一切妨碍前进,助长落后的反动势力,指出建设新社会行之有效的办法。而这些方法也要与伊朗人民的精神、道德、国家的自然气候、地理条件、其民族特点、民族精神和历史传统相适应,并能尽快地使我们达到和赶上当代世界最先进社会前进的步伐的目标。”当然,他意识到:“这些方案和计划有两个因素对我们来说是基本的和神圣的:一、依靠精神和宗教信仰——当然,就我们来讲,是伊斯兰教,二、是维护以至增加个人和社会的自由,使之能够得到空前的巩固和发展。”总之,“我们这场真正的革命,全部都遵循我指出的两个神圣的总原则,即:考虑精神和宗教的因素并维护个人与社会的自由,消灭一切剥削痕迹,消灭只对少数人有利而对大多数人不利现象。”所以要“进行土地改革来消灭封建主义和地主及雇农的关系;劳资关系也要建立在新的、工人不再感到他们是被剥削者的基础上”,还要提高妇女地位、消灭文盲等等等等。((伊朗)巴列维:《白色革命·前言》,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具体说来,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废除佃农制,把可耕地的四分之一分给三万多农户,但这却严重侵犯了教产。在城市把一些工厂企业出售给合作社和个人,向发达国家大量派遣留学生,兴办大量现代学校,培养了大批现代知识分子,对妇女的各种规条得到进一步放松。不能否认,这些使伊朗经济、社会迅速发展。许多巨型现代化工厂魔术般地出现在原本荒凉的田野,德黑兰由一座肮脏破败的小城一变而为举世闻名的繁华大都市,贫穷的伊朗突跃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而几乎成为财富的代名词,仅1974年就给国外贷款上百亿美元,并在两年内购置了价值6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国力迅速增强……

然而,在这举世公认的成就之下却潜伏着深刻、巨大的社会危机。这点,不仅巴列维国王当年没有意识到,大多数“观察家”也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不少人在剧变之后对此进行的探索、总结和反思,却依然发人深省。

“白色革命”使伊朗经济飞速发展,1968—1978年平均年增长速度为16~17%,按人口平均的国民产值从1960—1961年度的160美元跃增为1977—1978年度的2250美元。特别是1973年伊朗刚刚从西方石油财团手中收回主权,恰逢国际石油价格暴涨,国家每年的石油收入从40亿美元猛增至200多亿美元,从债务国突变为债权国。许多人都认为国内容纳不了如此巨大的资金,政府开始放肆花钱,不计成本、不顾发展平衡地大上项目,仅军费就从1970年的9亿美元猛增至1975年以后的每年100亿美元。而许多巨大项目又因不配套而闲置待废,反造成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经济环境的高度“紧张”,引发高通胀。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是贫困,而是这种巨大的财富吞噬了巴列维王朝。

另外,经济的发展明显与社会发展脱节。尽管有现代化机器,却严重缺乏合格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更缺乏现代化的管理人员。由于发展的不协调,形成了种种“瓶颈”,沙利文写道:“缺乏充分准备就投入建设庞大的工业企业,肯定会形成瓶颈问题。这些瓶颈问题往往是在同官僚机构打交道时碰到的。按照古老的波斯传统,官府的关键只需用钱就能买通。鉴于这些计划规模宏大、投资巨万,稍有拖延就会造成严重损失,因此行贿的金额十分惊人。结果,贪污盛行,涉及政府最高层,而且事实上也涉及了王室成员。据我看来,强制推行工业化计划所带来的贪污之风,是对国王及其政权的一个重大威胁。”(《出使伊朗》,第46页)正是种种骇人听闻的贪污之风(因篇幅所限,恕不细述)造成了整个社会道德的颓败,并逐渐对巴列维政权产生离心力。

人们认为,只有民主和法制才能有效反贪倡廉。但巴列维国王却不这样认为,因此始终无法制止愈演愈烈的贪污受贿之风。但面对愈演愈烈的贪污受贿之风,他不得不于1976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想以此监督贪官污吏。这种“自我监督”的机制自然收效甚微。然而,他至死都认为

“皇家调查委员会”是监督官员、反对腐败的最佳机制,在他流亡国外的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如此写道:“这是检查国家事务的现代化服务机构。在我看来,这种自我评价的办法比西方国家必须依靠‘忠诚的反对派’的办法更加可靠、更加公正。反对派的批评很少以客观情况为依据。可惜的是,同我们后来的许多条款一样,这一条也没有来得及取得成果。”而“他们要求‘真正的议会民主’,实际上只不过是蛊惑人心的宣传,结果将是对民主的歪曲与讽刺。这种民主常见于威信扫地的多党制。我所要的是增进我国实际利益的真正民主,但是,我的对手们对这个主张不感兴趣。”他仍然强调“只有在君主立宪制的庇护下,伊朗各级生活才能广泛实行民主化。”“因此,为了实现真正的帝国民主,就需要有一个君主从上边进行统一。”他还将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认为伊朗此时仍要首先发展经济:“没有白色革命,民主在伊朗将只是一种幻想,建立在饥饿、无知及物质和精神堕落基础上的民主只是一种讽刺,最终将成为民主最险恶的敌人。”(《伊朗》巴列维:《对历史的回答》,第126、151、131、182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版)

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巴列维的盟友,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对巴列维政权的专制统治又多有严厉批评,要求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西方新闻界对他的批评不必说更加强烈。面对种种批评,巴列维反驳说:“作为他们的同盟者,他们不顾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行不通,仍然希望我实现西方民主思想。”“新闻界,尤其是美国的新闻界经常是带有伊朗应该是什么样的成见,而不曾管它实际上是什么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会是什么样。伊朗被突然从中世纪推到现代技术发达的世界,把这样一个国家与有着几百年民主传统和文明史的国家相比就像拿苹果和橘子相比一样,它们简直无法比较。”“战后美国历史从来是要求其他国家,不论其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如何,都来效仿美国。”他坚持认为“民主是一个历史进程,无论是从下层开始还是从上层开始,它都不能由法令强制实行。我自己的经验表明,从上层逐步学着实行,比下层的大动荡要有效得多。”而且,“我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和义务实现或者是恢复伟大的文明。这就是为什么伊朗不能不保持其世

代流传的和带有普遍性的传统。”(巴列维:《对历史的回答》,中译本第19、20、21、183页)总之,他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他的批评是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他格外强调在政治制度方面一定要保留伊朗“世代流传”的传统和特色。

在自己的政权已被推翻、希望能自我监督的“帝国民主”已被证明错误时,仍强调“自己的经验”正确有效,真乃莫大之讽刺。从上层逐步实行改革确实要比由下而上变革大动荡要好得多,但前提是上层必须主动实行满足社会需要的变革。而问题经常在于统治者总是强调政治改革的条件不成熟,要“逐步”,结果却是总以此为理由拒绝或拖延改革,最后导致矛盾总爆发而错失“逐步”改革的机会。

不过,在伊斯兰革命中被伊斯兰法庭处决的前首相阿米巴·胡韦达的弟弟、曾任伊朗驻联合国大使的费雷敦·胡韦达事后对此则有清醒的认识,他反思说,没有进行民主的政治改革是腐败不止的原因,恰恰也是政治反对派得以发展的原因:“在国家发展的那个阶段,国王的基本错误并不在于加快经济发展,而在于对政治自由的疏忽。到1970—1972年,物质条件改善需要与民主齐头并进。这里,国王犯了严重的判断错误,放过了一些机会。”这样,清真寺就成为反对派的政治活动中心,因为“在一个不能够在议会发泄不满情绪的社会里,相对来说不可亵渎的圣地,自然就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中心。”(《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第53、5页)

“白色革命”曾经激发、造就了一批“现代”知识分子,胡韦达写道:“伊朗看起来沿着合理的方向前进,以至于许多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纷纷



德黑兰街景

参加了国王的现代化运动。我的一群朋友认为,真正的经济发展,必定会带来民主。因此,要做的事情是支持国王的改革,并且为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化提供动力。”(《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第47页)但巴列维国王长期坚持所谓“帝国民主”,使知识界逐渐产生了强烈的离心和对立倾向。但巴列维则坚持认为知识界疏离的原因在于“面对这么多新奇的事物,我们有些学生没有准备。他们思想还不够成熟,不知怎样对待显然是很舒适的新生活。”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所经历的困难”,“同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样”,经常提出过分的要求。(《对历史的回答》,第115、116页)

经济的发展虽使人民生活有了总体提高,但由于种种原因却造成了惊人的两极分化。“对于一小撮富于冒险精神的买卖人来说,‘白色革命’就好比一个聚宝盆,简直堆满黄金似的。”结果“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而且人数还在成倍增加”,一夜之间由一贫如洗暴富为百万、千万富翁的“奇迹”并不乏例。(〔法〕维利埃:《巴列维传》,第359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在围墙后面,一边是纸醉金迷,一边是民穷财尽,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在豪华的别墅里,这个国家的名门望族,用夸大自己、无视他人、歪曲事实的哈哈镜,装饰着他们富丽的厅堂。”(〔澳〕努斯鲍默:《霍梅尼》,第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仅一般百姓不满,而当后来国家财政危机,为降低通货膨胀而对新富阶层进行诸如加强税收、制止投机等某些限制、要求他们略微“牺牲”少许利益时,他们居然也加入到反对巴列维的行列中去了。

由于注重工业而忽视了农业,造成了农村的停滞,使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寻找谋生之路。沙利文写道:“他们来自保守的农村并受过严格的伊斯兰传统教育。他们来到西方化的现代城市,对违背他们基本是非观念的事物看不惯。他们的收入虽然比他们有生以来所能期望的还要高得多,但各种开支也使他们非常不满。他们眼巴巴地望着为进行投机买卖建起来待价而沽的高楼大厦空着没人住,而自己在德黑兰南部的贫民区,十几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他们看到政府官员和中产阶级乘坐有专职司机驾驶的奔驰牌轿车在城里来来往往,自己却因公共交通工具严重

不足而不得不拼命挤车。他们的失望和不满是大量的,而能使他们感到宽慰的事情又实在太少了。他们当中许多人吸毒成瘾,许多人盲目地以流氓行为来发泄心中的怨恨。”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出使伊朗》,第47页)

重要的是,巴列维与教会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教会在霍梅尼领导下一直坚决反对世俗化、西方化和现代化,与巴列维势不两立。巴列维曾通过人威胁霍梅尼说:“别让我穿上我父亲的靴子。”霍梅尼则愤怒地回道:“对你来说,你父亲的靴子还大了好几号呢!”教会认为“白色革命”不仅侵犯了教产,而且还败坏了道德。德黑兰街头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电影院、酒吧间、赌场、豪华酒店和日益泛滥的色情业是道德严格的伊斯兰教无论如何无法容忍的。使教会认为国王犯下死罪的是,他把两千五百年前居鲁士建立帝国看做比此后一千年先知穆罕默德被迫从麦加流亡一事还要重要,实则用居鲁士反对穆罕默德。他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和仪式将自己作为居鲁士的合法继承人,并在1977年修改历法,不从回历算起,而从居鲁士缔造波斯帝国时算起。此举引起举国愤怒,为他垮台的一个因素。在一年后的满街抗议声中,国王不得不收回成命,恢复伊斯兰历法。

霍梅尼虽长期流亡国外,但在国内影响极大,始终坚信真主、真理、正义、道德在自己一边,以“简朴、自由和公正的生活”为号召,坚持进行反对国王的原教旨主义革命。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为要净化信仰、纯洁道德、在人世间建立完美理想社会的原教旨主义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社会愈是腐败不堪,原教旨主义的吸引力就愈大。对完美社会的追求,是深植于人类的天性之中的。

这样,巴列维就不得不面对要求扩大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和要求恢复传统的宗教人士这两方面的反对。曾经支持“白色革命”、现在进一步要求扩大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民众认为巴列维此时已过于保守、过于强调伊朗传统和特色拒绝政治改革而反对他;力量强大、一直反对“白色革命”的宗教界人士和另一部分民众却认为他的经济、社会政策完全违背了传统、违反了教义而反对他。当面临这两种力量从相反方向

的共同反对时,“白色革命”就岌岌可危了。

三

“白色革命”引起的种种社会矛盾一直未获解决,问题越积越多,危机越来越深。胡韦达记述说:“伊朗 1977 年的情景,就像一群饿鼠吞噬一块肥肉一样。”1978 年秋,对国王的反对终于公开爆发,迅速扩大。反对者来自社会各界:“工人、知识分子、市场商人、戴或不戴面纱的妇女、缠着黑色、绿色和白色头巾的教士、孩子、青少年、穿西服的富人和衣衫褴褛的穷人。”(《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第 105、145 页)“对人民的疏远和苛求、工艺技术进步和政治僵化之间的明显矛盾,是不幸的主要根源。它们最终败坏了国王的所有工作,尽管这些工作的本意无疑是好的”。(《霍梅尼》,第 69 页)1979 年 1 月中旬,巴列维国王终被推翻,逃往国外,“伊斯兰共和国”宣告成立。霍梅尼的基本原则是国家决不能凌驾于宗教之上,任何违反伊斯兰教的法律实际上都是违法的。而因争取民主自由而坚决加入反对巴列维行列的“穿西服”的知识分子,此时方深有所悟,其中一些人后来亦不得不逃往国外。

当然,也有人事先看出了某些征兆,法国作家维利埃在 1976 年出版的对巴列维充满赞誉之辞的《巴列维传》一书的最后坦率写道:“伊朗孩子们要学会读和写的三个词,就是:Koda, Shah, Mihane(真主、国王、国家),说不定到了某一天,其中的第二个词儿甚至就可能给消灭掉了。”(《巴列维传》,第 362 页)不过,他也只说对了一半:他是根据“通则”认为经济的发展将促进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生,而没有料到伊朗的“特例”,最终促发的却是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义革命!

“白色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巴列维始终反对民主宪政,始终认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西方的“地域性”制度而不是一种现代经济制度所要求的普适的制度和价值,因此认为别人对他种种批评只是他人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所以他一直强调用伊朗特色对抗民主政治,别人明明是为他好,他却认为是害他。他没有认识到,不同国家的宪政确会因历史、文化传统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和特点,但对权力的制衡、限制这种精神却

是相通的。然而他只想要现代经济制度,却不要现代政治制度。伊朗人民生活水平确因“白色革命”大大提高,巴列维便据此认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能一直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他没有意识到,当温饱得到保障后,人们对贪污腐败、社会不公便格外不能容忍。事实说明,只有权力互相制衡、限制的民主宪政才是防止、反对腐败的有效措施和根本制度,而由皇家掌握大权自我监督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根本无法制止腐败;“帝民主”其实并无民主,已成笑谈,最终难逃被推翻的命运。他的所作所为,正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天堂有路偏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可惜,直到临死他都未能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

“白色革命”的失败也凸现出了改革不彻底的困境。不彻底的改革必然弊病丛生,在经过了改革初期的繁荣阶段因而普遍支持改革后,人们对种种弊端的感受必将越来越强烈。因此,是以继续改革来克服种种弊病,还是以此质疑、否定改革而回到旧体制,这是身处改革/社会转型中的人们不能不面对、不能不认真思考的。

(责任编辑 萧 徐)

2010 年第 8 期更正

《斯大林模式今天怎样影响我们》一文中说到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存在了 80 多年,该论断不正确,应改为 70 多年。

《朱厚泽的到任和离职》一文中提到 1986 年 12 月 8 日,“安徽工业大学上千学生上街游行”,其中“安徽工业大学”应改为“合肥工业大学”。

《王飞、李慎之与毛泽东秘书谈民主》一文中说“9 月份中共召开的八大宣布,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了”,据查,八大认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非“先进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一厘米主权”与赵作海的生死》一文中提到“1977 年 12 月,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上任伊始,他便大力平反历次冤假错案,摘掉了所有右派分子的帽子”,其中“摘掉了所有右派分子的帽子”表述不准确,“所有”应改为“绝大部分”。文中另外提到“广西柳州放水淹没防空洞里对立派别的群众”,其中“柳州”应为“南宁”。

“不须放屁”难倒全国人民

● 毕星星

批林批孔开始以后,我被调到北京部队的写作小组。那是中国人“倒过来”走路,以头脑支撑身子的时代,意识形态的位置至高无上,写文章是空前吃香的行道。各部队也都纷纷成立写作小组,拉起一支人马,吃了饭专门写文章。或者歌颂中央的新决定,或者批判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我分在文学艺术这一摊,那就或者评《水浒》批宋江,或者赞颂革命样板戏,文章是写了不少。那是典型的遵命写作,那个时候也没有明白自家的脑袋还要自家思考,顺着上头精神拼凑文字就是,这一年倒还顺利。

“文革”中间,每年元旦,《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即所谓“两报一刊”都要发一个元旦社论,等于总结一年,传达中央新精神,展望未来,号召为什么什么而奋斗而奋勇前进之类。“两报一刊”是当时舆论阵地的制高点,它的社论基本上等同于中央文件的细化论述。大部分看不上中央文件的老百姓,就依靠“两报一刊”社论,猜度又要让全国人民干什么了,因此举国上下都非常重视。

说话就到了当年12月,年底年初我们要写什么?大家都在猜测,打听。不久,我们听到说,元旦各大报刊要发表毛主席的两首新词,毛主席的指示肯定是报刊一个时期的宣传中心,今年初的宣传,看来要围绕这两首新词做文章了。

不久写作组就得到了两首新词的复印件。现在办公自动化,拾破烂的都会把自家的身份证复印了交到派出所。那时的复印机可是稀罕,怕是中央机关才有。听说这东西文件一过,呼啦啦就会出现一模一样的另一份,我这个乡巴佬只觉得神奇的了不得。两首新词的复印件很快传到手上,领导告诉我,虽然不是主席亲笔,那上面的字儿可是照着原来手写的手迹复制下来的,不差一分一毫。还是大机关好,距离中央近,下边老百姓

稀里糊涂还在东张西望不知道明年又要咋整,我这里这么快就看到了毛主席的真迹,我实在兴奋又骄傲。

毛主席的两首诗词是《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前一首里边的名句,比如“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很快成为全国一派大好形势的形象化表达,至今依然有人袭用。“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也很快成为中国人民横扫一切害人虫的决心誓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则是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口号。后一首《鸟儿问答》原词是这样:

鲲鹏展翅九万里 / 翻动扶摇羊角 / 背负青天朝下看 / 都是人间城郭 / 炮火连天 / 弹痕遍地 / 吓倒蓬间雀 / 怎么得了 / 哎呀我要飞跃 // 借问君去何方 / 雀儿答道 / 有仙山琼阁 / 不见前年秋月朗 / 订了三家条约 / 还有吃的 / 土豆烧熟了 / 再加牛肉 / 不须放屁 / 试看天地翻覆 //

因为是毛主席的新词,我当然要仔细看。“秋月白”的“白”字,被主席划掉,改成“朗”,“朗”好在哪里呢?我不明白。全篇都是对话,旧体诗词,如果不加标点,如何判断哪一句是大鹏,哪一句是“雀”?不过我当然不敢深究。最后一句,原词是“请君充我枵腹”,即把“雀儿”吃掉。主席划掉了,改成大家见到的定稿。吃掉“雀儿”,挺符合对话情景,不过还是“试看天地翻覆”有气势。主席改的,还有错?何况人家是改自己的词。

这几处改动,从笔迹看,主席用的是铅笔。从笔画的行走看,早已没有了当年的龙飞凤舞,天马行空,雄视天下,指点“小小寰球”的气势。字形小,笔画横竖都不稳当了,横行不平,下垂不直,看得出运笔之手强烈抖动,把持不住。一个印象:主席已经老迈年高,多病体弱。写一把字,手也不

听指挥了。不过那个时候也只是一闪念,不敢细想。

这个时候,复刊不久的《诗刊》约我们写一篇文章学习毛主席新词的文章,赶在明年一期刊登主席新词时配合发表。我们学习哪一篇呢?商量来去,我们感到,《重上井冈山》说的是国内,《鸟儿问答》写反帝反修,说的是国际。以我们所想,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该关注国际,强力反对帝修反才是。我们甚至主观猜度,新年的元旦社论,很可能题目就叫《试看天地翻覆》。

主席这首新词学习后理解了。两个鸟儿,一个“鲲鹏展翅九万里”,一个“蓬间雀”鼠目寸光。这里一个象征“革命力量”,一个象征“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被革命吓破了胆。词中“三家条约”指美英苏三家签订的禁止核试验条约,我们认为那是核垄断。“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是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讽刺,一看就明白。最后大鹏怒斥“不须放屁”,革命要席卷,天地要反转,这都是当年习惯使用的自我膨胀式的豪言壮语。

难就难在这个不须放屁。

中国文学传统中,有“词乃艳科”之说,凡作诗填词,是件极为风雅的事情。屎尿屁一类肮脏之物,大体不入诗词。鲁迅先生就曾经说,画家可以画这个那个,总不好画鼻涕,画大便。文人墨客偶尔打油一回,不过私下逗趣,登不得大雅之堂。这回却是伟大领袖的诗词堂皇地要在国内所有大报大字登上头版,还要你写出赞颂文章,这确实有些难为人。

我们只能挖空心思找美感,或者说把反感叙述转变成美感叙述。比如说,从古至今,俗语不能入诗,主席大胆使用俗语入诗,表现了主席一空依傍超越前人的革命首创精神。比如说“不须放屁”属于痛斥,表现了主席对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切齿痛恨和鄙视。言之不足,故痛骂之。使用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民间表达方式,这又表现了革命领袖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通俗易懂,普及提高,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的文艺方向完全一致,主席身体力行等等。看来,只要不顾事实,不顾感受,道理全在人说。写作组的责任,是把一件毫无道理的事情说得有道理,还要说得理论化。

其实这时,最难交差的并不是我们。事后我们得知,歌舞团的日子,比我们难太多了。

主席发表了新词,词是要配唱的。除了移植样板戏,各地歌舞团没有什么能审查通过的作品演出。好容易有了主席诗词,唱歌跳舞的当然跃跃欲试。可是难也难在“不须放屁”。我们写文章胡搅几句大话空话还能说得过去,唱歌那是一板一眼要唱那四个字,把放屁唱成乐音,还要拖出跳跃跌宕的旋律,谁也觉得别扭,这也太难为了。不过逼到绝路上就会出聪明人,不久各地歌舞团一直到中央乐团都有颂歌献上。据我有限的感知,对付“不须放屁”,大致有以下三种方法:

第一:回避法。只唱《重上井冈山》,不唱《鸟儿问答》。既交代了歌颂主席新词的政治任务,又回避了难题。大多数基层歌舞团,都是这样做的。

第二:朗诵法。全诗都用合唱,到“不须放屁”处,音乐停止,一人站出来,类似领唱,但他不唱,一边挥臂指斥,一边高声诵读:不——须——放——屁!前三字拉长,“屁”要短促有力,喷吐而出,显示对于修正主义的无比义愤。

第三:抑扬法。这种方法要求比较高,我记得只有中央乐团用过。前两种无论如何都还在回避,没有唱出主席的词句来。小乐团可以推说自己水平低,不敢轻慢主席诗词,中央乐团当然不行。你是中国水平,你不行谁行?中央乐团只好硬着头皮知难而上。据我的记忆,中央乐团的演唱,“不须放屁”当然是正儿八经谱了曲。演唱时强调“不须”,在“不须”之后拖长尾音,旋律略为上扬,然后突降,“放屁”低唱,轻唱,短促。全国只有一家中央乐团,能够正面突破,它也必须正面突破,否则《鸟儿问答》将不能演唱。至于到后来,其他团体还有些小创造,比如混声交响“不须放屁”之后,再来女声反复几次“不须放屁—不须放屁—不须放屁”,显示鄙视蔑视,那些都是小发明了。

无论如何,这一关总算过去了。国人自己难堪了一回,那可是给足了主席的面子。

若干年以后再回想这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人们会问,毛主席一首诗词,为啥给全国人民出了难题?这问题首先在毛主席作为一个词人,其创作突破了社会认可的写作伦理。当时不要说中国,即便全世界的写作传统,也忌讳不洁之物写进作品。没有别的原因,人生之为人,对不洁之物

生理厌恶。文学作品描写此类,绝难产生美感。毛主席自己在训诫延安作家的讲话中,也曾讲过高下之分、粗细之分、文野之分。早先在欧洲,教堂禁止放屁。《犹太法典》禁止犹太人在拉屎或者放屁时将屁股对着圣都耶路撒冷方向。“如果某人在读完念功或祷告词之前忍不住要放屁的话,那他最好忽略悼念功或祷告时间的限制,而不要带着不洁之身继续祷告。”在社交场合放屁,是非常尴尬的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法兰西是一个特好娱乐的民族。一百多年以前,巴黎曾经有过职业放屁人的娱乐表演,他们能够自控肛门,用放屁模拟各种音调。即便如此,一场世界大战之后,玩屁的把戏立刻销声匿迹,因为在严重的战争创伤面前,放屁再无滑稽可笑可言。欧洲有说不尽的放屁笑话,然而在多数屁笑话里,放屁人都是尴尬可笑的角色。这些都说明,略为讲究举止文明,放屁之类脏话当然不好请上大雅之堂。

中外作家中也有写过放屁拉屎之类“题材”的,不过那些,或者打油,聊博一笑。或者自己私密写作,或者游戏制作,并不曾想到拿出来展示。近年公开的吴宓日记中,有好事的读者就发现了这位名教授的若干首歌咏骡马排粪的诗作。比如:

已过长衢土辙安,流汗身热胃肠干。
渐转玉液成浓块,更炼金丹作巨丸。
节节竹环蛇出洞,高高金座珠满盘。
频看尾举连排泄,妙龄食量可惊叹。

稍微接触过牲口的人都知道,这里写的是骡马拉粪。够形象也够恶心也够可笑。不过人家写在他的日记里,本来也没有打算拿去发表,兴会一时呈才使气,如之奈何?

毛主席的诗词不同。两首新词发表在各大报头版,那是当时分量最重的新闻,套用“文革”中常用的话,那是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总方针。对于主席诗词,当然只能做正面阐释。那时的所有报刊,所有舆论工具,也都只能这样解读,否则有违圣意。

或许,毛主席只不过和读者开了个玩笑?这可是个搅乱江山的玩笑。在“文革”的政治高压下,全国人民噤若寒蝉,专制使人民变成集体痴呆,沉默寡言满脸死相是最安全的表情。即便传个笑话,也还是板起面孔保险。笑已经成为一种

特权,在全国各大报刊开玩笑,那是最大的特权。估计当年,也只有他一人能够这么开玩笑说笑话。他爆了粗口,可没有人敢说这是粗俗,是使性子骂街,只能正面理解。

今天我们的许多一把手,胡乱发一通言,要求下属深刻领会,学出花样,学出创意,也常见。追溯当年,乃祖之风,山高水长。

不禁想起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屁颂》。说是阎王一不留神放了个屁,有秀才小鬼连忙即兴创作一首《屁颂》呈上,赞曰:

高耸金臀,宏宣宝气。依稀乎丝竹之音,仿佛乎兰麝之味。臣值下风,不胜馨香之至。

我们写作组的文章,当年没有迎合了圣听。1976年的元旦社论谈的恰是《重上井冈山》,题目叫《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不过并不影响我们“学习毛主席另一首诗词”的文章发表。回头看,我们不过也是献上一份小小的《屁颂》罢了。

(责任编辑 萧 徐)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稿一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 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政编码: 100045

本刊电话: 010-68534879

传 真: 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

启 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过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 崔秀岭 手机: 13611159388

电话(传真) 010-60342528

汇款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

鸿顺园 528 信箱

收款人: 崔秀岭 邮编: 102488

“替天行道论”：权力正义性的护身符

● 张绪山

帝王“承天道”与圣人“谋天道”

在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对权力正义性的论证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孔子揭示其中的奥妙:“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所以,无论何人,一旦控制权力,就必定要为其行为“正名”,使之“名正言顺”——“名正言顺”意味着正义性。两千余年间,每一个政权不管通过何种手段得来,其执权柄者无不为其权力来源的“名正言顺”而煞费苦心。

对于原始的初民而言,最可敬畏的事物无疑是笼括万物、变化难御的“天”。在先民的心理观念中,“天”最终演变为一个至上的存在,“天道”也随之变成了一个终极的文化概念,成为万物合理性的基础,所谓“法象莫大乎天地”。董仲舒称:“圣人法天而立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道”观念延伸到政治领域,“承天道”便成了权力正义与合理性的根本前提,于是,无论何人,只要能做到“承天道”或“替天行道”,就做到了“名正言顺”,具备了掌握政权的合理性,其拥有的武力被称为“正义之师”,对人动武被称作“恭行天罚”。

然而,这“承天道”与“替天行道”的本领并非人人都有,而是帝王与圣人的特权。

帝王被认为直接与“天”和“天道”相接,这种观念由先验性的逻辑建立起来。历史学家司马光说:“王者受天命,临四海,上承天之序,下正人之统。”建立在先验论基础上的“天”与“天命”成了君王合法存在的依据。

除了先验的逻辑论证,帝王与“天”、“天道”的联系还由许多神秘中介建立起来,并由许多奇异现象加以表现。随着“龙”这个图腾崇拜物的盛行,“龙”成为帝王与“天道”之间的中介,龙与帝

王之间的各种关系成为帝王和帝王政权神圣性不可或缺的环节。在汉高祖刘邦的传说中,刘邦的“龙子”身份是以牺牲其母的贞操,以其母与龙发生关系,让其父戴绿帽子为代价换来的。东汉光武帝刘秀有“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王”的受命之符。北齐高欢卧睡时,被人附会为“见赤蛇蟠床上”。唐太宗被人赞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洪秀全言志诗:“风雪鼓舞三千浪,易像飞龙定在天”,表明自己是“真龙天子”,是可以改天换地看今朝的人物。

圣人之徒的使命是“参天地之化育”。《礼运》:“圣人参于天地,并与鬼神以致政也”。孔子颇自负地称:“文王既歿,文不在兹乎”。孟子更是自认天赋使命于己,以伊尹的口气称言:“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又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儒家圣人这种“替天行道”“舍我其谁”的自信为后代儒士所继承。

儒家之“道”分为“天道”与“人道”,所谓“天道远,人道迩”,但在本质上,“天道”与“人道”是一致的,在儒家看来,孜孜于人道,也就是在追寻“天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谋道”成为儒士坚持不懈的传统。“谋道而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任重而道远”几乎演变为儒士的使命,用张载的话,即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孔子自称:“天生德于予”;后世的儒士则声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换言之,上天赋予了圣人“谋道”的资格和本领。这在一些所谓近代人思想里仍然如此。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圣人,既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

在“承天道”与“谋天道”使命意识之下,帝王和圣人之徒就有了“替天行道”的资格。

帝王“替天临民”与圣人“替”众生“谋道”

以超验的方式论证出来的帝王“承天道”理论,在现代人的思维看来,是极为粗糙不堪且滑稽可笑的,但在前近代社会中却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在“奉天承运”、“承天道”而替天君临兆民的前提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成了帝王享有的“天经地义”的神圣权力;而在这种神圣权力的覆盖下,任何有悖于皇帝意志的人和物,都是可以任意摧毁的。

不过,“天道”观念虽确立了帝王权力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但其正义性与合理性仍然要体现在对社会的治理上。作为客观存在的“天”,不能自动说明将“天命”赋予何人,更不会主动向人们说明或展示掌权者所获得的权力的正义性与合理性。论证君权的“合天道”,乃是儒家圣人之徒的任务。

儒家的人生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政治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儒家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帝王的统治,一是民众对统治的接受。具体言之,作为统治者,其权力既要有合法性和正义性,又不能过分压迫民众;作为被统治者,既要接受被统治的秩序,又不能犯上作乱,所谓“君君、臣臣”的尊卑秩序是儒家的基本方案。

在儒家那里,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是“天道”,“天道”的中心点是君权的尊隆。这在儒、道、法各家的学说中可谓异曲同工。我们从儒家、道家和法家鼻祖那里看到的都是命运攸关的御民术。老子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民。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孔子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法家的管仲说:“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鲁迅曾对孔子为鼻祖的儒家政治伦理有过评价:“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为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样的评价也适合于

道家和法家。

不过,儒家毕竟明白,虽然他们维护帝王权力的神圣性,但并非所有君权都是仁慈的“有道明君”,昏君、暴君不期而至的情况屡见不鲜。儒家在“天人合一”的观念中,找到了劝勉皇权顾及民众利益的路子,即“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使民众意志成为衡量权力合法性和正义性的尺度。于是,“承天道”与“替天行道”就转化成“为民所系”:体察民心、顺应民意、体贴民情,成为权力正义的符号,而其用意乃在劝勉甚至警告帝王集团不要对民众过分苛刻、严酷。

儒士团体虽然希望借助“道”的力量约束君主,使其权力不可恶性膨胀,然而他们面临的最大的难题是,前近代社会没有一种力量约束君权对“天道”的背离。君王一旦成为“无道”的暴君,则意味着他们为“帝王师”所做努力的失败。对于这种局面,儒家是不可能有任何有效措施的,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有独善其身而已。于是只能抱着“从道不从君”的原则而聊以自慰。这一原则在儒士同君权的长期冲突中,演变成为最基本的信仰。明儒吕坤说:“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下不得以势相夺。即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这里所谓“理”也就是儒家坚守的“道”,他声称儒家坚守的“道理”不能被作为“帝王之权”的“势”所屈服,其思想与先前的“从道不从君”是一以贯之的。

然而,“道”的信仰毕竟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它无法保障儒家生活的物质需要,也不能保障其生命的安全。在掌握强大武力的君权的威慑和实际物质利益的诱惑下,儒家圣人之徒为帝王政权所屈服乃是常态,“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乃是在帝王权力下讨生活的儒士无可奈何的选择,也是盛行两千余年而不衰的传统,即使在近代中国也大行其道。如哲学家冯友兰在抗战期间大讲“应帝王”,向蒋介石献媚;哲学家贺麟为蒋介石提倡的‘力行哲学’帮腔喝彩;史学家顾颉刚于1944年参与向蒋介石“献九鼎”,郭沫若为了逢迎伟大领袖的“太阳王”欲望,竟然不顾历史传统

中对“天之二日”的忌讳，臆造出两个“太阳”，都是此去不远、众人皆知的显例。虽然清季以来，非君非圣者大有人在，如王夫之明言“天下非一姓之私也”，君权“可禅、可继、可革”。黄宗羲称“天下为主，君为客”，等等，但这些思想为国民所普遍接受颇为不易，即使在今日也非同寻常。十数年前，批评国家级的领导人通常会被视为“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是要加以惩罚的一桩大罪，其思维定式仍是权力神圣观。这在完成权力“去魅化”的现代民主制度中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帝王集团“替天行道论”的本质

马克思在评论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时说过大意如下的话：资产阶级对封建专制王权发起革命，不仅仅代表自己的利益，也代表手工业者和农民等劳动阶级的利益，因为受到封建专制王权所压迫的不仅有资产阶级，也有劳动人民，因此，资产阶级对王权的革命也符合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但当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就转化为所有其他阶级的对立面，道理很简单，它取代王权成为所有其他阶级的压迫者。

同样，农民出身的起义领袖在发动对帝王暴政的反抗、夺取政权之前，是代表所有受暴政压迫者的实际利益的。然而，一旦他的集团夺取政权，其特殊利益就确定无疑地形成了，因为他在控制政权后，实际上已经转变为与其他阶级区别开来的特殊利益集团，这种特殊利益与权力如影相随，是绝不可能为最初的理想所打消的。其中的原因是，当他宣布自己“奉天承运”、“替天临民”，管理天下黎民百姓，并充分、全面地代表他们

的根本利益时，实际上已经掌握了处分天下黎民创造物、乃至其生命的权力。

国家权力这种公共权威被物化为一个政治上和道德上的神奇人物以及他的集团，并被宣布由这个神奇人物和他的集团代替芸芸众生的意志行使权力时，整体概念（如“人民”、“群众”之类）掩盖下的单个民众的个体意志已经被剥夺了，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虽然在名义上享有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其实对国家政治已经没有任何干预力量。此后不可避免的局面是，以“替天行道”相标榜的权力集团堂而皇之地扩大自己的特权，原来被奉为“天”的芸芸众生的权利则被压缩到最小的空间；整个社会只有特殊权力集团日益扩张的自由，普通民众的自由则被剥夺。

这种状况在近代以前是确定不移的事实，即使在民主观念已成为潮流的近代，也没有多大改变。1932年3月28日，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曾对“国难会议”代表放言：“国难会议是政府召集的，我们是主人，诸位是客人。诸位如果不满意政府的办法，去革命好了！我们流血革命，打出来的政权，岂能随便说开放就开放！”这位早年为反清志士、后为民国要人（当时还不是汉奸）的话很直白，反映的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思维定式：权力落到我们手里，就意味着“天命在我”，一切由我说了算，你要证明“天命”在你身



孔子被誉为圣人，在他的家乡曲阜到处都能见到与他有关的遗迹 徐庆全摄

上,就以“革命”的方式来证明!在这里,人们看到的是“打江山、坐江山”的逻辑:“打江山”就是“坐江山”的法理依据,无需考虑现实权力是否符合正义原则,是否是在正义的原则下运行;此外,人们看到的是,所谓“承天命”、“替天行道”大旗背后显露出来的赤裸裸的“暴力决定一切”的思维。这一场面让后人明白一个道理:虽然不能说孙中山当初立下“天下为公”的宗旨是虚伪的,也不能说国民党领导革命之初就有图谋集团之私的念头,但历史的逻辑无情地展示给人们的,是这个曾经不遗余力“为民请命”的集团,一旦掌握了政权,就形成这个集团的特殊利益;在集团利益面前,原来它代表所有被压迫阶层民众利益的客观环境即不复存在。它原来的“替天行道”、“为民请命”理想不管当初多么纯洁和真诚,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其对立面。历史的逻辑就是如此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汪精卫的“宣言”还蕴含着另一层深意:近代以前皇权制度下的一家一姓之“神圣性”,在“承天命”的幌子下,转变成为一个集团的“神圣性”;由于这种“神圣性”,人们是不能对这个集团进行批评的,任何对这个集团的“神圣性”的冒犯,都被视为“反动”。正是这种集团“神圣性”才使任何“反党”言论成为一桩十恶不赦的大罪,可以施以最严厉的惩罚,其道理正如“欺君罔上”被视为“欺天”而必须加以惩罚一样。

传统“替天行道论”的本相

人世间有一类事是可做而不可说的,如男女床第之事,人人之为之,但不可堂而皇之地高谈阔论,否则有失风范;一类事是可以说而不可做的,如国骂人人说过,但只是泄愤而已,如果真如所骂的那样做起来,对方非杀你不可。

不惟如此,有些真相也是不可揭破的。鲁迅于1925年作过一篇题为《立论》的妙文,说过一件事: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非常高兴。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想讨点祝福的吉利话。一个客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于是得到一番感谢。另一个客人说:“这孩子有官相,将来要做官的。”于是得到几句恭维。另一个喜欢将真话的客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于是得

到一顿痛打。说真话的结果就是如此。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民本思想”。如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曾存在的思想,也许是对的,但如果认为这是中国政治传统的具体实践,则是全然没有历史感的糊涂念头。类似的实例: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经久不息的“清官思想”,但若由此认为中国传统政治一向清官云集、政治清明,无异于痴人说梦话。盖儒士之舍力倡导者,必为社会实践所极为缺乏者也。《诗经》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辗转反侧。”辗转反侧、难以成寐的原因是“求之不得”;同理,儒士们死乞白赖地呼吁皇权集团要重视民意,其实正说明民意在皇权政治伦理中的微不足道。因为现实中无法得到,所以儒士们才耿耿于怀,反复追索,梦寐以求。

2009年,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回答记者时下意识地冒出一句问话:“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政论家们对逯军的这句话口诛笔伐,以连篇累牍的文字试图证明其中存在严重错误,可谓正气凛然,不过,在我们小老百姓看来,这位不大不小的官员的问话实乃肺腑之言,一句大大的老实话,因为它符合历史的逻辑,其情形亦如1932年汪精卫——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对“国难会议”代表们发出的底气十足的“宣言”。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 徐庆全)

公 告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启 事

2009年精装合订本 100元,简装 95元
2009年简装合订本(上、下册)105元

免费挂号邮寄,汇款地址见本刊目录页

我所知道的“桃园经验”

● 肖 风 口述

杜丽荣 张军锋 采访整理

问：您概要谈谈“四清”运动的历史背景。

答：“四清”的历史背景可以说有三条。

第一，为了实践“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教育刚从小农传统生活中解放出来的人民、特别是农民和农村干部，始终是党和毛泽东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上世纪60年代初期，几乎年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人民公社时期采用的“四清”办法进行整风整社，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供了一个具体形式，也为开展大规模“四清”作了准备。

第二，为了实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理论。在“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困难的形势下，出现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等问题。“黑暗风”就是说困难怎么大；“单干风”就是类似“十项小自由”；“翻案风”就是反对右倾，对这“三风”，毛泽东认为都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之所以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除了领导责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基层干部中的严重问题，以及社会上地富反坏右分子极力复辟资本主义、篡夺领导权。因此，必须开展阶级斗争，解决干部作风问题，打击地富反坏右的猖狂进攻。

第三，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这个问题怎么提出来的呢？就是前苏联的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引起东欧很不稳定，赫鲁晓夫还批评我们的“三面红旗”，促使毛泽东引起警觉，加重了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提出了“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1960年9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就强调既反对修正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不久，就发动了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四清”运动。总之，搞“四清”一是教育农民，二是抓阶级斗争，三是反修防修。

问：“小四清”和“大四清”有什么不同？

答：你说的“小四清”、“大四清”，是指“四清”的内容了，“四清”的主要内容，在运动中有发展变化。在我们省最早是定县（现定州）县委书记带着工作组去搞整风整社试点中，也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根据社员要求，对干部的账目不清、铺张浪费、多吃多占、贪污私分集体财务的问题，采取了清工、清账、清财、清物的做法。这时的“四清”只清经济，叫“小四清”。“四清”运动后期到1965年，提出了搞“大四清”，就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由“小四清”到“大四清”，它的主要内容和变化，是根据中央的三个文件来的，《十条决定》，是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后来有《十条规定》，是彭真起草、具体执行“决定”的，《二十三条》是毛主席主持制定的，提出的“大四清”，是全面的革命了。归纳起来“四清”就是整风整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阶级斗争、反修防修，重新教育人、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以及“大兵团”作战等等。为了便于理解，不妨用个通俗的词来说明：“四清”是重新教育人、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一个“抓手”。

问：您在“四清”运动中担任河北省委抚宁工作队的队长，请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下乡前的准备，工作队初到抚宁农村的情况，工作队有多少人，是集中一个村，还是分散到很多村，当地干部群众对工作组是什么态度，配合你们的工作吗？

答：“四清”是先搞试点。我们工作队叫做“省地县抚宁工作队”，就是省里、唐山地委、抚宁县这三级工作队，有229个人，省直机关有百余人，地区去了将近一百人，还有县里一些干部，《中国青年报》有十几个人，王光美参加了我们工作队。工作队由省委书记林铁挂帅，县委书记强化和我

担任队长。抚宁县当时属唐山地区管辖,离北戴河很近,也便于开展工作。

工作队的任务是搞芦王庄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试点。这之前,我已经带队在这个社搞了蒲兰大队,取得了一个大队“四清”的经验,这次搞是为了取得一个公社“四清”的经验。

工作队最重要的准备工作是在秦皇岛集训,学习中央的《十条决定》和蒲兰大队“四清”的经验。为了方便,我们住在宾馆里面先学习,住地离抚宁很近。这个公社有14个大队,因为已经搞了蒲兰大队,我们工作队就分为13个工作组,分派到全社除蒲兰之外的13个大队。王光美去的是桃园大队,在桃园工作组。

我们进村前,县区社党委已经给队干部、社员打了招呼,大家知道工作队是为了帮助解决干部经济不清的事,“四清”会按政策办事。社员表示欢迎,队干部看起来还沉得住气。

问:当时王光美为什么要到抚宁去参加“四清”工作,她以什么身份到桃园去的?她与工作队配合吗?

答:根据我掌握的情况看,王光美到河北抚宁参加“四清”运动,是这么几个因素促成的:第一,为了就近再学习再锻炼。王光美参加过民主革命时期的土改,这个“四清”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了,她也想参加学习和锻炼,何况抚宁县离北京很近,非常方便,这个意思是她告诉我的;第二,为了刘少奇获取运动一线信息增添一条渠道。“四清”运动的信息,王光美一参加就算多了一条渠道。实践证明是这样的,这是我观察的。第三,有示范作用。这条我倒没听她讲,中央文件规定,领导干部蹲点、机关干部要参加“四清”运动,它是这次“四清”运动的一大特点。王光美从北京来,中央机关的干部参加蹲点,有示范作用。

至于王光美的身份,她要是以刘少奇夫人的名义出现,就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了。为了工作方便,王光美化名董朴,以公安厅秘书的身份,在桃园工作组担任副组长。她工作起来和我们配合得很好,你比方说在工作组大家商量事情啊,分配了什么事情她也很服从分配的。她有建议就及时提出,我们有什么问题,比方说理论问题、政策问题,属于认识方面的问题吧,有时候请她代为征求刘少奇的指示,她也及时把少奇对桃园“四清”

的意见转告队长,在工作中和我们配合得很好。

问:“桃园经验”是怎么总结出来的?

答:桃园经验是这样,我们试点结束以后,大概是1964年的7月吧,刘少奇要南下视察工作,王光美随行。他们先到天津(当时天津是河北省会),再到山东,然后南下。到天津以后,省里正开三级干部会,省委提议让王光美给大家讲讲桃园“四清”的经验,她是怎么做的,大家很感兴趣。她讲了一天多。中央通报的“桃园经验”是根据讲话录音整理出来的,她的讲话原来有8万余字,整出来的材料是4万余字……

问:当时您亲自参与整理的?

答:不叫整理,就是从录音带上记录下来,我看了一遍,顺了一遍,大体上删了两三万字,送到中央以后,中央的高手又删了两三万字。

问:桃园经验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主要内容有五个方面:第一,是扎根串联,组织阶级队伍;第二,是干部“洗澡”,进行“四清”;第三,是对敌斗争,政治“四清”;第四,组织建设,选举支委、队长;第五,是生产建设。大概是这五个部分。

问:您今天如何看待桃园经验和“四清”运动?

答:这个问题很大,就我的理解谈点看法吧。整个“四清”是保护了桃园经验,保护了芦王庄公社,现在这个问题也好讲了。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四清”运动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它指出:“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历史决议》为我们研究包括芦王庄公社(含桃园大队)在内的“四清”运动,指明了方向,是我们评价“四清”的指针。

要具体说呢,对“四清”有四点值得肯定:第一,它对改善干部作风、密切干群关系有促进作

用。基层干部中一些人犯有大大小小的错误,其中有的还比较严重,经过“洗澡”,解决了“四不清”问题,放下了包袱,干部可以轻装前进了,群众对“四清”是满意的。像芦龙王庄公社有62%的干部犯有贪污盗窃错误,款额达75000块钱,每户平均36块,贪污粮食11万斤,一户平均54斤,按说这个数目在当时也不算小,“四清”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干群关系就好一些。第二,推动改善了社队经营管理。第三,推动了生产建设。像桃园大队新建了一个抽水站,打了两眼机井,拉了高压线,挖了渠,平整了土地,栽了树。这个冬春的基本建设比往年搞得多些。第四,打击了犯罪活动,刹住了歪风邪气,维护了社会秩序。

要讲问题,首先,就是把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看得太严重了,不论大小问题都看成是阶级斗争,对有些干部的问题缺乏具体分析,使有些人受到不应有的处理。第二,就是搞了重新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把土改和合作化时期实行的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的路线,简单地运用于三大改造完成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了,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那么中农和富裕中农,人民还能不能富啊?穷了才是依靠力量,富了就成了革命对象了,所以不利于调动全体农民的积极性,这显然是“左”的错误。第三,就是“四清”中的一些重要的政策问题不明确或者是不正确的。我是搞政策研究的,所以对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你比如说“反修防修”,但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明确、正确的界说,滥用的错误后果,当时严重,今天仍可见;还有什么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什么样的走资派够什么条件?到哪一级,这都不清楚;还有对“清政治”这个政治性极强的政策问题,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内容、对象;什么是漏划地富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如何划定新富农,如何划定阶级成分的时间标准,新划的地富分子要不要没收其浮财?芦王庄就没收了,我当时对这个事情很有点疑惑,如此等等,像这样含混不清、胡批乱斗的问题不少,在这方面是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是三个方面的错误。上面说的都是属于包括芦王庄(含桃园大队)在内的“四清”运动“左”的错误。今天来看,这些错误已经变成我们前进的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有了这种教训,就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了,这有好处。这是讲的

是整个“四清”。

说到芦王庄“四清”、桃园经验,我想还应该把自己也摆进去。因为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四清”工作队长,后来又做了省委“四清”办公室主任,还是长期做政策研究工作的,在“四清”活动中,犯了比较严重的“左”的错误,我是很积极地去执行的,这当中最严重、最深刻、最痛切,也是最宝贵的教训,就是不懂得我们所处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当时脑子里就是有几个现成的概念、框框,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最新成果,找到、开拓、扩展、深化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是改革开放的正面经验和“四清”加上“文革”的反面教训两相对照,帮助我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真理性精髓的领悟与把握。所以,现在我可以跟你这样说,改革开放的正面经验,“四清”的反面教训,在我身上是一直起作用的,推动我在学习。

曾经碰到有些人问我,是不是每过几年搞一次“四清”,就可以解决干部作风问题,像现在贪污好厉害呀,这不搞“四清”行吗?他的意思是不搞“四清”不行,非搞运动才行。我说呢,有了改革开放的正面经验,有了“四清”的教训,这样对照之下,有三条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答案是:第一,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发展和完善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法治制度;第三,发展和完善干部教育制度和监督机制。把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坚持做下去,假以时日,是一定能解决问题的,干部作风一定会一年比一年好,这是我的深切体会。

(肖风,离休前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时任河北省委驻抚宁县“四清”工作队队长。本文是根据2009年8月电视采访录音整理而成。

杜丽荣,中共河北省党史研究室副编审
张军锋,河北电视台纪录片编导,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 萧 徐)

“翠明庄黑会”始末

● 于 敏

1966年6月22日,天空响起炸雷一般的吼声,声讨“翠明庄黑会的反党大合唱”。乐队总指挥自然是电影界领导人夏衍、陈荒煤辈,男高音则是上海的瞿白音。他高唱的是《创新独白》。此文颇有特色,是有感于电影的公式化概念化而发,用杂文的笔调阐发“唯陈言之务去”的要言妙道。文章刊于《电影艺术》1962年第四期。哀此文之不逢时,一出笼就遭到上海市长柯庆施的无情批判。“陈言”就是指党的文艺方针,就是反党,罪无可逭。

1964年初夏,我到北京就医,走访老友袁文殊,时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漫谈中讲到《创新独白》,说朋友们劝瞿白音写一篇自我批判的文章。白音不肯。我想这正是白音的骨梗性格。这时正是文化部“假整风”期间,是“十年动乱”的前奏。文艺界都各找出一祖师爷。电影界有夏衍,文学界有周扬,戏剧界有田汉等。这与本文无关,不赘。

为说明“黑会”的始末,必须回溯到1962年。是年2月10日,我在长驻地鞍山接到通知,要我火速到中国影协报到。干什么?没说。我乐得进京,一可会晤老友,二可看些影片,三可跑跑书店。北京春寒料峭,冷气袭人。见到电影家协会书记袁文殊,才知是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0周年,要请几个摇笔杆的写文章。斯时上海的柯灵和瞿白音已经到了,都住在翠明庄。同时,文化部管电影的副部长夏衍和陈荒煤也要在此处开会,研究当前电影体制问题。

嘿,翠明庄,好迷人的名字。可不能顾名思义。它既无翠绿如盖的树林,也没有明丽宽敞的房间。原来是沿用旧名,其实是中央组织部的一处招待所。地在东华门附近,两层楼房前面是一条狭窄的马路。车流很多,整天轰轰然不断,使人不得安宁。这一点必须说明,否则住华屋,甘肥

饫,写“黑文”,岂不要罪加一等。

夏衍和荒煤主持的体制座谈会开了四次,谈电影管理体制。参加座谈的,除夏和陈,还有袁文殊、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陈播、影协负责人之一的黄钢、电影史学家程季华等。笔杆子柯、瞿,我也列席了。所谓黑会,即指此言。会上袁文殊曾说:“参加会的只于敏一个是布衣。”毫无官衔而参加如此高层的会议,幸乎不幸?

溯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上下大反右倾。连“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都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1962年初的广州话剧会议上,周总理和陈毅元帅讲话,为全国知识分子摘去资产阶级的帽子,归入人民一边。全国文化人无不欢欣鼓舞,说是沐浴了春风。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出气之说,即所谓“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翠明庄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3月中旬,这样的会开了四次。空气和缓,畅所欲言,也没有人出什么气。会上议论的问题大致有四:一是关于电影的管理体制。三大制片厂,长春厂、北京厂、上海厂,是否仍下放省和市,抑或收归文化部直辖。二是关于如何提高影片的艺术水平,力求符合观众的需要。文化部是否直接抓一批创作干部。下放的人员是否收回一部分,用轮训的形式培养人才。三是批评创作的条条框框,艺术教条主义。题材方面应当开源,从“五四”以来的社会生活都可以写。四是为了解决剧本荒的问题,特别强调编剧队伍的扩大和培养。

会上大家畅所欲言,没有人定调子,发指示,做结论。共产党会多,我历年参加过不少。像这样自由、平等、舒畅、和谐的会则不多。一定要找一顶帽子给它戴上,我看自由主义比较合适。我这布衣虽有发言权而未使用,因为管理体制一套我一窍不通。我参加“黑会”,自然成了“黑人”,所幸没有什么辫子可抓。这样一次会,自今视之,思想

太不解放,改革的步子也如小脚女人。本来是正常的事,戴上黑眼镜一照自然是黑的了。夏、陈二人都是掌权的副部长,说他们“黑线”夺权,岂不是自己夺自己的权吗?常识以下的事,竟掀起滔天大浪,思之可怕也可羞。

我到京是为了写纪念文章的。除了上述四次正式的会,还有几次笔杆子的碰头。2月19日,大家到军委文化部,听传达总理和陈毅元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春风春雨,滋润心田,鼓舞干劲,但是怎样写纪念文章,还是心中没底。2月26日,荒煤讲了他的初步设想,也只是一些浮泛的意念(这里插一句,笔杆子们当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只有荒煤、文殊、于敏、黄钢,其他人都不曾在延安)。大家约定3月5日分别写出供讨论的提纲。我认为与其写应景的纪念文字,不如写与电影实践有关的学术性论文更为有益。柯、瞿二公也有同样的想法,可谓不谋而合。

那个春天过得身心都分外舒畅。每天都观摩一两部影片。苏、美、法、德、意的许多名片都看了,受益匪浅。正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但是笔杆子颇蒙优待。每天饭桌上都有荤有素,有时还到四川饭店打牙祭。每天傍晚,都在东华门外的御河边散步,在随意交谈中,柯灵说他想从典型问题上立论,至于从哪一侧面入手,则沉吟未定。白音则拟谈创新,也还说不具体。我呢?想探讨一下电影、电影文学、文学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尚在胚胎,不能成形。此后数日,分别筹思,准备提纲,以供讨论。我闷头想了几天,一面翻书,渐渐有了些眉目。

瞿白音的提纲最早交出,在小会上讨论,时在3月16日。由于问题平列,未突出重点,受到一番“轰炸”。轰炸者,接近于否定也。柯灵则一直未写出提纲。3月28日,小会讨论我的提纲。为了

将论点讲清楚,我写了一万多字。题目是《本末》,副题是《文学的共同性和电影文学的特殊性》。大家对论文的整体是肯定的,只讲了些枝节性的意见。对《本末》二字,有人以为不好理解。

谈完提纲以后,我说:“文章里有七根钉子,请大家考虑,要不要拔去。这七句话是:

1、要有勇气承认自己是无知的(这是借用巴甫洛夫的话)。

2、古往今来,有没有一个作家是靠别人耳提面命的?没有。

3、有人太热衷于为创作开药方了(此句未写入文章)。

4、我们对于生活的本源性常常估计不足,以为有了主题就可以大做文章。

5、作品里的人物是具有独立性格的人……常常想到这一点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6、给人物加理想,把他们升格或‘拔高’,让他们说理想、说思想,把装腔作势当做崇高,可笑的行为只能引到荒谬的结果。

7、艺术表现既然是有个性的,其本性就是排斥一般化的,排斥外力干扰的,排斥越俎代庖的。”

我为什么说是钉子?这七句话显然是针对束



1941年夏衍与友人于香港浅水湾合影。左起:陈歌辛、瞿白音、夏衍、丁聪、何香凝、洪道、廖梦醒、欧阳予倩。

缚我们手脚的教条和违反创作规律的做法而发。为什么特别提出来要大家考虑?可见虽然有总理和元帅的讲话,我还是心有余悸的。算我有先见之明。在那疯狂的年代,在长影全厂的揭批大会上,有人大叫:“于敏向党打了七根钉子!”七句话果然成了七条又黑又粗的辫子,被人一大把狠狠地揪住了。讲“无知”就是暗示党无知。讲不要别人耳提面命,不要外力干扰,不要别人越俎代庖,就是取消党的领导。讲人物是有独立性格的人,就是否定人的阶级性。讲以为有了主题就可大做文章,就是不要主题,和党唱反调。这样一一上纲,我可不就是一个十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权威,周扬熏下的黑干将吗?可悲可叹可恨的是我当时必须这样上纲上线,否则就是一个死不悔改的分子。我无可逃脱,正是把大盆黑水兜头浇在自己身上,才得到“解放”的。讲这些我毫无怨尤,因为扭曲的时代扭曲了万千的人,不独我一人以为然。

讨论《本末》提纲时,大家都说钉子不拔,都是针对艺术教条和艺术领导的官僚风、独断风而发的。此文于1962年4月底完稿,是4万多字的长文。《电影艺术》编辑部的同仁看了,说好,很有文采。黄钢甚至说:“国内讲电影蒙太奇的算你一家。”函送荒煤审阅,回信说:“好,满意。”文章于《电影艺术》5月号刊出。瞿白音的《创新独白》是回上海写成的,发稿较晚,所以,同期刊物排在《本末》之后。

两篇文章在上海得到不同的反应。为《独白》喝彩的不少。听说还开了几次座谈会。《本末》则相对的受到冷遇。听说有人不同意电影特性为“末”。这显然是望文生义,可能由于没有通读全文。

瞿白音的《关于电影创作问题的创新独白》刊于同期《电影艺术》。文章颇有特色,是用杂文的笔调发议论,“唯陈言之务去”(韩愈语)是其核心的论点。又用清朝诗人叶燮的话为之注解:“凡事之踵事增华,以渐而进,以至于极。故人之智慧心思,在古人始用之,又渐出之,而未穷尽者,则后人精求之而益用之,出之。乾坤一日不息,则人之智慧心思必无穷与尽之曰。”作者感慨很深地着力抨击流行于当年的公式化概念化,力求顾及问题的不同侧面,避免片面性。自今视之,颇有脆

着造反的意味。就是这么一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力求照应问题的不同侧面,触及时弊,行文活泼的学术性论文,竟然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而今我重读《独白》,发现此文不但没有违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是以《讲话》的基本原则为指归,阐述了艺术创作的重要方面。且看:“去参加一个纪念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座谈……座谈会开得很热烈,大家谈了许多体会。20年来,我们在毛泽东文艺方向的永不熄灭的指路明灯引导下前进,我们要为无可争辩的伟大成就高兴,但同时也有点羞愧。我们不是曾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磷磷的鬼火似的绿色幽光引诱过,有如陷入泥塘,有的踩到过小石子踉跄了一阵,也有的一时看不到这盏明灯而停步不前……会后,一直想着‘新从何来’的问题。”

读到这里,我不禁为白音大呼冤枉!

前面说过,“独白”是以“唯陈言之务去”为其基本观点。所谓陈言,用现代的语言讲,就是艺术教条,或艺术形而上学。具体言之,即“主题之神”、“结构之神”、“冲突之神”。作品必有思想内涵,必有整体和段落,必有波浪起伏。如果成为刻板公式,必然成为艺术创作的桎梏。“陈言之可厌,首先在于它不能反映千姿百态的生活风貌,丧失生活真实感。形象和表现方法之所以要多样;首先在于生活的丰富多样。陆机所说‘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驱除这些束缚我们的过多的框框和顾虑,活泼创作思想的根本方法,还在于‘博观’——观察生活和开阔艺术眼界。‘识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刘勰的话是对批评家说的,但对创作家又何尝不是如此。”

文章刊出前,曾由夏衍审阅,为之作了若干词句的修改,也就是磨平了当时觉得不妥的字句。跪着陈词,这番苦心也未能起到任何作用。

1962年2月,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刊出声讨《创新独白》的鸿文,作者为丁学雷。伟大祖国的天空上响起这位雷公的炸雷,断言翠明庄的黑会不是独白而是大合唱。文章没有点我的名,我不免心存侥幸,但是在劫难逃,我这条老鱼也被一网打住了。不过与白音比较,我幸福多了。与其他种种“罪行”一起,经过多次黑水

插 队 读 书 记

● 张 刃

我们 1969 届初中毕业生，实际只接受过 6 年的小学正规教育，插队时许多同学还不满 18 岁，实在算不得“知识青年”。渴望读书，是我们当中许多人的追求，即使在穷乡僻壤，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也没有放弃。

(一)

我下乡时带了两个一般大的箱子，一个是凭“插队供应证明”到商场花了 24 元买的配给的杂木箱子，装衣物被褥；另一个是家里的老牛皮箱，装的都是书。除了马恩列斯选集、鲁迅文集和那时人人必备的“毛选”、“文革”资料汇编，大多数是“禁书”或“准禁书”，例如《中国通史》(范文澜)、《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何干之)、《中国革命史》(胡华)、联共党史、《大众哲学》(艾思奇)、上个世纪 50 年代出版的一套“干部必读”(包括苏联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及中国古典、现代小说、唐诗宋词和少量外国文学名著等等，满满一箱子，足有二三百斤重。

我之所以带了那么多书，一是读书习惯使然，舍不得丢下，二是知道自己没上过几天学，需要“补充”，三是觉得自己这辈子回不城市了，索

性都带走。况且，“文革”时父亲的藏书几乎被扫荡殆尽，那些书大部分是我自己千方百计淘来的，很珍惜。

插队之初，我还自以为曾经读过不少书，有点“根底”，能够处理一些问题。但很快，现实生活就教育了我，使我明白了自己的无知。

现实生活首先就要与人打交道，插队后，同学之间更是朝夕相处，无可回避。大家分别有不同的家庭背景，但绝大部分都在“文革”中被触及(“根红苗正”的大多留城了)，只是程度不同。当插队成为我们共同的宿命时，家庭的因素和影响就显现出来了。且不说家庭教养、经济条件，仅生活态度就很不相同。有的人确实认真劳动，希望有朝一日改变命运；有的人自觉前途无望，索性混日子；大多数人介于中间状态——劳动说不上积极，胡闹也非“没边”，但又都有自己的打算。无论怎样，反正村里也不管，更没人组织我们学习，倒是比在城市、在学校宽松自由许多。

在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下，我忽然感觉到自己很不适应，发现自己除了知道点书本知识，好像什么都不懂，遇到问题束手无策，而且常常与人发生矛盾。说老实话，那时候的我，的确有点“热血青年”的味道，真把马列和毛的思想以及“英雄”人物当做生活指针、榜样，以为“放之四海而

浇头，多次打倒，多次上纲上线的检讨，经过百日牛棚，又要我夹起尾巴做人了。

瞿白音的命运，在我国电影界和文艺界，实为一大“典型”。《独白》刊出之日，就是噩运当头之时。上海市委书记的点名批判在前，掌握了文化大权的张春桥及其喽啰的声讨在后。随着“阶级斗争为纲”的高唱入云，对《独白》的批判也步步升级。十年动乱，全国文艺界人士蒙难。当年赞赏《独白》的人也大多受到了株连。感谢中国电影

出版社，于 1982 年刊印了《创新独白与瞿白音》一书，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白音不幸，于大动乱之年入狱，“四人帮”倒台后重见天日，不久即病逝于上海，时在 1979 年 11 月 1 日。而今又是 30 年过去了，怅望云天，惆怅何似，为他默念，愿他安息。

2010-2-3

(责任编辑 徐庆全)

皆准”。其结果，用来要求自己还仅仅是自己受罪，用于对待别人则很不招“待见”，还造成关系紧张，一度苦恼极了。我开始明白，理论不能当饭吃，再死读马列不仅不现实，而且也很假——1968年父亲被审查时，我成了“狗崽子”，苦闷中曾经整日泡在图书馆读马列，把那些经典一本本读过去，还做了不少笔记，结果发现，我对马列依然不甚了了，除了知道点皮毛，连实际问题都解决不了。

特别是1971年“9·13”事件以后，“文革”神话破灭，人们的“革命”理想和激情迅速降温，加之农村的艰苦现实，没有几个人再傻读马列了。即使读，也开始有了选择，例如，我对20世纪50年代选编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就有兴趣，而且读了确有获益。至于“毛选”，如果不是必须的教条式地学，也大多为了“实用”以应付差事。

现实生活教育了我，使我知道了需要重新安排自己的读书生活，读点真正对生活、对实际、对未来“有用”的书了。

(二)

20世纪70年代初，我读的最多的是历史和文学书籍，虽然有限也很初级，但却是好的开端。如果说，我后来多少掌握了一些文史知识，始终对文史保有兴趣，并且最终从事了文字工作，那么，入门在“文革”前，上路则是从插队开始的。

对文学的爱好是几乎所有年轻人的共性。在那个年月，文化的缺乏、精神的苦闷，更使许多同学对能够抓到的任何一本小说如饥似渴。我带到农村的几本中外小说就显得“洛阳纸贵”了。我们几个同学还一度组成了一个读书小组，虽然坚持时间不长，但却是一段很有意义的生活。记得我们读的最多、讨论最多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和《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我自己至少读了五遍以上，而且写下了不少感言。保尔、牛虻和青年马克思，成为那个年代有限的几个我们可以追求的、有血有肉的典型人物，我们崇拜至极。

特别是苏联人写的小说体传记《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出版，用非常粗糙的纸印刷的），把19世纪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人运动作为背景，描述了马克思青年时

代的成长历程和他思想形成的条件，那是当时所有准予公开发行的官方教科书都没有的，对于我们理性而非教条地理解马克思和他的思想大有裨益，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

它使我开始认识到，年轻人的理想和追求不能再是豪言壮语、革命口号等虚幻的东西了，应该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有清醒和比较全面的认知。这点，影响了我以后几十年的人生选择，包括舍弃一些非理性的追求，寻求一份有个性的自我。

它引述的马克思写的《论青年的职业选择》中所说，“我们往往不能选择自己觉得合适的职业，因为在我们对社会开始发生作用之前，我们的社会地位就已经大体确定了。”曾经引起我思想上的强烈共鸣。现实中，家庭出身不是决定性地影响着许多人的命运吗？我们对自己的前途又能够有多少选择？当然，马克思自己后来选择了“背叛”，我们中的许多人后来也摆脱了宿命，但对于更多的芸芸众生来说，马克思的观点仍然是对的。

受那本书的影响，我甚至一度对朋友和人生伴侣的选择也要“参照”恩格斯、燕妮了，曾经不断地向朋友，包括对我表示了某种“好感”的女生推荐这本书，从他们的反应“判断”是否同道中人，可见它对我的影响。它也因此而保存至今，成为我那段虽然幼稚但却纯真的难忘岁月的纪念。

(三)

读自己带来的书毕竟有限，在相对封闭的山村，要找到书也很难。走出去才会发现新天地。

1971年初，我到同在山西、相距250公里的榆次去看同样插队的姐姐。在那里，结识了两位来自北京的高中插队生，他们带的、读的书比我丰富多了，他们的思想也比我成熟、深刻多了。我在那只有7户人家20多口人的小山村住了十几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聊天，从“三言二拍”到《子夜》、《骆驼祥子》，从《静静的顿河》、《死魂灵》到莫里哀、哥尔多尼戏剧集；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际，真是海阔天空——原来，这世界上除了革命，还有那么丰富多彩的生活，有那么多美

好的事物需要我去了解、认识。那以后,我与其中的一位建立了通信联系,交流读书感悟,相互寄书交换,回北京更是过从甚密,(他帮我买到了许多当时“仅限内部发行”的书籍,如苏联小说、世界通史等等)成为我那几年大量读书的一条重要渠道。

读书就要买书。我们村距县城10公里,中间还要翻山,所以进城的机会不多。

但我每次进城,新华书店是必去的。去多了,与那里的人也算混了个脸儿熟,因此有了进入柜台到书架挑书的“特权”,甚至可以到书库去。这样,我意外地发现那里竟然有一些不公开卖的书,譬如“商务”版翻译过来的外国历史书籍(县城似乎不那么在意是否“内部读物”。它还表明,当时的图书发行渠道仍然按部就班)。

我在那里先后买过美国史纲、现代英国、阿拉伯简史、英法德俄断代史、日本近代史、简明欧洲哲学史等等,真是大开眼界。由此,我还一度对欧美的经济问题发生兴趣,搜罗了一些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美元霸权地位、国际经济贸易的书来读,而且津津有味。

说到对世界问题发生兴趣,还要感谢一位50年代初从美国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的老人。“文革”中,他学无所用,下放到干校去喂猪、种田。在与我的闲谈中,他聊起了美国的大学教育、经济模式,谈到了西欧各国与美国的异同、北欧小国的高福利政策,讲解了什么是资本、垄断、税收、股票……那些知识对我来说闻所未闻,既好奇又新鲜,激发了我的求知欲。应该说,我对世界的了解,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也第一次知道,关于资本主义、西方社会还有与我们所受教育完全不同的描述与“说法”,而且能够让人接受。

交朋友、拜长者,都是求知的重要途径,而不限于读书。



建设山区的青年们

(四)

1972年底大选调,我无缘“跳龙门”,成为继续插队的少数知青之一。次年初,母亲从江西干校回到北京,参加筹办外交干部培训工作,北京有了家,我回去准备参加传闻中的“高考”。三个月时间,除了数理化,我尽可能地四处搜寻“闲书”,从中外名著到各种杂书,从政治、经济到文学、历史,甚至旁门左道,只要是印了字的,能够抓到的,无论横排竖排、繁体简体、有无头尾,都一本本读下去,满脑子灌了一堆杂学,而数理化,除了学到一元二次方程和因式分解,就再也学不下去了。到现在,连那些也忘得差不多了。

现在回想30多年前读书,还是对名著印象深刻。读过的中外大家作品,现在还有记忆,而那些杂书则大多忘记了,不看笔记,甚至连书名都想不起来。这或许就是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的不朽魅力。

也有尽管并非名著,但能够影响人生思考的书籍,会让人记忆犹新。譬如,给我留下印象最深、震动最大的是南斯拉夫人德热拉斯写的一本小册子《新阶级》。作为南共元老、纯粹工人血统的革命领袖,革命成功了,官至国家领导人了,却写出那样一本彻底否定共产主义的书籍,真的很让我这个从小接受共产主义“正统”教育的人有

振聋发聩的感觉。尽管他作为南共领袖之一,由于对苏共霸道、苏联霸权有切肤之痛,不免带有某种民族主义情感,但更多的还是源自对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实践经验和教训的理性思考,即使如我这样的身处“文革”极“左”年代的中国青年,也觉得能够理解与接受。这本身就值得思考。

记得那本书出版于1958年,是作为批判用、只供内部参考的所谓“灰皮书”。以当时的政治标准,书中的观点确实是极“反动”的,而且很有鼓惑力。但几十年后发生的苏东剧变,却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作者的远见卓识。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问题、专制问题、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即使在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据说上世纪90年代,这本书在国内再次重印,仍然是“供内部阅读”)我当时为此书做了大量的笔记,时至今日,仍然能够记起书中的一些论述和观点。也正是这本书,引发了我对中国许多现实问题的思考,尽管我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是,但我想,我有思考的权利,并最终成为一种习惯。

(五)

1973、1974两年的“招生”,我都因为“政审”不过关而名落孙山。第一次落榜我很沮丧,回到村里,除了干活就是读书,连家信都不愿意写,闹得家里以为我出了什么事。第二次落榜,我已经很坦然,不仅因为“历练”出来了,而且因为结识了几个同样酷爱读书的同学,彼此往来密切,相互成为求知的动力。

那时候,我们的兴趣转向了国际政治历史。这与当时陆续出版了一批内部翻译作品有很大关系。在我的读书笔记中,出现有《铁托传》、《六次危机》(尼克松)、《约翰逊回忆录》、《美国总统言论集》、《拿破仑传》、《回忆与思考》(朱可夫)、《战争时期的总参谋部》、《出类拔萃之辈》、《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十三天》、《布拉格之春》等等。

读书需要交流,交流更有长进。读了《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十三天》和《布拉格之春》,我写信给朋友说,苏联确实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早就不是了。但朋友回信说,尽管苏联被称为修正主义、霸权主义,但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

赛、和平过渡”却还是有意义的,许多国家实际上都在这样做。他还引申说,看问题需要世界的眼光,可惜,我们现在的“接班人条件”中却没有这么一条。这番话使我再次感到自己思考深度的不足。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最让人感兴趣并且引起思考的,是厚厚四册130万字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书中以翔实的历史资料描述的纳粹德国兴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在相当程度上颠覆了我们原来的认识。在了解到希特勒绝非简单的“战争疯子”、纳粹之所以逞凶世界的同时,我第一次知道了苏联和斯大林的另一面——为了自己的利益与纳粹做了交易,出卖甚至瓜分了弱小的邻国。这哪里讲什么国际共产主义?讲什么解放全人类?联系读过的其他有关书籍,我开始对世界、对历史、对国际问题产生了不同于官方“主流”思想的新认识。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北京和上海还陆续出版了一批苏联现代小说和名为《摘译》的不定期刊物,(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种版本)每本的前言都有“大批判”式的评论。但是,那毕竟是原汁原味的外国作品,人们不管那些,有书读就行,我也设法借来看了绝大部分,如《你到底是什么》、《州委书记》、《多雪的冬天》、《落角》、《人世间》等等。通过那些小说,我多少了解了一些苏联和其他国家的现实生活,弥补了自己孤陋寡闻的不足。

《摘译》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关于智利总统阿连德搞的“社会主义实践”,我甚至与朋友讨论过“搞社会主义能否走议会道路?阿连德能否成功?”的问题。现在想来很可笑,但在那时候,却是十分“离经叛道”的“危险”言论,也可见那时的人们在私下里已经不再信奉官方的宣传。

(六)

为了多读书、读好书,需要四处“打探”,发现了就要尽快借到,并且及时归还。有时候,一本好书几个人抢着看,只好排定时间,限时交接,那就得昼夜不停地看完。如果是好朋友的书,甚至可以拆开分散去看,然后自己在脑子里去衔接内容、整体“组装”。

除了借还有“偷”,就是跑到封存的“四旧”物

品里去拿,譬如学校的图书室、县里的文化馆、办公室的杂物间。封存的东西当然不能随便拿,况且是“封资修”的“毒品”,所以只好“偷”。好在孔乙己说过,“窃书者不为偷”,我们倒也安然。

那年月看书的人不多,农村尤少,因此“捡”到书的时候也有。一天,我偶然看到几本被人扔在角落里的小册子,灰色封面,几乎没有设计装帧,书名《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并且印有“内部使用”字样。这种书怎么会流落到农村的,我不知道,想来拿到的人也不感兴趣,才扔在了,被我捡到了。

我翻检了几页,看到目录中的作者大多是新中国成立后屡遭批判的人物:陈独秀、胡适、戴季陶、章乃器、罗隆基、梁漱溟、潘光旦、张东荪……内容是他们在20世纪20~40年代写的文章,其中许多外来词还是直接音译,如“德莫克拉西”、“布尔乔亚”、“普罗大众”等等,主题都是讨论中国社会的改造、发展道路的设想及实践,与我们整天被灌输的“革命路线”截然不同,与那些作者被批判的“定论”也大相径庭,读起来很有意思。更重要的是,我知道父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交代”自己的历史和思想时,自认他所服务的《大公报》和他自己对20世纪40年代末的国共争端持“中间偏左”的立场,被指“不革命”甚至“反革命”。个中原由、详情我不明白,看到这本书,自然极有兴趣,如获至宝。

那套书确实为我了解中国现代史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使我通过第一手资料直接了解了非共产党人如何认识中国、怎样改造中国的思考与实践,真是别有天地。为了进一步了解作者的背景和经历,我还写信列出名单,请父亲一一解答,他对历史和那些人物的了解,给了我很大帮助。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知道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中还有那样一批为国为民奔走呼号的思想者和实践者,尽管他们没有成功。这也成为我至今关注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起点,成为我努力保持独立思考 and 自由精神的基础,尽管我知道自己远不可及。

插队后期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和评《水浒》运动,给我们带来了一次读古文和古典小说的机会,我没有参加运动(也没有资格和条件),但却在阅读上补了一课。也算意外收获。

坦率地说,插队的最后两年,我们已经很少参加劳动。老乡们知道我们迟早要走,村干部更不再管我们。其实,除了劳动,我们也从来没有接受过什么“贫下中农再教育”。那些日子,我只要不出村去串门“打游击”,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了。有时候得到一本好书,又懒得起床,就索性煮一锅玉米放在炕头,钻在被窝里能够看一天,饿了就抓个煮玉米吃,倒也自得其乐。

1974年冬天的一场大雪,使我陷入了困境。我在当年12月1日的日记中写到,“从前天夜里开始降雪,今天竟飘成鹅毛般了,天地之间一片白茫茫。按说,这银白色的世界应该是极令人惬意和舒畅的,然而,断炊的威胁反而因这景色更显得有交迫之感。粮食没了,煤亦将尽,点灯无油,甚至连火柴也要节约使用了。大雪天给这一切问题的解决又增加了一大难题。物质与精神的寄托显得那么脆弱,脆弱得令人不愿去碰,也不敢去碰,真让人浮想联翩……我知道指望别人是没有用的,希望在自己,希望在将来。然而,现在的自己——无所作为地被这困境包围着,将来——渺茫得几乎让人看不见,只有读书——目前生活中唯一不被环境影响太大的一部分(还属于自己)。因此,最现实的希望就寄托在读书。贪婪地读书吧,吮吸知识,准备力量,为了明天。”那是我农村度过的最后一个冬季。

插队岁月的读书生活给了我极大的精神安慰,更给了我丰富的知识,也养成了我嗜书如命的习惯。可以说,如果没有当年精神生活的极度匮乏,没有那般如饥似渴的贪婪寻觅,我可能不会如此密集地读了那么多的书,也不会那样广泛地涉猎了那么多领域。时至今日,我掌握的许多基本知识、我坚守的一些基本理念,都与插队时的读书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真的很怀念并且感激那段时光。

(责任编辑 萧 徐)

(七)

沈巧珍当“右派”

● 述 玆

手边有一封信,还有几则写在照片背面的留言,读之不免心酸掉泪,如是者三。兹摘录其中一二如下。

“你好!真对不起,迟迟(未)回信,请原谅。这封回信好难写,提笔有千斤重,思绪万千理不出头绪,巧离我而去已三十八年之久,岁月流逝也冲不淡我对她的思念之情。再来写她的逆境、磨难及她求生不能的逝去,残酷的现实我几十年来都难以淡去。巧妹单纯得像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竟会招来杀身之祸。三十二岁,两个孩子的母亲,绝不会轻易走绝路,是社会容不了她,她的逝去的后患遗(贻)害了身边及在汉的亲人。幼小的心灵受到摧残。五六岁时两姐弟才送来汉口我身边。两孩聪明可爱,模样也像妈妈。小学在汉借读,初中就不行了,那个年代的规定死板,不能通融,又只好送回其夫身边。

女儿酷似母亲,爱书,会读书,特用功,十六岁考大学,语文考九十八分,被四川南充师范学院破格录取(数理分数差),本应读语(中)文系,可偏分在政治(教)系,不知是否他父亲之意,读到二年级患抑郁症,我去信接(要)她一定来汉散散心。女儿从小就胆小,妈妈去了的那段时间,父亲每晚挨斗,打成反革命家属,一岁四个月的女儿就跟在父亲身后,且不能进礼堂,困了就倒在地下,睡着了也无人敢问津,我不敢想这些。八五(四)年的暑假,杨劲(巧的女儿名,儿子名杨耘)终于来汉了,神情呆滞,满脸愁云,我的心都紧了,一方面给她做连衣裙,另外就带她出去玩。我的年轻的同事们也带她去玩,她从未说一句话,我有些紧张了,带她到武汉精神病院去看病,诊断患精神忧郁症,(说)服药会好。劲儿要求休学一年,我同意,可她的父亲不同意。我去电报,请其来汉商议,他不但不同意留汉治病,而且根本不同意医院的诊断。劲儿有病需要休学治病,

(他)硬是把劲儿带回四川,送她去上学了,进了大三了(父亲也不同意女儿由政治[教]系转到语[中]文系)。就在10月20号她满二十岁的下午,出去买书,还要同宿舍的同学留饭,这一去永远就再未回来了。报案并且报到了北京高教(教育部),永远地杳无音信。一个聪明的女儿就此永远蒸发了。巧妹去世后,姐弟俩就相依为伴,弟弟没有了姐姐的关怀,放学回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久而久之,耘儿也慢慢的电话少到不爱讲话了(父亲早娶了后妈,女方四个儿子,不与耘儿住在一起),因此儿子(耘儿)也患上了抑郁症,开了药不认真按时服药,其病发展到他一个人往外跑,有时几天不回家,媳妇半夜来电话,哭着说:‘耘儿不见了!’我让他爸带来汉口看病,这次我一再嘱咐,一定要督促他按时吃药。我差不多隔两三天就去长途问。现在已痊愈,38岁就办了退休。这接连不断的悲剧发生,都是‘文革’的后遗症。巧儿如果不分到原本极‘左’严重的四川,如果不是1957年毕业,如果不读语(中)文系,如果……总之只怪妹妹生不逢时呀!人世间的谁谁说个清楚明白?”(2005年5月2日信)

“杨劲读到大学三年级时写信给我说,我小时候怕人,也不会笑,总是哭,只有到了姨妈身边我才会笑。此话不假,没妈的孩子可怜呀,到我身边后,姨父也特爱他们。三个孩子都很乖。”(2004年3月25日所寄照片背后的留言)

写信人叫沈怀珍。信中的“巧”或“巧妹”,指沈巧珍。“巧离我而去已三十八年之久”,说的是发生在1966年7月25日的事情。这一天,写信人的妹妹沈巧珍于四川自贡的釜溪河投水自尽,时年三十有二。撇下一儿一女,女儿两岁不到,刚学走路;儿子才四个月,还在吃奶(见照片)。

年轻的母亲为何如此绝情?是她不眷恋这个世界吗?当然不是。她深情地爱着我们的祖国,深

情地爱着教育事业和她的学生。至于那一对儿女,更是她的心肝宝贝,她的至爱。她怎么割舍得下?是这个世界容不得她,逼着她走上绝路的。

沈巧珍的女儿杨劲“死了妈妈后天天哭”(沈怀珍语),小小年纪即患上抑郁症,于20岁生日那天一去未归,杳无音信。多半是远赴天国与母亲相会了。1966至1984,18年两条人命,母女二人都在如花似玉的青春妙龄寻了短见。“硕果仅存”的宝贝儿子也是个病秧子,刚38岁就提前退休。这是怎样的人间悲剧啊!

让我们跟着写信人的叙述,去回顾沈巧珍那短短的一生吧。

“我比巧妹大一岁四个月,从小就生活在一起。抗战迁到四川万县,我五岁、妹妹四岁就上了小学,那时是用虚岁,我就是六岁应(该)上学了,妈妈说六妹妹一人在家没人(一起)玩,要我带着妹妹。我们上学时(要)一直下石坎,放学就一直爬坡,巧只有四岁,我就拉着她走,下雨我俩都不会打伞,妈妈就给我们各一个斗笠。抗战胜利,我们直到1946年才返汉,耽误了一年学习,为等船。我俩就跳级读六年级。小学毕业,同考进圣约翰女子中学,又同座位,在小学也是的,老师同学都以为我俩是双胞胎姐妹。初中毕业已是解放初了,巧要升普(通)高(中)再读大学,当然我也想。但解放前后的两年,家父的生意不好,加之解放了就把药材号兼制药交公了。爸爸不同意,因为经济不行了,我对爸说:‘妹妹聪明,让她读普高,我去考中专,三年毕业了支援妹妹上大学。’爸同意了。巧一连考取了三所女中,选了一个能住读(校)又是最好的市二女中,高二时班主任动员巧报考北师大,因巧的作文总在全校的(黑)板报上登。巧自己(正)巴不得,校长也同意。班主任请数理化老师帮(助)补课,妹妹能吃苦,早四点起床晚十二点睡。她也胆大,以同等学历报考了北师大的语(中)文系,居然榜上名列第一,我二哥第一个在长江日报上看见她的名(字)告诉妹妹,巧说:‘这是老师们教得好,教学有方,我只是现炒现卖,我今后会努力的,要回报老师。’聪明好学、能吃苦的妹妹如果不是政治运动她会成才。俱往矣!”

一举考上号称“人民教师摇篮”的北京师范大学,来到千百万青年学子十分向往的首都学

习,自然是幸福无比!北师大的学生都是各地千里挑一、百里挑一的佼佼者,巧珍因为跳了两级,学习上比起班里其他同学自然稍逊一筹,但她毫不气馁,急起直追。还和大家一样自觉地锻炼身体,上二年级时当选为体育委员,并荣获体育运动积极分子奖章。

一年级下学期,巧珍在北海公园草坪举行的人团仪式上,代表新团员致词。她还有幸先后同德高望重的陈垣校长、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代表伍竹迪合影留念。

巧珍能歌善舞,入学之初曾当众表演“三套黄牛,一呀么一套马”。正好评剧演员新风霞主演的电影《刘巧儿》轰动一时,于是同学们就亲昵地将小巧玲珑的她唤作“巧儿”。在同学们的眼中,这位武汉姑娘娟秀小巧,性格朴实直爽,略有些犟气。

套用一下当今的流行语,巧珍算得上十足的“阳光女孩”。如果不出意外,未来她将拥有一份称心如意的教师工作,一个和和美美的幸福家庭。其实有位男生打从入学之初,就一直在暗恋着她。巧珍却傻呵呵地浑然不知,毫无觉察。多年之后这位男生去看望巧珍之姐谈起此事,愧疚不已,痛哭失声。

1957年,巧珍上四年级。这年春天,中共中央发出开展整风运动的通知。5月下旬,校园里出现了大字报。巧珍也看大字报,也听群众论坛,因不了解情况,未发表任何言论。这时党团组织一再动员党团员帮助党整风。同一个团小组的几名女友都觉得如果再不行动起来,就有点辜负青年团员的光荣称号了。既然校内的重大题材已经有人捷足先登,那咱们何不去采访一下食堂呢?集体采访后大家公推巧珍执笔,因为她写作课成绩优秀,上中学时经常有作文在学校黑板报上登载。巧珍当仁不让,模仿古代章回小说的写法,执笔写了《李壮士打狗孝主》,讽刺校内的不正之风。

原来,当时建于铁狮子坟的师大新校,暂无围墙,以铁丝网为界。周围一片荒凉,时有农家狗出没。有时农家狗也蹿进校园觅食。校方买了几杆土枪,雇工巡逻,规定对农家狗只可轰走,不得打死。文章这样写道:

“学校一位湖南籍的总务长(且隐其名),非

常嗜食狗肉,食堂管理员李某,为了讨好奉迎,竟将校邻农家之狗,打来烹(飧)宴总务长。李某长得身材魁梧,堪称‘壮士’,因煮狗肉时,需借用食堂的锅盆餐具等,厨师不允,李壮士便以其职权之威,强行为之。事后李壮士将剥下的狗皮,塞给厨师,以掩其口。”

此文作为苦药社《新今古奇观》系列之一贴出,曾引起全校轰动,“巧儿”也因此出名。

然而谁能想到,就为这张响应党的号召,针砭时弊、抨击歪风邪气的大字报,巧珍竟然受尽人间苦难,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当政者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广开言路、鼓励鸣放变成舆论一律、实施反击。为了某种政治上的需要,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成千上万含苞待放的蓓蕾一网打尽。巧珍的文章本已收入油印的《苦药特辑》。“苦药社”定为反动党团后,凡是在《苦药特辑》发过文章者,均在劫难逃。说来可笑,当时就凭这篇文章,给沈巧珍加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难道那位嗜食狗肉的总务长就是党的化身?难道李壮士的打狗行为就是社会主义的风尚?这篇文章原是集体采写,不过由巧珍整理加工而成,所以起初并未把她定为右派,只是让她在团内作检查。检查了几次均未通过,巧珍的犟劲儿上来了:“不就是要给我定右派吗?那就定吧。”就这么给她定了右派。所以有人说巧珍是个“自告奋勇的右派”。她哪里知道这右派可万万当不得,当上了就永世不得翻身。

“1957年11月巧分配到了四川自贡市,(这)是历史上的产盐地,很穷。1998年我专程去那里看看巧珍曾生活过的地方,也是她送命之地,一条石板路的窄街,青砖黑瓦的平房,盐井早就枯竭了,巧儿原分在新建区的一所完(全)(学)教书,后被(因)校长的调动带(来)到这穷乡僻壤的初级中学,全校只有校长和巧两个是大学生。许多老师都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总找巧帮他们,讨论,写教案。60年(代)初期,我想巧妹的日子不会好过了,又是在本来就极‘左’的省份极穷的小城工作,敏感的巧珍给我的来信中就写了,‘现在没有人找我帮助写教案了,话也少和我讲了。’在给我的信中更是写着:‘我越来越意识到1957年一把火早就把我什么都烧了个精光。’巧儿所在的初级中学,教师水平低是肯定的,且人

员多为旧社会过来的人,这些人是见风使舵的人。巧住的宿舍是一排在校园里的平房,潮湿阴暗,(她)生了两个孩子,得了腰痛病,这是生活上的磨难。教书育人,生儿育女,居家过日子,全在这片小天地,因此她生活在没有丁点自由的环境中,在众目睽睽的敌视之下,整日的活动从教室到宿舍,再到教室,还是在针尖麦芒上,连空气对她都是吝啬的。这就足以能把人窒息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素来不能受委屈的妹妹,加上又举目无亲,她如何熬得过时时刻刻、分分秒秒,太难为她了。”

知妹莫如姐。沈巧珍当时生活在一个十分险恶的环境里。她始终苦苦挣扎,好不容易熬到1960年11月摘掉右派帽子,马上给妈妈写了一封信,信纸上只有七个大字:“妈妈呀,我归队啦!”兴奋之余,又致信母校报告喜讯,并请校方补寄毕业证,另寄与陈垣校长和与女飞行员伍竹迪的合影照片。毕业证倒是补寄了,至于那两张照片,校方的答复是:“社会出名的公众人物的相片不能给你。”这对于巧珍是个不小的打击。她才意识到所谓“回到人民怀抱”的希望已成泡影,自己已经永远地入了另册。从此渐渐心灰意冷。

1966年6月,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充满杀气:“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时间红色恐怖席卷全国,血雨腥风,人人自危。巧珍自然是在劫难逃。可怜她年纪轻轻一个弱女子,1957年已经“领受”来自上面的“恩泽”“光荣加冕”,如今更“有幸”在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大革命中“经受锻炼和考验”,还得把膝下年幼无知、嗷嗷待哺的两个心肝宝贝全都搭上。校长阴险狡诈,深谙见风使舵的权术,原来重用巧珍,为的是给自己壮壮门面,白拣一个名校毕业生,价廉物美,不使白不使。如今运动来势凶猛,为了自保,便毫不犹豫地抛出巧珍,任由歹徒作践蹂躏,更有甚者,此公还天良丧尽,发动属下围攻巧珍,甚至大会宣布不许她回家哺乳,剥夺了巧珍当母亲的权利。

同1957年北师大“反右”斗争中的遭遇相比,巧珍在“文革”中所受到的种种折磨不知要惨烈多少倍!关进单身牛棚,不准回家,不准给儿子喂奶;饥饿难耐,只好到地里掰玉米棒子充饥;因

受刺激,急火攻心,胃肠痉挛,滴水不进——凡此种种,都是在把巧珍往绝路上推。由于没有目击证人,我们已无法还原 1966 年 7 月 25 日所发生的事情。只知道那天中午,巧珍只身来到釜溪河边,下到水中,一步一步地涉水向河中间走去,河水愈来愈深,愈来愈深,终于没过她的头顶……

巧珍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彻底消失了。巧珍之

死,令人扼腕,更发人深省。连这样一个清纯如水、与世无争的小女子都容不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说明我们的社会的确是有病了,而且还病得不轻……

2010 年 4 月匆草,巧珍离开我们已 44 年矣。

(责任编辑 萧 徐)

代购代邮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沈志华主编	148.00	12.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6.00	7.00
三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四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我与《第二次握手》	张 扬	32.00	7.00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张闻天图册	张培森主编	260.00	10.00
张闻天在 1935 ~ 1938	张培森主编	17.00	6.00
张闻天与二十世纪的中国	张培森著	20.00	6.00
隐蔽的秩序——拆解历史弈局	吴 思	38.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I	杨天石	38.00	6.00
丁玲在北大荒	郑笑枫	2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抹不去的记忆 老三届新三级	张 琦主编	48.00	9.00
牛棚杂忆	季羡林	29.00	7.00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	林贤治主编	38.00	7.00
信心与希望——温家宝总理访谈实录	新华社总编室	26.00	6.00
吴江文稿	俞可平主编	200.00	18.00
中南海人物春秋	顾保孜	78.00	7.00
元帅大将的最后岁月	李立宁 孟新	48.00	7.00
历史大转折中 22 个首任省长、市长和自治区主席纪实	孟庆春	49.80	7.00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	侯井天	98.00	11.00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金冲及	128.00	12.00
沧桑十年——共和国内乱的年代	马识途	38.00	7.00
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	刘 刚 李冬君	58.00	9.00
1957 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1978 大记忆	苏 峰	35.00	7.00
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	钟 庆	28.00	7.00
三十年河东: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	杨继绳	39.80	8.00
国学大师之死	同 道	29.00	7.00
人生的三路向:宗教、道德与人生	梁漱溟	28.00	6.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7.00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 思	28.00	6.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 思	28.00	6.00
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	邓 鹏	97.00	10.00
《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	徐庆全	45.00	7.00
国史札记(事件篇)	林蕴辉	40.00	7.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辉	38.00	7.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 克 李 锐 龚育之等	28.00	7.00
经历——我的 1957 年	和凤鸣	29.00	7.00
流逝的岁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回忆录	李新著 陈铁健整理	39.00	8.00
官场怪圈定律	李若公著	46.00	8.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张秀山	43.00	7.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5.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 锐	22.80	6.00
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于光远	36.00	7.00
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			
鲍·斯拉文著 孙凌齐 李京洲 李桂兰译		26.00	6.00
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王光美 刘源等	20.00	6.00
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	张广友	32.00	7.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 10%付邮费)

《烙印》——“可以教育好子女”的集体记忆 1949 年后的多次政治运动,积累了一批又一批“阶级敌人”和“阶级异己分子”。“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为地制造种种敌人并实行政专,不但“黑五类”分子受到严厉的制裁,连他们的子女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和打击,有的被迫害致死。他们带着屈辱和创伤生活在那个年代;他们被施以暴力或遭受凌辱;那种近乎“生而有罪”的困境使他们因家庭关系在政治上遭受不公平的对待,历尽坎坷……

本书分别记述了他们不同的身世故事,表达了对抗遗忘的集体意志和社会变革的共同渴望。

《“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 本书比较完整和系统地讲述了中共夺取政权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其决策的种种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它清楚地说明,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和国际政治理念的改变,包括俄国革命、二战及战后国际关系的改变;得益于毗邻的共产党政权的大力援助。具体到中国,对于正在崛起的毛泽东来说,还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入侵的影响。否则的话,在接连遭遇了 1927 年和 1934 年惨重失败的中共,何以能由极度弱小而一步步壮大?原本足够强大的国民党,何以会一步步削弱、瓦解,以至于无法适应战后的新形式、新条件,最终竟被中共所推翻?该书被誉为“民间版的中共党史”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解读 II 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人物之一,2006 年 3 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首次开放蒋介石日记,作者阅读了蒋介石日记的手稿本,复以各种文献、史料比证、勘核,对于人们一直想知道又得不到正确答案的历史议题廓清迷雾。寻找真实的蒋介石,正确评价其功过是非,揭示其本相,对于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国共关系,正确认识 and 书写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历史是必要的;对于建立两岸的和平关系,实现中华民族的和解与和谐也是必要的。

北京市内乘车路线:公交车 13 路、21 路、32 路、65 路、68 路在三里河东口站下车,西行 50 米路北,西华饭店院内。

联系电话:010-68532048,68539058

黎澍：八十年代的一面旗帜

——读王学典《思想史上的新启蒙时代》

● 李 钧

与王学典此前出版的《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二十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和《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流》等著作相比，这部《思想史上的新启蒙时代：黎澍及其探索的问题》（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可能算不上他的代表作，但注定会赢得更多人的共鸣与更持久的关注，因为这部专题文集聚焦黎澍这样一个箭垛式人物，揭橥有关八十年代的星束式问题，清理正在被遮蔽的史实，引领人们重返八十年代现场，理解新启蒙精神的本质和意义，对后学者承继20世纪知识分子精神传统大有助益。

黎澍：思想解放的一面旗帜

“八十年代”是一个呼唤英雄也英雄辈出的时代。

美国历史学家悉尼·胡克在《历史中的英雄》中，把政治英雄称为“行动的英雄”、“事变性人物”，把启蒙英雄称为“思想英雄”、“事变创造性人物”。“所谓事变创造性人物就是这样一个事变性的人物，他的行动乃是智慧、意志和性格的种种卓越能力所发生的后果，而不是偶然的地位或情况所促成的。”他还特别指出：“我们所谓历史上的英雄或伟人仅指事变创造性人物。”也就是说，思想英雄或事变创造性人物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作用远远超过政治人物和战争英雄。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则在《英雄与英雄崇拜》中提出了“作为文人的英雄”的概念，认为：“作为文人的英雄……是这些新时代的产物；只要写作这种神奇的艺术存在，或者，只要我们称之为印刷的技术存在，文人英雄就可以继续作

为未来的英雄的主要形式而存在。”“这个‘文人英雄’必定被认为是我们最重要的现代人。他是所有人的灵魂。整个世界将依照着他所教的一切去做。”“真正的‘文人’必定有一种神圣，不论这个世界是否承认它：他是世界之光，是这个世界的‘教士’——像一个神圣的火柱，引导世界在其黑暗的漫长途中穿过‘时间’的荒野。”从卡莱尔所举的例子如约翰生、卢骚、彭斯等来看，他主要是指启蒙时代的人文知识分子。在中国，严复和夏曾佑在1900年撰写的《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中，将思想家和科学家视为比大彼得、华盛顿、拿破仑等“帝王英雄”更伟大的一类现代英雄，因为他们的学说“皆开辟鸿蒙，流益后世，视拿破仑、华盛顿为更进一解矣。”

在王学典看来，“80年代”的中心问题是“如何避免‘文革’的重演？”而中心论题则是“反封建”。而如果说“在整个‘八十年代’以政治思想观念反思为主要内容的‘理论界’始终处于支配地位”的话，那么，他曾多次亲炙教泽的黎澍就是“‘八十年代’理论界的杰出代表、一位卓越的思想英雄”，是“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一面旗帜”，是“批判封建主义残余的启蒙者”，是“清算教条主义影响的理论勇士”，是“新时期史学界思想解放潮流的旗帜”，是“以真理为惟一追求”的智者；在八十年代“反封建主义”思潮演化中，黎澍及其主编的《历史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冲锋陷阵作用，其作用堪与当年的《新青年》相媲美。

——黎澍最早看出“文革”的“封建”本质，严肃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他认为：“文革”虽短，却是二十世纪甚至更长时期内人类思想史上最黑暗的岁月之一。黎澍和他主持

的《历史研究》最先站出来揭破这一“黑暗”并给这一“黑暗”最系统最深刻反省。

——黎澍始终不渝地“反封建”。他认为“中国所面临的不但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且有社会主义同封建势力的矛盾,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不能牢牢地站稳脚跟,就必定倒退到封建主义”。因而,消灭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黎澍揭破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中若干影响深远的错误观点。他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提法完全错误,应当坚决抛弃。“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提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能将一切历史都归结为阶级斗争史。

——黎澍对“暴力崇拜”、“革命偶像”、“农民动力说”等进行了质疑与反省,重新估价了“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和“卫生救国”等改良主义主张和实践的意义,进而推崇“长期积累、自然演进”的和平建设,赞美“无声无息的变革”和“潜移默化的”“和平演进”,开启了“告别革命论”之先河。他认为:“真正的不可抗拒的革命,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产业革命,都不是靠暴力完成的,也不是任何暴力所能完成的。……任何暴力手段,不论是自上而下的,还是自下而上的,还是上下夹攻的,都无济于事。”——中国近现代史由此而改写。

——黎澍第一次明确论述了封建主义思想观念、资产阶级思想观念及共产主义思想观念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把“文革”时期的中国社会性质称为封建社会主义。

——黎澍认为中国式的教条主义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这样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同样是反革命特别是那些善于伪装的反革命的好帮手。‘左’并不比右好。”因而他主张回到马克思主义元典。

——黎澍率先提出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主张,主张像五四那样对“以孔学为中心的封建传统,彻底加以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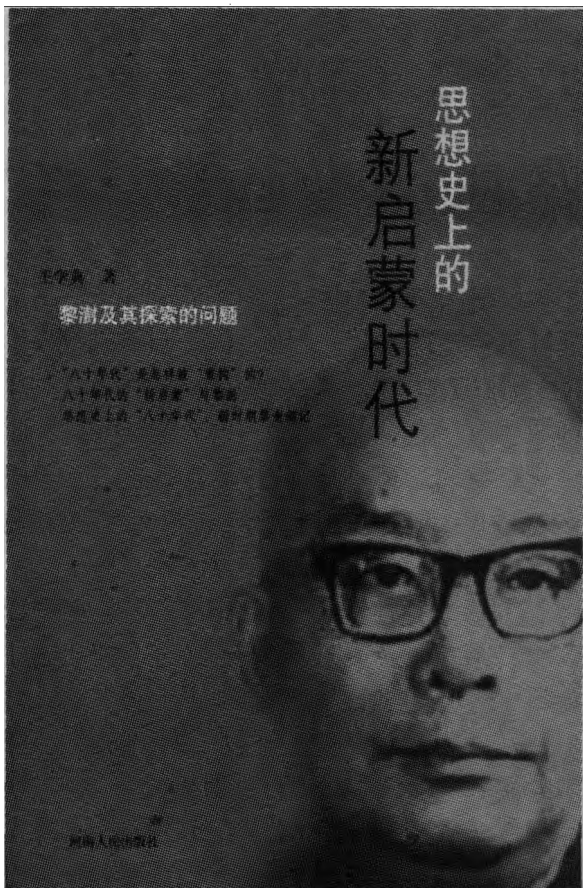
——黎澍把农民及其起义看做是“封建”范畴内的现象,拿出大量证据来彻底否定太平天国、义和团的农民起义。

——黎澍刷新唯物史观,实现了中国当代史

学思想史上的第三次重大突破;他提出并解决了史学理论中的许多“元问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总之,黎澍对“新封建”的批判、对“思想解放”的倡导、对“现代迷信”的剖析、对“现代化”的追求、对“教条主义”的诛伐、对“小农意识”的清算、对“西体中用”的张扬,反映了“八十年代”特有的对未来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黎澍也因之成为“八十年代”理论界的杰出代表、一位卓越的思想英雄。谁要是想了解思想史上的“八十年代”,就必须读黎澍,任何其他人都不能完整地、准确地代表这个年代。王学典在文集中高度评价黎澍先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新启蒙精神,并名之为“黎澍精神”:“在追求真理时的那种‘根绝一切犹豫’、摒除‘任何怯懦’的献身精神,彻底的、不妥协的、没有丝毫奴颜与媚态的大无畏精神,治学时不瞧别人脸色的独立精神”,其实质就是“不唯上,只唯真”。

今天看来,黎澍当年的许多激进见解都已成为常识。但是,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价值时,必须还原他所处的时代,这样才能对他抱“同情的理解”。——“宇宙是无限的”在今天是再普



通不过的常识,但是布鲁诺当年却因此而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处火刑。——黎澍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就是一个为常识而战的布鲁诺。随着时间的推移,思想理论上的“黎澍时代”可能会成为过去,但“黎澍精神”一定会长存。

关于中国现代学统

“黎澍精神”是新启蒙精神的一个缩影,她丰富了二十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传统或现代学统,让我们在回首二十世纪时不致过于赧颜羞愧。

首先,黎澍精神的核心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贺麟说:“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它有它的大经大法,它有它神圣的使命,它有它特殊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德里达认为:“思想的自由,意味着可以对任何事物进行无条件的追问,对任何真理进行无条件的质疑,对任何权威进行无条件的反抗。”以这样的标准观照新启蒙时代的黎澍就会发现,无论是他自谓“党外民主人士”还是后学者称之为“江湖思想家”、“左翼自由主义者”,都凸显了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真”的学术胆识与风骨。他在学术与政治夹缝中争取说话的权利和说真话的自由,鼓吹言论自由与学术争鸣,反对将学术问题政治化,显示了“有学问的思想家”的卓越风范。正如王学典所说:“黎澍不死的地方在于:在社会政治体制完全吞没了民间社会的时代,他的思想、精神、心灵却始终未被整合,尽管他有时处在主流文化的核心圈,但他的思考却大部分在圈外。”1990年代以后,“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学界更多表现出一种犬儒主义气质。前后对照,黎澍的自由精神更显得弥足珍贵。

其次,关注现实的“问题意识”。以左拉发出《我控诉》宣言为象征,“知识分子”自诞生之日就具有超然性与介入性的双重品质,即“专业精英”与“社会良心”的结合。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不仅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更是对社会发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学者余英时

说:“学者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所有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而这种关怀必须是超越于个人私利之上的。”齐格蒙特·鲍曼说:“‘成为知识分子’这句话所意味的,是要超越对自己的职业或艺术流派的偏爱与专注,关注真理、正义和时代趣味这些全球性问题。”因此,真正的知识分子不能仅仅“为学术而学术”,满足于做专家或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更不能“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他必须承担公共性的道义使命,必须在大是大非面前有所担当,“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研究还应当与现实发生关系,否则就很容易成为索引考据派或玄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黎澍以天下苍生为念的胸怀,永远值得后学者铭记和效法。

第三,学术批评与争鸣的勇气。王学典在《放逐“现实”回避“问题”:20世纪90年代学风的致命伤》一文中指出了当前学界出现的躲避“现实”、遁入象牙塔、回到乾嘉去、争鸣意识缺席的现象:“由于缺乏‘问题’,使得学术界疲软不堪、生气全无。更重要的是,没有‘问题’及其论战就没有焦点,没有焦点就无法聚合力量,‘问题’及其论战是组织学者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攻关、攻坚的最有效、最恰当的方式。没有‘问题’的史学界必然一盘散沙、各自为战、人自为战。”当下的学界流行的是考据风、自说自话或某个小圈子里的哥们溜须拍马互相吹捧,而很少真正的批评与争鸣。这种情形不能不令人怀念八十年代的学风。就让我们再次重温黎澍持守的箴言吧:“科学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事业。即使冒犯上帝,也要无所畏惧。没有无数科学家的献身精神,科学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在科学的入口处,如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作者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萧 徐)

吕思勉先生的史识与史德

——吕著《中国通史》读后

● 章立凡

不时有朋友问我：以最便捷的阅读了解五千年来的中国史，读哪种通史好？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排除掉《史记》、《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那样的文言大部头，读过的新式中国通史中，范文澜、蔡美彪先生主编的有10册，白寿彝先生主编的有22册，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是两册，均为1949年后的版本，或多或少都有“以论带史”的特色；相形之下，吕思勉、钱穆、黄现璠先生的通史类著作，比较简约精要且鲜有政治烙印。

一 广博的视野和独特的视角

吕思勉先生(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出身书香之家。他幼承家学，次第入塾入县学，旧学根基深厚，基本上是自学成才，未接受新式大学教育。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后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若按当今只重学历不重才识的官式教育制度，他连执教资格都不具备。民国时代学术重镇在北京大学，以他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前往任教不成问题，他却选择了留在私立光华大学(20世纪50年代并入华东师范大学)直到逝世。吕先生的学历、学术旨趣，与当时西方教育背景的学术精英不甚合拍，而坚守“私学”传统，不愿涉足官办的公立大学，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吕先生是一位通博之才，一生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门史以及大量史学札记，共有八九百万字。这部《中国通史》原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以文化现象为题目，下册乃依时代加以连结”。在上册中，他将《史记》“八书”体例加以细化，分解为十八个门类，分别加以论述。下册从民族起源、古代社会始，按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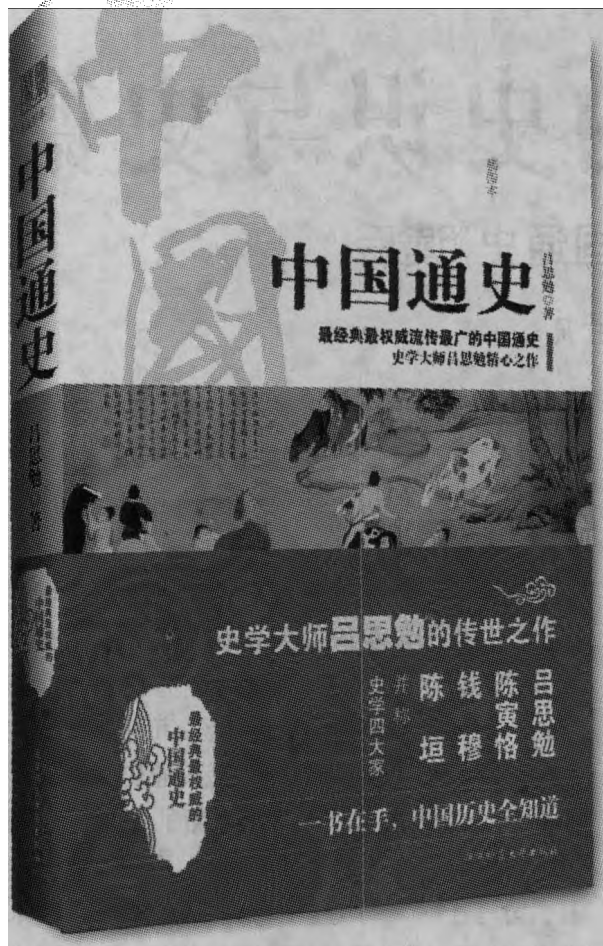
叙述历朝历代史事直至民国开创。以人文史为纬，以政治史为经，表述分明，议论风发，浓缩中国五千年以上的历史于一书，仅用了38万字，其功力非同一般。

应该用怎样的视角和立场，去回顾和审视历史？我认为至少应做到两点：一、先有宏观视野，后有微观视角，随时穿越时空，不断调整焦距；二、保持平常心，不预设立场，审视距离放在目标时段的100年至500年之后。通史写作需要具备穿越时空的视野和高屋建瓴的史识，否则很难驾驭海量的史料。吕著《中国通史》不仅继承了司马迁以来的史学传统，同时采用了清末梁启超“新史学”所开辟的学术视野，将中国史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放到世界史的时空观察研究，并对梁先生的酷锐视角有所调整，与政治保持了适当距离。

二 对儒、法两家经济思想的评述

我在阅读中最感兴趣的部分，是吕先生建立在旧学底蕴和新学高度上的历史观。原书由私域扩展到公域，自初民的社会生活始，从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而及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从实业、货币到衣食、住行，从教育、语文到学术、宗教，解析社会制度、经济、文化的演变。各章节的排序及内容的表述丝丝入扣，具有内在的历史逻辑关系。

吕先生治学的严谨，不仅在于具有宏观的视野，同时也关注到历史的细节。他从经济制度上把中国的历史分为三大时期：“有史以前为第一期。有史以后，迄于新室之末，为第二期。自新室亡后至现在，为第三期。自今以后，则将为第四期的开始。”



他注意到：“在东周之世，社会上即已发生两种思潮：一是儒家，主张平均地权，其具体办法，是恢复井田制度。一是法家，主张节制资本，其具体办法，是（甲）大事业官营；（乙）大商业和民间的借贷，亦由公家加以干涉。”法家在统治技术（治术）方面，懂得“创设新税，自当用间接之法，避免直接取之于农民。在与百姓日用相关的盐铁上“加些微之价，国家所得，已不少了。”汉代法家桑弘羊的盐铁官卖及均输政策，“筹款的目的达到了，矫正社会经济的目的，则并未达到。汉朝所实行的政策，如减轻田租，重农抑商等，更其无实效可见了。直到汉末，王莽出来，才综合儒法两家的主张行一断然的大改革。”（第五章 财产）

吕先生认为：“王莽的失败，不是王莽一个人的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失败。”王莽失败后，中国的社会改革运动长期停顿，仅出现过“平和的、不彻底的平均地权运动”，如晋朝的户调式、北魏的均田令、唐朝的租庸调法，至唐德宗朝改为两税制后，“国家遂无

复平均地权的政策”。宋朝王安石变法，关注点已转移到粮价，推行青苗法用意虽良，但在商品交换及市民社会尚未充分发育的年代，权力无法监督，改革最终沦为秕政。他总结说：

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然其宗旨虽善，而其所主张的方法，则有未善。这因历代学者，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太深，而对于现实的观察太浅之故。在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无疑是儒家。儒家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认识本不如法家的深刻，所以只主张平均地权，而忽略了资本的作用。（第五章 财产）

这段论述是相当公允的，肯定了改革者的历史地位，而较之“文革”中为政治需要生造出的“儒法斗争史”，又不知高明凡几。

三 对文化与制度的思考

吕先生在解析财产制度由公有制向私有制演变时，提出“人类的联合，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无分彼此，通力合作，一种则分出彼此的界限来。既分出彼此的界限，而又要享受他人劳动的结果，那就非于（甲）交易、（乙）掠夺两者之中择行其一不可了。而在古代，掠夺的方法，且较交易为通行。在古代各种社会中，论文化，自以农业社会为最高；论富力，亦以农业社会为较厚；然却很容易被人征服。”而征服者在建立统治之后，就得考虑统治（或曰剥削）的可持续性，不随意干涉原有的社会组织，甚至同化于比自身更先进的社会文化：

（一）剥削者对于被剥削者，亦必须留有余地，乃能长保其剥削的资源。（二）剥削的宗旨，是在于享乐的，因而是懒惰的，能够达到剥削的目的就够了，何必干涉人家内部的事情？（三）而剥削者的权力，事实上抑或有所制限，被剥削者内部的事情，未必容其任意干涉。（四）况且两个社会相遇，武力或以进化较浅的社会为优强，组织必以进化较深的社会为坚凝。所以在军事上，或者进化较深的社会，反为进化较浅的社会所征服，在文化上，则总是进化较浅的社会，为进化较深的社会所同化的。（第五章 财产）

对于从封建时代到资本主义时代的文明嬗

替,吕先生认为:

封建社会的根源,是以武力互相掠夺。人人都靠武力互相掠夺,则人人的生命财产,俱不可保。这未免太危险。所以社会逐渐进步,武力掠夺之事,总不能不悬为厉禁。到这时代,有钱的人,拿出钱来,就要看他愿否。于是有钱就是有权利。豪爽的武士,不能不俯首于狡猾怪吝的守财奴之前了。这是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根源。平心而论:资本主义的残酷,乃是积重以后的事。当其初兴之时,较之武力主义,公平多了,温和多了,自然是人所欢迎的。(第四章 阶级)

在工业文明东渐之前,中国的农业文明曾是一种强势文明。吕先生指出,游牧民族入侵后,被中国文化所同化;同为农业文明的佛教文化输入中国后,“并未能使中国人的生活印度化,反而佛教的本身,倒起了变化,以适应我们的生活了”;“中国虽然不断和外界接触,而其所受的外来的影响甚微”;“至近代欧西的文明,乃能改变生活的基础,而使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彻底起一个变化,我们应付的困难,就从此开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大幸福的希望,亦即寄托在这个大变化上”。(第五十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最彻底的改变,这些表述,揭示了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成为主流文明的历史必然。

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是一个争执已久的话题。对于改造西方宗教为本土教门的太平天国革命,吕先生分析其失败之原因“实不在于军事而在于政治”,“若再推究得深些,则其失败,亦可以说是在文化上”。他指出:“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很不容易同时并行,而社会革命,尤其对社会组织,前因后果,要有深切的认识,断非简单,手段灭裂的均贫富主义所能有济。”(第五十一章 汉族的光复运动)吕先生这一分析十分精到,近代以来中国人对革命的误解,恰恰在于混淆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区别,将两者同时并行。

离现实越近的历史越难评判,吕先生在分析清朝的覆亡时,除缕陈戊戌维新失败的权力斗争背景外,也指出文化上的守旧愚昧:“只要中国人齐心,即可将外国人尽行逐去,回复到闭

关时代之旧”的思想,是酿成蒙昧主义排外运动重要原因。而革命超越改良的原因则在于:“孝钦后自回銮以后,排外变而为媚外;前此之力阻变革者,至此则变为貌行新政,以敷衍国民。宫廷之中,骄奢淫逸,朝廷之上,昏庸泄沓如故。满清政府至此,遂无可维持,而中国国民,乃不得不自起而谋政治的解决”。(第五十三章 清朝的覆亡)腐朽的政治、滞后的改革和媚外的外交,最终导致了革命爆发和王朝倾覆。

四 余论

上述种种,仅系阅读中的一点心得体会,无法尽述吕先生的博大精深。

严耕望先生将陈寅恪、钱穆、陈垣、吕思勉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其他三家都令名远扬,惟吕先生相形落寞,直到近年“国学热”兴起,才重新“被出土”。1949 鼎革之际,钱穆先生出走香江,不与新政权合作;陈寅恪先生走到半途滞留羊城,成为非主流代表人物;陈垣先生留京痛悔前非,为新主流所接纳。如此看来,功名可“正取”也可“逆取”,有心无心的“政治正确”或“不正确”,皆足以扬名立万。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中国士大夫历来有当“帝王师”的冲动,统治者想干点好事或坏事,往往摆出“以史为鉴”的身段向史家求教。其实在主子心目中,这些人大多是备用的“两脚书橱”或歌功颂德的词臣。治学如不能与政治保持距离,学者很容易失身入彀沦为政客,吕先生毕生潜心治学不求闻达,坚持做学界隐者,尤为难能可贵。

清人章学诚在其名著《文史通义》中指出:“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正史出于胜利者,而信史出于旁观者,从这部叙事心平气和、解析鞭辟入里的中国通史中,不仅能窥见作者的史德与史识,也可洞悉中国历代王朝兴替的周期律,令后来者鉴之,祈勿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2010年3月14日风雨读书楼

注:本文是吕思勉著《中国通史》的再版代序。

(吕思勉:《中国通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萧 徐)

请勿轻易下结论

——与阎长贵、杨银禄先生商榷

● 薛开震

几年前在网上看到《张玉凤揭示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一文，文中说：“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我本人，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做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多年来，这则材料通过网络流传，但真伪难辨。近年来，在《炎黄春秋》上读到阎长贵先生的几篇佳作，受益匪浅；2009年又在8月21日的《生活文摘报》上看到向继东对阎长贵的访谈录《秘书眼里的江青》（原载《南方周末》），阎长贵说：“毛远新现住在南昌照顾98岁高龄的老母亲朱丹华，我曾给他打电话询问……”由此，我突发奇想：阎先生应当就上述历史传闻询问一下毛远新。由于与阎先生从未谋面，无法联系，11月18日我便给《炎黄春秋》编辑部写信，并附上给阎先生的信，请他们转交给阎先生。

2010年1月31日下午，阎长贵就此事电话询问了毛远新。毛远新明确、坚定地回答：“胡说八道，从1976年以后，除了‘你好’之类的简单话，主席说话谁也听不懂了，连张玉凤也听不懂，相互交流都是用笔写，谁要说有这件事，请他拿出证据来！”之后，阎长贵、杨银禄又结合前几年与汪东兴女儿汪延群联系、询问的情况写了一篇文章《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发表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3期。文中最后一句话是：“核实表明，这完全是一篇编造的谎言。”

然而，笔者查阅了有关书籍与网文，却认为此结论下得有些匆忙、草率、不严谨。只因为毛远新先生的回答是不符合已经公开的史实（包括他自己留下的一些史实记录），也是经不起推敲的。请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

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43章《临终的日子》里就引用了1976年1月21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谈话（毛远新笔记）》。毛泽东表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又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毛泽东还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见该书第1766~1767页）

该书还引用了1976年4月7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天安门事件情况汇报时的谈话（毛远新笔记）》，毛泽东提议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他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表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该书第1777页）

该书该章还多次引用了张玉凤的两篇文章：《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刊《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此两文中就有毛泽东在1976年的谈话。比如，1976年初农历除夕之夜（1月30日），毛泽东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该书1781页）

张玉凤回忆：1976年“一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考虑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然后主席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毛远新点头说是。就这样，主席提议华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该书1766页）

又据张玉凤回忆：1976年清明节（4月4日）

前后,“也就是这期间,主席曾多次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供展览的偶像。”(该书 1776 页)

该书该章还引用了毛泽东 1976 年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的那篇长话(该书 1781~1782 页),但具体时间与召见人则语焉不详,仅说“这一年,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而其他书籍中则说得较详细,1976 年“6 月 15 日,毛泽东在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召见江青、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王海容等人,说了下一番话:……”(见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2007 年 7 月版,第 720 页)辛子陵引用的这番话与逢、金《毛泽东传(1949~1976)》中所引基本一致,只是辛子陵书中多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这 11 个字。毛泽东的这番话,不算标点符号,也有二百多字,这说明 1976 年 6 月 15 日,他的头脑非常清醒,语言表达也是很清晰的。与此情况相对应的是,张玉凤另一篇文章中披露的两件事——

1993 年 12 月 24 日晚,张玉凤应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会(委托本校教师)邀请,作了一场即席演讲,回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时亲身经历的珍贵历史。其录音整理稿经张玉凤本人审阅,在事隔 14 年之后,于《社会科学论坛》首次发表,题曰《张玉凤首次披露:我所知道的毛主席的部分真相》,此文我前两年曾在报刊上读到,近日在网上重读一遍。该文说:1976 年 6 月 1 日,毛泽东突然心肌梗塞,不省人事。好在在医生的帮助下,主席很快就恢复过来了。主席恢复过来后,一天上午,他要我把《枯树赋》找来给他看。毛泽东看过后,对守在床边的我说,你拿着书,看我能不能把它背下来。我看着《枯树赋》,他老人家竟然能一字不漏地把它背出来。可见,他老人家头脑并不糊涂。

1976 年 7 月 28 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第二天,汪东兴报告主席说,唐山发生了地震,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起见,中央政治局决定毛主席搬到防震的房子里去住。主席说,既然政治局已作出了决定,我就搬过去吧。但等地震过后,我还要搬回来的。可是,一直到去世,毛主席都一直住在防震的那间房子里。在地震期间,毛主席很关心唐山、北京以及其他震区人民的情况,询问损失的程度有多大,防震工作做得怎么样,反映了领袖

与人民是心心相印的。

从上述张玉凤的文字中看,毛泽东从 1976 年 6 月初到 1976 年 7 月底,头脑很清醒,说话表达也没问题。既然如此,毛泽东若是在 1976 年 7 月 15 日口授政治局常委七人名单岂不是完全可以正常说两遍的嘛!

综上所述,笔者得出如下两点判断:一、毛远新先生 2010 年 1 月 31 日下午的那番话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能自圆其说;二、阎长贵、杨银禄先生那篇文章中最后所下的结论也就显得太草率,似乎不能成立。特写出来,供关注这则历史传闻真伪的人们参考并诚望批评指正。笔者这样做的目的和希望,借用阎长贵先生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当代人应当修一部当代信史”!

2010 年 4 月 26 日于开封



2010 年第 9 期目录

灯下随笔	闲话偶像崇拜 没有启蒙,谈何宪政 一条永远的清流 ——《周辅成先生百年诞辰学术座谈会》小记	雷池月 柳士同 肖雪慧
域外传真	伪造“共妻令”震动全世界 美国最高法院为什么推翻禁枪令 官员穷,是国民之福	彭 华 袁传旭 高 峰
人物春秋	王元化对鲁迅和鲁迅研究的反思 ——《中国鲁迅学百年史》断片 两个金瓶奇人的遭际 叶楚伦的本色 名士易顺鼎 皇孙赵孟頫的心灵冲突	张梦阳 曹亚瑟 张永久 张晶萍 黄 波
书屋品茗	雅集漫话 身体也是牢房 ——卡夫卡作品启示录 一部警世之作 ——我读《暮色大江》 闲话《李娃传》 一生磨难皆成诗 ——读许结为父亲许永璋先生所作传记《诗囚》	陈为人 翟大炳 顾 农 余立新
说长论短	神话(化)与人话(化) ——我看周实的《夸·颀·日·娥》 “新说”还是“旧说” 也谈《黄金时代》中“敦伦”的几种误读 胡宗南晋升上将与攻克延安无关	陈家琪 燕 泥 韩袁红 许锡强
前言后语	张远山《庄子复原本注译》简介 从身份政治到公民政治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及其权益保障》序	张远山 李建华 李长林
史海钩沉	陈季同笔下的 1889 年巴黎世博会	李长林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 6 日出版 定价:6.00 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路 443 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85791300 85486812 传真:0731-85790197 邮箱:nlh5314@263.net		

对田纪云“从政体会”的体会

● 吴康民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最近在杂志上写了一篇短文,引起了传媒的注意,但并没有评到点子上。现在就我所知和读文所得,略抒己见。

田纪云是一位有新思维的人。大概在18年前,北京开“两会”的时候,我在全国人大广东省代表团上发言,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选举办法,应该把常委的差额选举,进一步提升到副委员长一级。这个建议没有获得接纳,至今如此。但坐在我旁边,前来列席会议的田纪云,却轻轻地抛出一句:“人家的总统也是差额选举的嘛!”

他虽然不是公开说,以他的身份这样表态也不大方便。但他的这句话,给我留下这是一位开明领导人的印象。

后来有一次会议期间,他又碰到了我,忽然说有一份文件要给我看看,我不知道他要给的文件是什么,但后来却没有下文。不过证明他对我有点印象。他要给的也许是什么文稿之类的东西,或者涉及人大制度的改革,要听听我的意见。那时他已经转到全国人大,担任副委员长了。

评人大文字撞了板

这一次他的文章,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说领导人要“心胸开阔,能够听取不同意见”,不应“一触即跳,动不动就训人骂人”,这样人们才“敢讲话,讲真话,不担心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

回忆我在九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之前,在香港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人大欠缺前进姿态》,指出“全国人大要成为真正的最高权力机关,民主选举是重要关键”,并说“要有一个逐步推进的差额选举时间表,几十年不变,不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后说,“全国人大每年的会议都应该有一种前进的姿态”。

今天看来,这仍然是一个平和的意见。想不到竟激怒了全国人大的领导人,引起一场风波。有人

果然“一触即跳”,对讲真话的一点也不宽容。实在“缺乏领导干部应有的水平,更非政治家的表现。”(田纪云语)

老生常谈有针对性

田纪云的另一重要意见,是说高级领导干部,“要激流勇退,不要恋权恋位”,“千万不可再利用各种关系干预朝政,对现在的领导人指指点点”,“不要再对跑下一棒的人指手画脚”。而且他还指出,用人要“任人唯贤,不能任人唯亲,要搞五湖四海,不搞小圈子”。

这些话看似老生常谈,和现实联系起来,应该是有感而发。中国的政坛,这种恋权恋位的事例还少吗?这种“任人唯亲”的情况还少吗?这种“受什么老部下、老同事、老乡亲、三亲六故等因素影响”的人事任命还少吗?这种“指指点点”、“指手画脚”的情况还少吗?

不少人都在找寻“保护伞”,不少人千方百计拉关系。但田纪云是有本事的,并不靠关系上位。据说当年他已被提名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只因他在四川工作时与赵紫阳共事,就是这一条,被人“以人画线”,升不了官。又据说还是邓小平的干预,他才能由副总理的地位转入人大担任副委员长,最后退休时“平安降落”。

严格来说,田纪云的这篇短文,讲的可说是卑之无甚高论。但正是它有现实的针对性,所以才引人注意。他说:“胡耀邦同志作总书记时,是我们党历史上最民主的时期之一。”我心想,他原本想说胡耀邦是最民主的总书记,但怕得罪人,所以加上“之一”两字。

证之温家宝总理撰文纪念胡耀邦,田纪云在文章中赞扬胡耀邦,而最近去世的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朱厚泽所提倡的“宽松、宽容、宽厚”,又被广为传诵。胡耀邦时代民主、宽松风气最近劲吹,乐观地说,是不是标志着一个新时代将会来临?

民主党派至今仍心存余悸

● 张汝范

去年民盟北京市委统战理论研究会召开统战理论研讨会,我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个发言《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制度应进一步完善》。这篇发言是我多年来在政治生活中的亲身感受和从事党派工作、政协工作的长期观察。

我在这篇发言里引用了《炎黄春秋》发表文章中的一些错划右派的数字。而这些数字有根有据,多出自中共解密文件,有据可查。而《炎黄春秋》又是公开发行的期刊。这些数字早公诸世人。但在2009年民盟北京市委编的《统战理论研究文集》中,却把这些数字全用××代替。如果把这些数字去掉,让读者怎么解读,怎么想?

无独有偶,由北京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编的《北京市民主党派工商联史料选编》(上册)收集了我1996年写的《参加民盟58年的回忆》,其中说到中国科学院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的达到1909户,被迫害致死的299人。但在史料选编发表时被改为:“我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就有很多被抄家,包括著名科学家赵九章在内的许多人被迫害致死。”

1909户、299人被一笔抹杀以“许多人”来替代。其实以上的数字,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杨嘉墀》第178页也有同样记述。也是在我写的同一篇文章中有这样的一段话:“1980年12月,我写信给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建议中国科学院停止卫星研制工作,集中由七机部承担,以减少重复建设,节约投资。中央领导赵紫阳、万里、方毅、张爱萍作了批示。”在史料选编中把赵紫阳抹去。2006年《我与北京民盟》发表时赵紫阳还在。从这两篇文章中反映出来的民主党派及统战系统胆小怕事,对因文获罪、因言获罪仍心有余悸。如果长此下去,中国的民主、言论自由何在?让百姓处于混沌世界中,历史还能成为历史,史实还能成为史实吗?

由此我想到《炎黄春秋》发表一篇理论探讨的文章,接着有人提出要开除某教授的党籍;又有某中学教员在课堂上讲了一些实话,竟有几十位人士要找人家辩论。好像这些事发生在十年灾难中一样,“左”的思潮还不时翻滚,让人堪忧。

2010年7月5日

出版社约稿

国内正规出版、公开发行,或海外正规出版、公开发行

- **书稿内容** 1.文史类:回忆录、自传或其他人物传记、社会纪实作品等; 2.社科类:社会科学、哲学与思想、文化与民族等研究著作; 3.文学类:散文、诗歌、杂文、时评、游记、通讯等作品; 4.小说类:历史、当代、言情、武侠、反腐败等长篇、中短篇小说; 5.美术类:中国画、油画、水彩画、水粉画等绘画作品;毛笔、硬笔、篆刻等书法作品。
- **书稿要求** 可为个人专著、也可为多人合集。个人专著由单独的作品或若干篇合集组成,字数应达到6-8万字以上;多人合集由2-10名作者的作品组合而成。
- **出版发行办法** 本年度计划出版360部,以图书形式陆续出版,目前已经出版210余部。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分别面向国内以及海外公开发行。其中国内公开发行的,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国家新闻出版署备案查询。
- **其它事宜** 1、保证尊重作者著作权,签订标准合同; 2、组稿、征稿长期有效,来稿来函将在一到二周内回复; 3、来稿请勿寄原稿(切记!!),并保证字迹工整、清楚,已编好目录、顺序; 4、书稿经审阅,如达到出版水平,我们将及时通知作者,如经审阅不符合出版要求,作者可以要求稿件退回(挂号或特快退回,须自付邮资); 5、寄稿须知:书稿打印、复印、剪贴、抄写、磁盘均可,发电子邮件(E-mail)更佳,来稿时附彩色近照一张,200字内简历一份,注明联系地址、电话; 6、未尽事宜,欢迎来人、来函、来电联系。

24小时全国投稿热线:400-680-8368(免费长途电话)

我们每年运作500余部图书,新书欣赏、网上订购,请登录: <http://shop.chineseq.com/> (学习新知网上书店)

投稿地址:北京朝阳区八里庄东里3号654信箱(邮编:100025)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综合编辑部(收)
电话:(86)10-81118378、81118398、86878777、58429718 传真:(86)10-89508467
在线投稿:bookbj@126.com 联系人:伽悦、文蔚、汪莹、高晶(编辑)
详情请浏览网站: <http://www.zuojilaba.com> (中华出版热线)



老人
出书
历史
见证！

二千元起编辑出版：个人文集、回忆录、自传！

- 出书范围：
- 1、个人文集：诗文、小说、杂文、随笔等单集或合集。
 - 2、生平传记：革命史、受难史、创业史等回忆录、自传。
 - 3、思想论著：理论专著、自研著作；旧文结集、旧书翻印等。

出版说明：

个人文集、回忆录一般32开本，家史传记、家谱族谱一般16开本。封面插页铜版纸彩印、内页胶版纸印刷，胶装或线装。设计、排版与加印彩色插页费用另行计算。所出书一般没有书号只用于交流与赠送；需办理出版书号的我们编辑、设计制作样书后另行安排。



家族
出书
文化
传承！

三千元起编辑出版：家谱图册、家史传记！

- 出书范围：
- 1、先辈遗文：先辈遗文集、先烈纪念集；录音、摄像，遗作汇编。
 - 2、家史传记：家族大事记、家族先贤传，家谱族谱、家史档案等。
 - 3、传家宝盒：百年家族史、家族图片册，家史光盘、家族音像等。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打算→编辑部寄发参考样书→作者寄送稿件图片→公司核算成本价格→协商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寄送大样作者初审→专业编辑修改→协商设计封面插页→排版设计制作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出版印刷送书（出版附赠光盘，需录音摄像另行协商）。

服务热线：010-68920114

62525116

展示接待：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西大街64号、海淀图书城文化步行街
雪芹书画社2楼大厅

邮编100080

编辑接待：北京市海淀区厂洼街5号（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院）
博越商务楼6106室

邮编100089

登陆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fcsw.com）《家族出书网》（www.jzcsw.net）

长途免费电话

400 633 2311

“春秋奖”评选公告

由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起设立的首届“春秋奖”，自2010年7月开始评选。本奖评选接受社会监督，欢迎社会各界评议并提出意见建议。按照评奖条例，每届评选提名的截止日期为7月31日，10月中旬公布获奖名单。由于本届评选为首届，启动时间较晚，评选日期将延后一个月左右。

“春秋奖”评选条例及评奖委员会组成公示如下：

“春秋奖”评奖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推动中国近现代和当代历史研究，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倡导实事求是的精神，炎黄春秋杂志社设立“春秋奖”。

第二章 组织及功能

第二条 “春秋奖”由“春秋奖”评奖委员会评选颁发。评奖委员会每年秋季举行一次信息交流会。逢双年份的交流会兼具评选功能。平时可酌情召开重要作品的研讨会。

第三条 评奖委员会由历史研究方面的学者及有关专家组成。评委由《炎黄春秋》杂志社聘请。评委会秘书处负责有关活动的具体安排。

第三章 评奖范围

第四条 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有关中国近现代及当代历史的文章和著作，均有参评资格。再版或修订版作品不在评奖范围。

第五条 “春秋奖”每两年评选一次，逢双年举办。参评作品的发表时间应在此二年之内。2010年度首届参评作品的发表时间起自2008年1月1日，止于2009年12月31日。依次后推。参评作品以版权页注明的出版时间为准。在特殊情况下，可补上届漏评作品。

第四章 评奖等级

第六条 “春秋奖”设立一等奖一名，奖金三万元；二等奖二名，奖金各二万元；三等奖三名，奖金各一万元。

第七条 评级标准：1、提出了新观点。2、挖掘出新史料。其中，产生重大社会影响者、填补重大空白者、纠正沿袭多年错误者，具有较高权重。

第五章 评奖程序

第八条 参评作品由评委提名。每位评委可提0-6篇，给出提名理由，综合形成初选名单。提名截止日期为逢双年份的7月31日。

第九条 在初选名单的基础上，通过一至二轮投票，选出12篇作品，形成终选名单。

第十条 在终选名单的基础上，评委集中交流评议，投票选出获奖作品。公布时间为评奖年度的10月中下旬。

第十一条 初选名单、终选名单、获奖名单，以及每一轮的投票结果，评委参加及回避情况，均由炎黄春秋网和其他相关网站公示。

第十二条 初选至终选名单中的参评作品，接受网络评议，评委投票将参考网上意见。

第十三条 补选上届漏评作品进入终选名单，必须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支持。

第六章 回避规则

第十四条 评委中的炎黄春秋杂志社正式工作人员，即人事或工资关系在杂志社者，其作品不在本奖评选范围，如有提名一律无效。其他评委的作品一旦获得提名，该评委可自行选择，接受提名者必须放弃本届评委资格。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条例》的修改须经“春秋奖”评委会讨论通过。

第十六条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于“春秋奖”评委会。

“春秋奖”评委会

主任：杜润生 副主任：李锐 杜导正 秘书长：郭宇宽
评委（按汉语拼音排序）：葛剑雄 郭德宏 何方 韩钢 雷颐 刘苏里 秦晖
钱钢 魏久明 王学典 吴思 萧功秦 徐友渔 徐庆全
杨继绳 杨天石 杨奎松 袁伟时 张鸣

“春秋奖”评委会办公室

地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炎黄春秋杂志社（来信信封上务请注明“春秋奖”）

电话：010-68534879

电子信箱：yhcqj01@126.com 网上评议区：www.yhcqw.com（炎黄春秋网“春秋奖”评议区）

我所知道的“桃园经验”

政治体制与改革困境

瞿秋白是如何平反的

何方：悼念朱厚泽同志

胡耀邦与作协四大

“不须放屁”难倒全国人民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6.90元